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鍾淑敏 博士



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
(1895-1945)

研究生：陳力航

二〇一二年七月

本論文係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訪問期間完成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陳力航

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 (1895-1945)

經學位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許厝厝

陳妤媛

鍾淑敏

指導教授：鍾淑敏

所長：蔣化元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四月十七日

謝辭

以往每當翻閱他人的謝辭，總是會期待在自己論文完成的時刻，著手寫一個屬於自己的謝辭，為寫作論文的生活畫下句點，如今這個時刻終於來臨，回想過去所受到的支持與幫助，我終於可以將這份感謝付諸文字了。

首先我要感謝的是鍾淑敏老師，入門至今三年，很謝謝老師一直以來的傾聽、幫助與鼓勵，忍耐我不甚通順的文句，這幾年跟隨著老師學習，向老師請益問題，讓我度過一段非常愉快的學習時光，也使我獲益良多，對於老師的感激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另外，謝謝擔任口試委員的許雪姬老師與陳姪媛老師，兩位老師在口試時提出精闢的修改意見，並熱心提供許多過去我在撰寫論文時所忽略、未發現的史料，提供了我修訂論文的方向，當然本文若有錯誤，則是我自身的責任。

在大學與研究所階段惠我良多的師長，我也在此表達感謝：首先要感謝當初準備碩士班推甄之時，為我撰寫推薦函的陳梅卿老師、高淑媛老師，以及在繁忙中撥冗為我模擬面試的曾品滄老師，在老師們的幫助下，我得以順利進入研究所就讀，這些事情即使多年過去，我仍然感念在心。接著要感謝張秀蓉老師，在擔任老師助理時，無論在工作上或課業上，都使我學習到很多寶貴的知識與經驗，老師也是一位慈祥和藹的長者，時常關心、鼓勵我。

此外也要感謝東京大學川島真老師的協助與提點，使我得以順利赴日蒐集資料，另外，謝謝青山學院大學的飯島涉老師，願意讓我在赴日期間參加衛生史討論課程。在政大的四年，謝謝薛化元老師、戴寶村老師、陳文賢老師、呂紹理老師、李為楨老師課業上的指導、日常生活上的關心與幫助。謝謝師大的范燕秋老師，修習老師的醫療史專題與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使我獲益良多。感謝臺大的楊典錕老師，楊老師經常與學生分享留學生活的甘苦談，使我在修習課程之餘，也能增廣見聞。

在中研院臺史所訪問的期間，也很感謝黃富三老師、林玉茹老師、詹素娟老師平日的關心與鼓勵。另外，在撰寫論文的同時，有幸能獲得劉士永老師、雷祥麟老師、李尚仁老師的寶貴意見，使我能夠在醫師資格的問題上，有進一步的認識。

許多學長姊、同學、學弟妹也在我論文寫作或資料蒐集上提供不少幫助。首先要感謝臺大歷史所博士班的俊瑩學長，學長在公務、課業繁忙之際，仍願意抽空閱讀我的初稿，並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指正文中的錯誤。再來是負笈東京的俊宇學長，謝謝學長在我赴日期間的幫助，並在百忙之中為我在日本蒐集資料。

此外，感謝同門的世芳學姊、柏棕學長在 Meeting 時給我的意見與關心。同時，感謝昇璋學長、令毅學長、榮聲學長、柏全學長、建智學長、勝全學長、鎧揚學長等諸位先進，對我的幫助與提點。也謝謝青山學院大學的深串學長與東京大學的早丸學長，深串學長在我赴日時，為人生地不熟的我提供許多協助。我與早丸學長是在赴日時所結識，其後學長以交換學生的身分來臺，接待的過程當中，不僅自己的日文能力有所提昇，學長也成為我的論文進度的聽眾。過去在成大時期的鉅強學長、瑞霆學長，也給了我許多幫助。鉅強學長在我準備碩甄時，耐心協助我撰寫研究計畫，瑞霆學長給予的鼓勵與建議，常使我受益良多。

同學與學弟妹的部份，感謝同為訪問學員的杰龍、懷賢、朝傑，特別是懷賢願意與我一起訪問他的祖父—具有滿洲經驗的黃文生先生，在生活、課業等許多方面也感謝他的情義相挺。感謝同住自強一二三舍的君灝、昆諭、昭宏、佳鴻在大小事務上的幫忙與協助，我不會忘記住在這裡的美好時光。非常感謝臺大的昱瀚、柏翔、仁晏、姿吟長期以來的襄助與傾聽；感謝師大的咏恩，以及成大的俊昌、泓璋、奕菖、紫珊，只要是電腦的問題，在與泓璋討論後總能迎刃而解，紫珊在百忙之中為我校對論文，實在非常感激。此外也感謝政大臺史所壘與臺大歷史黑鷹的隊友們，能與你們一起揮汗奮鬥，是我的榮幸。

感謝我的父親陳明亮先生與母親洪錦芳女士，他們始終尊重我的志向，也是我低潮時的避風港，自己能專心於學業，乃歸功於他們的支持。此外，感謝女友

雅玲的照顧與陪伴，每當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她的沉著與冷靜，往往協助我渡過不少難關。

最後，謹將這篇論文獻給曾祖父陳土金醫師與祖父陳以文先生，還有投身歷史洪流的臺灣醫師們。

2012年7月12日 於自強一舍 A304 室



摘要

日治時期的「醫師」是新興的領導階層，醫師取得執照後其專業即受到保障。總督府對於開業醫師能夠干涉的部份較為有限，醫師的高收入與身份的獨特性，對於身處差別統治之下的臺灣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不過即便是醫師，也無法完全擺脫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臺灣島內的習醫機會僧多粥少，有意習醫的臺灣人只能負笈海外，另一方面，總督府訂定的醫療規範，對部分的臺灣醫師產生排擠作用，在臺灣無法取得執照的醫師，前往規定較寬鬆的海外，也是開拓新天地的機會。

對於日本帝國而言，鄰近的中國始終是向外擴張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前往海外的主要目的地。由於醫療是日本帝國自我粉飾的重要手段，前往中國的臺灣醫師，可以視為帝國人才周流(circulation)的一種表現。

本文所要處理的課題，乃是以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作為對象，探討日本帝國的發展，以及臺灣人的原鄉、人際網絡，如何影響臺灣醫師的流動？其階段性變化與區位差異性為何？

本文首先探討總督府衛生政策與醫師的關係，以及總督府開辦醫事教育與臺灣醫師的養成過程，呈現殖民地臺灣衛生改造與臺灣醫師養成的相關性。其次以日本在華醫療事業作為討論的對象，探討同仁會、博愛會的活動如何影響臺灣醫師流動。最後探討臺灣醫師受到 1930 年代日本向外擴張的影響，在滿洲國、佔領地的发展情況以及戰後的流動與困境。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行醫與習醫，受到島內與島外因素的影響，在華南、華中、華北、滿洲地區呈現區位性差異。另外，戰爭與醫學院校的成立，則是造成階段性變化的因素。其中，島內因素有三，為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教育政策、對岸政策；島外因素有四，為習醫機會、行醫機會、日本大陸政策、臺灣人特殊身分與人際網絡。

總之，影響臺灣人前往中國習醫、行醫的背後原因以及分布形態的階段性變化，是殖民地差別性、日本帝國大陸政策、臺灣人際網絡、區位因素等所交錯影響的結果。

關鍵字：臺灣籍民、臺灣醫師、人才流動、對岸政策、博愛會、同仁會、滿洲國、青島東亞醫科學院



目次

謝辭.....	i
摘要.....	iv
目次.....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4
第三節 名詞界定、研究方法與史料介紹.....	8
第二章 殖民地臺灣的衛生改造與臺灣醫師的養成.....	12
第一節 日本帝國的衛生政策與醫師.....	12
第二節 醫事教育開辦.....	14
第三節 臺灣醫師的養成與習醫熱潮的興起.....	17
第三章 日本在中國的醫療事業與臺灣醫師的外放.....	24
第一節 日本在華的醫療事業.....	24
第二節 華南的臺灣醫師與博愛會.....	31
第三節 同仁會的活動與臺灣醫師.....	42
第四章 日本的擴張與臺灣醫師.....	49
第一節 1930年代日本的擴張與佔領地的衛生政策.....	49
第二節 滿洲國的成立與臺灣醫師.....	54
第三節 佔領地的臺灣醫師與徵集令.....	57
第四節 戰後的流動與困境.....	63
第五章 結論.....	68
參考書目.....	74
附錄.....	86
附錄一、前往廈門習醫者.....	86
附錄二、前往青島習醫者.....	88
附錄三、出身上海東南醫學院、上海厚生醫專的臺灣醫師.....	94
附錄四、前往滿洲習醫者.....	96
附錄五、具有中國經驗的臺灣醫師.....	10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時間以來，臺灣社會對於「醫師」的認知，常與「高收入」、「優秀人才」、「高社會地位」畫上等號。不過，近年來隨著健保制度實施，以及一連串的醫藥制度改革，醫師的待遇已不復過去。但即便如此，不少學生或家長仍以醫學系作為升學的目標，若無法進入臺灣的醫學系就讀，部分的家長不惜花費鉅資將子女送往國外，如鄰近的中國、菲律賓以及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等地接受醫學教育，學成之後再返回臺灣。換言之，部分的臺灣醫師早在求學階段，已有異國的生活經驗。

另一方面，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突破國際孤立的困境，曾多次派遣醫療團前往友邦國家，如1964年前往利比亞的醫療團即為一例。¹此外，也有不少醫師參加無國界醫師團，前往落後的國家行醫。向海外派遣醫療團，不僅反映醫療作為親善工作的重要性，也顯示醫療衛生與對外政策的重要關係。許多出身臺灣教育體系的醫師，也隨著醫療團、無國界醫師團前往海外。

回顧歷史，「醫師」在臺灣社會成為高社經地位的象徵，以及臺灣人前往海外行醫、習醫的現象，最早起源於日治時期。

「醫師」一職的興起，與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有關。1890年代後半，總督府決定設立醫事教育機關，以培育協助衛生工作的醫師，於是在1899年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起先社會上對此校持有疑慮，因此招生並不順利，但是經過數年之後，隨著畢業生在島內開業成功，臺灣社會的價值觀也逐漸改變，醫師的高收入，成為臺灣人嚮往此一職業的原因之一。

¹ 有關前往利比亞醫療團的事蹟，可參閱張秀蓉，《臺大醫院利比亞醫療服務隊：1964年1月至1968年6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日治時期，「醫師」與教師、律師並稱「三師」，是社會上令人稱羨的行業之一，也是當時新興的領導階層，醫師與律師的專業，皆受證照制度所保障。但是醫師的出現，乃是與衛生政策有關，許多醫師發揮了提升公衛水準的作用，不少醫師也直接參與地方事務。醫師在取得執照後，其專業即受到保障，總督府對於開業醫師，能夠干涉的部份較為有限。由於身分特殊，加上經濟無虞，不少醫師得以從事反殖民體制的運動，換言之，醫師與官方是處於「既合作又對抗」的狀態。醫師的高收入以及身份的獨特性，對於身處殖民差別統治之下的臺灣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²

不過縱使是醫師，也無法完全擺脫殖民的差別待遇。以總督府醫學校為例，該校在學制設計、畢業生開業資格，皆與日本內地的醫學校有所不同。總督府醫學校的程度，只約略與中學校相當；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無法在內地執業。在各府立醫院的臺灣醫師，起先以輔助日籍醫師為主，薪水不及日人。這是在島內求學、執業，必然面臨的事情。1919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27年再升格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的執業地限制仍然不變。直至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資格問題才得以解決。

但是無論是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或是臺北帝國大學的醫學部、醫專部的人學考試其競爭都非常激烈。總督府也無意增設新的醫事教育機關，曾經增設的特設科、熱帶醫學科也都是基於特別目的，並非為普及臺灣的醫學教育而設。換言之，臺灣島內的習醫機會可謂僧多粥少，有意習醫的臺灣人，除了繼續奮鬥以期擠進窄門之外，最直接的逐夢方式就是負笈海外。總督府的教育政策，造就了臺灣人負笈海外習醫的現象。

另一方面，總督府訂定的醫療規範，也對部分的臺灣醫師產生排擠作用。1900年代初期，總督府開始以證照制度的方式，約束臺灣社會的醫療行為。此後醫師若不具有官方認可的執照，在臺灣只能以「密醫」的方式執業，密醫若遭人檢舉，

²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2），1992）。

必須面臨罰款或是拘役等處罰。在臺灣無法取得執照的醫師，前往規定較寬鬆的海外，也許是開拓新天地的機會。

在日本帝國圈內位居南方的臺灣，也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然而在日本帝國內部，有所謂「北進」與「南進」之爭，日本內部的政局，以及對外的軍事行動、國際上的輿論等，也是影響這兩條路線變動的重要原因。如 1890 年代後期，由臺灣總督桂太郎、兒玉源太郎所主倡的「北守南進論」，即因 1900 年的廈門事件而頓挫，³但是對於日本帝國而言，無論北進或南進的意涵如何變化，鄰近的中國，始終是帝國擴張的重要目標。

1900 年代，日本開始發展在華的醫療事業，如 1902 年同仁會成立，最初的事業範圍為東北、朝鮮。進入 1910 年代同仁會的事業重心逐漸轉移至華北、華中，同時臺灣總督府在廈門事件後，也以非武力的文化政策作為對岸政策的方針。1917 年博愛會成立，博愛會是由臺灣總督府所主導的醫療事業組織，該會最初的事業範圍為福建、廣東。同仁會與博愛會是日本在華醫療事業的代表性組織，其組織的內容、性質、活動範圍，無不受日中關係與大陸政策變動所影響。

此外，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前往海外的目的地，以中國為主。起先以前往華南的人數最多，其後前往東北、華中、華北的人數漸次增加。臺灣人在中國的分佈，受到原鄉關係及人際網絡的影響，不同時期，也有階段性的變化。

總之，對於日本帝國而言，中國是其擴張與侵略的目標；同時對臺灣人而言，前往中國發展有文化相近、語言相通的優勢，因此是重要的海外發展地。另外，臺灣人因為具有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二重性，被日本帝國視為是「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橋樑」，由於醫療也是日本帝國自我粉飾的重要手段，前往中國的臺灣醫師，可以視為帝國人才周流(circulation)的一種表現。⁴

對於兼具「臺灣人」與「醫師」兩種身份的臺灣醫師來說，日本帝國的發展

³ 小林道彥《日本の大陸政策 1895-1914: 桂太郎と後藤新平》(東京: 南窗社, 1996), 頁 27-40。

⁴ 山室信一, 〈植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満州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 ピーター・ドウス、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大東亜共和圈」の思想と現実》(青木書店, 1998 年), 頁 121-153。

以及臺灣人的原鄉、人際網絡，如何影響臺灣醫師的流動？其區位的差異性，以及階段性的變化為何？乃是本論文所要處理的課題

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行醫與習醫，如何受到殖民母國的大陸政策以及原鄉關係、人際網絡的影響，而呈現出階段性變化與區域性差異，試圖從醫師這個職業來探討日本帝國下人材向外流動的現象。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本研究的討論範圍牽涉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總督府的對岸政策、日本在華的醫療事業等議題，對此有所關注的研究者，以中村孝志為啓始，其後主要有梁華璜、許雪姬、鍾淑敏、駱明正、王學新、黃福慶、卞鳳奎、范燕秋等人。

（一）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

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或是相關的研究，以中村孝志的研究為嚆矢，中村探討臺灣與華南的關係以及各地的臺灣籍民問題，並分析籍民的分布與職業、生活、教育狀況與各勢力互動的情形。在其整理的職業別統計中，可略知臺灣籍民習醫與從事醫業者的人數與分布概況。中村在整理、介紹日本與臺灣資料上有不小的貢獻，其研究反映地域性差異，呈現臺灣人在日本的對岸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提供日後研究的切入點。⁵

梁華璜的臺灣籍民研究，不止探討籍民本身，同時關照相應的制度背景，如臺人赴華旅券的變化與廢除；梁華璜關注抗日運動的發展，研究斷限延伸至戰後，對於日本的對岸政策，持相對批判的態度。因此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籍民，梁華璜嘗試以臺灣人的角度，形塑臺灣人的曖昧與兩面性。⁶

許雪姬的研究則以出身、前往的地區為研究的切入點，如前往滿洲的醫師、

⁵ 中村孝志的臺灣籍民的研究，可參見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 2063-2090。

⁶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 131-213。

前往華南的高雄人、瓦礫出身的醫師等。首先，對於前往滿洲的醫師，許雪姬先是鋪陳滿洲衛生環境、醫師資格，並進一步提出先後前往該地習醫、行醫的臺灣人的具體例子。滿洲的例子顯示，除了地緣條件，外在政治環境及學制亦是影響人群移動的關鍵因素。而且，滿洲與華南地區也形成鮮明的對比。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一文，除了清楚呈現高雄人前往華南的原因，以及其中的推力與拉力，對醫師的討論部分也值得參考。對於瓦礫出身醫師的討論，則以醫師作為對象，分析其養成與發展。⁷綜合而言，許雪姬的研究更具「人味」而非僅為政策、事件的討論。這三篇著作對於在中國的臺灣醫師有所著墨，其分析的模式與史料的運用，提供本文一個重要的研究取徑。

長期以來，廈門不僅是臺灣籍民最多的地區，也是許多臺灣醫師的聚集地。鍾淑敏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一文，分析籍民的移居動機、職業別，接著談論各界的臺灣人集體形象，最後則以身處中日之間的臺人作結。本文討論深入、涵蓋層面廣，相較於中村將臺灣醫師置於日本醫療活動下討論，鍾淑敏則以臺灣人的角度出發，突顯臺灣人醫藥從業者在廈門的特殊地位，並分析前往廈門開業的原因，如語言、資格的因素以及醫師的學歷、執業概況、當地對臺灣醫師的反應等。⁸鍾文提供許多有關在廈門的臺灣醫師的線索，當地的臺灣醫師無論有無執照，在廈門落地生根皆非難事。此一具體情況，也啟發與滿洲之間的比較研究。

鍾淑敏在〈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一文，將醫療與衛生納入討論，如海南島的醫療單位、熱帶醫學的作用，⁹戰爭的爆發連帶影響原先的人才流動狀態，亦提供不同階段的比較基礎性的思考。

⁷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卷2期（臺北，2004），頁1-75；許雪姬，〈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2000高雄研究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2001），頁369-403；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礫籍的醫生〉，《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2），頁396-417。

⁸ 鍾淑敏，〈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於《走向近代》（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399-452。

⁹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臺北，2003），頁169-221。

卞鳳奎的臺灣籍民研究，在史料上與中村、梁不同之處在於使用口述史料與中國文史資料。卞除了探討在華南的臺灣籍民外，也將目光延伸至上海、北京、滿洲的臺灣籍民，甚至是位於東南亞的泰國與菲律賓，宏觀地處理籍民問題。華南部分大抵延續梁華璜的研究脈絡，以說明人員流動與時局互動，分析各地籍民的分布形態，其中籍民的偷渡、臺灣義勇隊的抗日等相關問題較具新意。¹⁰

卞鳳奎的《日治時期臺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一書分三部分，首先探討身為醫師家族的萬華洪家與日本官紳之間的交流；接著分析臺灣人留學日本、選讀醫學校的原因，以及臺灣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與交友狀況；最後討論留日醫師的開業概況與社會貢獻，其中針對臺灣人出國規範與留日醫師在中國的動態有所著墨。在留日醫師前往中國的部分，卞鳳奎主要以許雪姬的研究及口述資料為基礎，討論臺灣醫師在中國行醫、從政、參與抗日等各類活動。本書附錄的部份，將《臺灣醫師名鑑》和地方志書之中，具有留日經驗的醫師整理成表，有助於提供線索以及建立臺灣醫師的留學系譜。¹¹

最近，陳姪媛探討日治時期前往朝鮮習醫、行醫的臺灣人。1910年朝鮮與日本合併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臺灣人前往朝鮮習醫，是島內的習醫熱潮所反映的現象。陳姪媛的研究側重在教育環境對醫師流動的影響，其研究成果也提供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分析模式上的比較對象。¹²

（二）總督府的對岸政策與日本在華醫療事業

有關總督府的對岸政策以及日本在華的醫療事業，是以中村孝志的研究為起始，中村在日本南進政策的脈絡下，分析博愛會醫院、旭瀛書院、全閩新日報等總督府文化事業的營運狀況，從中不僅討論博愛會醫院，也討論臺灣醫師所扮演的角色。¹³

¹⁰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臺北：樂學，2006）。

¹¹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臺北：博揚文化，2011）。

¹² 陳姪媛，〈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19卷1期（臺北，2012），頁87-140。此外，近年來中研院臺史所也舉辦「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工作坊」、「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一系列活動探討日治、戰後的臺灣人在東亞各地的活動。

¹³ 中村孝志，〈廣東博愛會醫院をめぐる諸問題（1）〉，《天理大学学報》第165輯（奈良，1990）。

在中村的基礎下，王學新連結博愛會醫院事業與大陸政策，認為總督府的南進政策僅在符合中央的政策思維下，才有被重視的可能，並不是對華政策的主流。王文大量使用外務省資料，清晰地呈現臺灣醫師與博愛會醫院的關係，以及當地對該醫院的反應。但是文中以 SWOT 分析方式分析博愛會的經營情況，卻未說明使用此分析方式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¹⁴

梁華璜也與中村同樣偏重政策、事件與制度的探討，如總督府的福建政策、廈門事件、旅券制度。不過梁華璜以較為不同的角度，分析總督府的對岸政策，以及圍繞著華南經營的重要事件與制度。¹⁵

黃福慶分析日本在中國另一個組織——同仁會，敘述成立背景、組織概況以及各醫院的經營，他對同仁會的態度較為持平，認為該會背後的目的雖不單純，卻間接為中國帶來醫療衛生的進步。本書雖然成書甚早，但引用一手史料不失客觀的評析。惟可惜或許由於受限於史料，對於博愛會，文中僅以隻字片語帶過。¹⁶

駱明正（Ming-Cheng M. Lo）的著作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中譯：疆界內的醫師：在殖民地臺灣的專業性、民族性、現代性），由社會學的角度以 1931 年、1937 年作為分期界線，探索日治時期臺灣醫師的集體身分論述與自我認同，將其劃分為反殖民、遣散、同化三期，呈現醫生們自我認同發展的過程。駱文關注臺灣醫師的社會位置與集體身分論述的歷史發展脈絡，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並聚焦於「醫師」群體的研究。本書雖分析日本在中國的同仁會事業，並與殖民醫學作比較。然而本書忽略同仁會內的

年），頁 25-47；中村孝志，〈廣東博愛會醫院をめぐる諸問題（2）〉，《天理大学学報》第 166 輯（奈良，1990 年）頁 1-24；中村孝志，〈汕頭博愛會醫院の成立—臺灣總督府の文化工作〉，《天理大学学報》第 162 輯（奈良，1989 年）頁 1-24。

¹⁴ SWOT：S 表示（Strength：內部優勢）、W 表示（Weakness：內部劣勢）、O（Opportunity：外部機會）、T（Threat：外部威脅）。詳見王學新，〈抗戰前博愛會醫院之運作與日本大陸政策之關係〉，《逢甲人文學報》，第 16 期，（臺中，2008），頁 107-131；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南投：臺灣文獻館，2009）。

¹⁵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頁 131-213。

¹⁶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69-112。

臺灣醫師之認同，未分析身處其中的臺灣醫師勢必面臨與臺灣有所差異的環境。¹⁷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中國的研究，早期關注的焦點，如中村孝志、梁華璜以華南地區的臺灣籍民為主，討論的方式是以「臺灣人」、「臺灣籍民」作為對象，少有探討特定職業者。¹⁸其後，許雪姬、卞鳳奎開始探討華南以外的地區，其中，許雪姬以單一職業的臺灣人作為探討的對象，可見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研究，所探討的領域正逐漸擴大與深化。本論文試圖在這些先行研究的脈絡下，以前往中國「行醫」、「習醫」的臺灣人作為探討對象。

有關總督府的對岸政策，以及日本在華醫療事業的研究，自然以政策與事業作為研究的對象，然而，政策的制定與變動，以及事業的營運與發展，皆與「人」有所關連。也是影響「人」的流動之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擬以「人」的角度，探討這些受到政策影響而前往中國開業，或者是服務於日本醫療事業的臺灣醫師。

第三節 名詞界定、研究方法與史料介紹

在此，針對本文的若干名詞加以釐清與解釋，首先本文所指的「醫師」主要是指西醫而非漢醫。臺灣社會最初的西醫雖然與西方傳教士有關，但是人數並不多，直至日本統治臺灣以後，隨著總督府的衛生政策，西醫才逐漸普及。因此，臺灣社會的西醫本身即與殖民統治有所關連，本文討論的對象，包含自行經營診所、在官私立醫院任職、從事醫學研究的醫師，以及正在醫學院校就讀，將來可能會成為西醫的臺灣人。

由於 19 世紀後半以來，中國的領土歷經多次變動，領土變動的原因，來自各國的勢力介入，以及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然而，臺灣醫師的流動，主要受日本在

¹⁷ Ming-Cheng 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pp. 1-236. 陳德智，〈評介駱明正《疆界內的醫生：在殖民地臺灣的專業性、民族性與現代性》〉，《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頁 207-222。

¹⁸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頁 2072-2073；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頁 131-213。

華活動、臺灣人的原鄉關係所影響，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在「中國」的臺灣醫師，特別是指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另外，本文的「島內」指的是「臺灣島內」。

本文探討殖民地臺灣的醫療人才向外流動，所謂的「流動」係因「推力」與「拉力」的作用而導致身為社會領導階層的臺灣醫師，其言行舉止、生命軌跡也較為容易出現在歷史文本當中。本研究欲藉史料的解讀與分析，進一步勾勒其「推力」與「拉力」的來源與變化，以及醫師本身的行為與動向。

在文獻材料的運用上，本研究以官方檔案、人物名冊、醫學院校檔案與機關雜誌、報紙、口述史料為主。

首先，如《臺灣總督府府報》及《外務省記錄》等官方檔案，有助於理解臺灣與中國的醫政制度，並進一步認識日本的對華政策與醫療事業，如醫師執照規則的變革，以及總督府對臺灣籍民的觀察。

無論是日治時期或者是戰後，人名錄往往是認識地方人物的捷徑，由於醫師為領導階層的一份子，日治時期參與地方行政的比率也不低，因此不難在各種人物名冊上發現相關的資訊。此外，戰後由臺灣醫藥新聞社、國際文化服務社、臺灣省醫師公會所編纂的醫師名冊，也能提供 1954、1958、1966、1975 這些年份的醫師資料，其中 1954、1958 年份的醫師名冊，學經歷的部分較為完整，時間也較接近戰前；1966、1975 年份的醫師名冊雖然收錄的醫師名單較為完整，但學經歷的部分僅列出學歷，透過利用這四本醫師名冊以交叉比對，已能初步建立一份前往中國習醫、行醫的醫師名單。¹⁹不過人名錄的準確度仍有待商榷，部分醫師的學經歷可能會有假造、隱藏的情形，且因人數眾多，無法逐一比對與查證，難免產生缺漏與誤植。以張嘉英醫師為例，1954、1958 年的醫師名錄當中，僅記錄張醫師畢業於長崎醫科大學以及戰後的任職單位，但若翻閱張醫師的口述史料，則會

¹⁹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

發現原來張醫師曾前往北京任職。²⁰因此在使用人名錄時，對於醫師的學經歷部分，必須多加留意。

此外，由同仁會編纂的《中華民國醫事綜覽》當中，可以發現臺灣醫師常以祖籍作為籍貫，因此容易與福建、廣東出身的醫師混淆。以王雅三醫師為例，在《中華民國醫事綜覽》當中，籍貫是「福建漳州」，但對照《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卻發現王醫師實際上出身於臺北州，因此在使用醫師人名錄之餘，不僅要注意學歷隱藏與假造的問題，也必須與其他的資料相互對照，以減少缺漏的情形。²¹

至於醫學院校檔案與機關雜誌，如《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可提供畢業生的動態與就職統計，它不僅附有在學生、畢業生的名單，並記載該校內部制度與規定。而由臺灣醫學會所發行的《臺灣醫學會雜誌》，則為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界的核心刊物，不僅刊載醫師們的研究成果，對於醫師的動向也有所記錄。

而報紙提供的訊息，與機關雜誌類似，例如醫師前往海外任職、醫師本人的言論也時常見報，另外由於報紙是大眾化的傳播媒介，因此也能夠藉之獲得許多醫學專業以外，有關醫師個人生活的種種訊息，如醫師家族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醫師的婚喪喜慶等，這些訊息也有助於瞭解醫師們的人際網絡。

此外口述歷史也保留了醫師自身的感想，以及他人對醫師的觀察與想法。在本研究當中不只尋找已出版的口述歷史資料，也積極尋找能夠訪談的對象，例如：與具有滿洲經驗、戰後曾任職省衛生處的黃文生先生對談；黃先生的母親盧粉，與簡仁南醫師之妻盧淑賢乃是姊妹關係，戰前黃先生曾於簡仁南醫師所主持的大連仁和醫院工作，戰後曾於省衛生處任職。黃先生的滿洲經驗與衛生行政機關的資歷，也為簡仁南醫師在滿洲的從業狀況，以及戰後醫師資格的演變，提供許多

²⁰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183；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 238；顏尚文計畫主持、馬有成採訪編輯，《嘉義市醫療業口述歷史》（嘉義：嘉義市文化局，2005）。

²¹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自昭和六年至昭和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106；小野得一郎，《中華民國醫事綜覽》（東京：同仁會，1935），頁 148。

寶貴訊息。²²此外，畢業自青島醫專的蔡錫圭先生，敘述該校的成立過程與運作的相關資訊；吳庭茂先生則分享自身負笈青島，以及戰後服務於地方醫療機構、日本無醫村的經歷，補足該校的校史《青友史》與本文附錄二不足的部分。²³



²² 筆者曾於 2011 年 2 月 11 日，前往臺南市拜訪黃文生先生，就滿洲經驗部分進行訪談。

²³ 筆者於 2012 年 6 月 27 日、7 月 4 日、7 月 11 日，先後拜訪蔡錫圭先生、吳庭茂先生，除了感謝兩位先生之外，也特別感謝張秀蓉老師、陳姪媛老師、蔡淑霞女士、吳希彥先生、吳琰秋女士、蔡佩穎女士的聯繫與協助。

第二章 殖民地臺灣的衛生改造與臺灣醫師的養成

第一節 日本帝國的衛生政策與醫師

清帝國統治下的臺灣是個環境髒亂、傳染病橫行的地方。臺灣社會的醫療也以漢醫為主。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於臺灣總督府而言，當務之急乃是改善臺灣的衛生環境、並導入內地的醫療衛生制度。臺灣的主要城市也先後設置九所醫院、六所分院，其後納入總督府統轄，成為府立醫院系統，朝向集中化、專業化的發展。

1896年後藤新平兼任總督府衛生顧問，開始在臺灣的衛生政策上發揮影響力。出身醫界的後藤，有意以醫師作為殖民政府的協力者，協助防疫與地方衛生行政的運作，在此背景下，1896年6月總督府以府令第八號發佈《公醫規則》，將公醫配置於各地，公醫在開業的同時，負責管區的醫療與衛生事務，可以說是國家權力的延伸。

總督府在同年發佈府令第六號《臺灣醫業規則》，此規則的歷史意義在於政府首度以證照制度約束臺灣社會的醫療行為，違反規定的醫師，會被拘留或課以罰金。根據《臺灣醫業規則》，醫師的開業資格為：

第一條 醫師指由內務大臣核發的醫術開業許可證及由民政局長核發的醫業許可證者。

第二條 持有內務大臣核發的醫術開業許可證的醫師，若欲開業時，必須選定開業場所，並於五日檢具該許可證申報地方當局。

第三條 申請發給醫業許可證，必須附上醫術相關履歷書，由地方當局向民政局提出。

第四條 醫業許可證僅限臺灣與澎湖有效。且必須特別註明限定之區域。²⁴

²⁴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醫業規則制定，61-13，頁1-3。

《臺灣醫業規則》自 1896 年 7 月開始實行，條文中所謂的「內務大臣核發的醫術開業許可證」，乃是依據 1883 年 10 月制定的《醫師免許規則》的第三條「具有官立及府縣立醫學校的畢業證書者，持其畢業證書提出申請之時，內務卿應不須加以試驗而授與其免許狀」。²⁵換言之，出身自日本政府認可的醫學校的醫師，只要以畢業證書提出申請，即可獲得內務大臣核發的開業許可證，因此，應聘來臺的日本醫師，自然具有開業許可證。

1901 年 7 月《臺灣醫生免許規則》訂定，凡漢醫、洋醫皆屬「醫生」，²⁶必須向地方當局提出申請，並經由地方官員認定醫術者，才可以獲得許可證，漢醫與洋醫的資格方得以確立；傳統社會的醫療行為開始被證照制度所約束。²⁷總督府也以罰款的方式，取締無照的漢醫，以李應章（後更名李偉光）醫師為例，李應章出身中醫世家，父祖皆為漢醫，但其父因不具有前述之醫師免許證，時常遭到警察的刁難或罰款，對此李應章回憶：

父親因沒有中醫的正式執照，常被日本員警凌辱或罰款，給我種下反抗日本的思想感情。²⁸

總督府以國家的力量，作為證照制度的後盾，無照執業的醫師，必須面臨二十五日以下的拘役，或被課以二十五圓以下的罰金；²⁹臺灣社會的醫療行為，也開始受到法律的規範。此外，有關戰前無照的「密醫」問題，出身岩手醫專的吳平城醫師回憶當時的情況：

日治時代，政府行政清廉嚴格，百姓也守法成性，表現在醫界的，就是密醫很少。即使有密醫，通常是曾替醫師在藥局包藥，漸漸學會些微醫療知識，而後偷偷行醫的。密醫如果被警察發現，藥品一律沒收，又要坐牢。

²⁵ 厚生省醫務局編，《医制百年史》（東京：ぎょうせい，1976），頁 56。

²⁶ 〈本島醫生取締と藥劑〉，《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 3 月 29 日，2 版。

²⁷ 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54-55、101-148。

²⁸ 李玲虹、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臺北：海峽學術，2007），頁 2。

²⁹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醫業規則制定，61-13，頁 1-3。

我在國民學校讀書時，就曾看過一個藥局生，因為雇用他的醫師過世，他就偷偷幫人看病，後來被警察抓去派出所痛打一番，又關進牢裡幾十天，看的大家久久心有餘悸，很少人敢再當密醫。³⁰

總督府的證照制度，以及相關的取締與罰則，對於無照醫師的生計產生了威脅。即便是持有執照的醫師，若從事非法行為，總督府也有權收回執照。這些無照或者是執照被收回的醫師，若想繼續執業，除了努力取得資格或尋求復職外，前往開業限制較低的地方執業，便成為這些人的選擇之一。

第二節 醫事教育開辦

日本統治初期，臺灣人西醫並不多，大多與教會醫院有關，社會上的臺灣人醫療從業者，仍然以漢醫為主。1896年12月山口秀高來臺擔任臺北醫院的院長，他認為：應募來臺的日本醫師，受諸多外在因素的影響難以久留，為了長久之計，應該成立專門培育醫師的醫學校。山口秀高的構想，也獲得後藤新平的支持。

1897年4月在山口的主導下，「臺灣土人醫師養成所」成立，是臺灣總督府第一個成立的醫事教育機構，然而養成所的招生狀況並不順利，³¹為此，總督府以勸誘、補助的方式，勉強集合三十幾名學生，由臺北醫院的醫師兼任養成所教師，在臺北醫院內授課。³²養成所的課程，除了日語之外，尚有物理、化學、數學、地理、歷史等，繁重的課業，多少影響了臺灣學生的學習意願，許多人也先後打退堂鼓，養成所一共招收兩屆，約六、七十名學生，最後只有十五名學生結業（第一屆5名、第二屆10名）。³³

1898年3月，後藤新平出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此一人事變動，也為臺灣

³⁰ 吳平城、胡慧玲著，《草地醫生》（臺北：玉山社，1997），頁105-107。

³¹ 山口秀高，〈臺北医院内ニ於ケル土人医士養成ノ景況〉，《後藤新平文書》明治31年2月。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臺灣時代1898-1906》，頁439。

³²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臺北：臺大醫學院，1997），頁27。

³³ 莊永明，〈日治時代的醫學教育〉，《臺灣史料研究》，第3期（臺北，1996），頁3-5。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臺北：臺大醫學院，1997），頁27。

帶來關鍵性的影響，原先動盪的時局，也在後藤上任後逐漸穩定。政局穩定之下，阻礙政策推動的外部因素自然減少，然而總督府推行衛生政策的過程中，也需要不少醫師的協助。對此，後藤新平認為，醫學校才是衛生制度完成的原動力，在臺開辦醫事教育，確保醫師的來源，是比較根本的解決方法。³⁴

對於山口秀高而言，他的目標也不只是成立養成所，而是成立正式的醫學校，不過總督府數度回絕了山口的設校請求，認為時機尚未成熟。³⁵但山口與後藤並未放棄設校的構想，1898年，後藤新平以「土人醫師養成所」的名義，向第十三回帝國議會提出設校計畫，1899年，日本官方終於以勅令第95號，公布〈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隨即於同年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以下簡稱總督府醫學校）。³⁶

最初總督府醫學校的入學，是由地方官推薦學生，1904年1月起，開始舉辦入學考試。總督府醫學校的學制設計，約略等同於中學，即在公學校之上，再施以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的醫學教育。³⁷

總督府醫學校成立初期，也與養成所同樣面臨招生不順的情況，早期的學生，儘管有公費與津貼，中途放棄的人還是不少，³⁸總督府醫學校前四屆的畢業率，大多在一、兩成之間徘徊，亦即十名學生當中，平均只有一兩名學生會順利畢業。直至第五屆、第六屆，畢業率才提升為四、五成。³⁹

過去的研究認為：總督府醫學校成立初期的狀況，如招生不佳、學生中退率高，乃是與臺灣人認為總督府統治無法維持、醫學校修業年限過長等因素有關，加以醫生在清代臺灣的社會結構，所處的地位與收入並不高，以上種種因素，導致臺灣人一開始對總督府醫學校的接受度低。⁴⁰

³⁴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頁 438-439。

³⁵ 莊永明，〈日治時代的醫學教育〉，頁 27。

³⁶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臺灣總督府府報》，明治 32 年 4 月 9 日勅令第 95 號。范燕秋，〈日治臺灣醫學的精神傳承：本土醫學傳統之建立〉，收入氏著《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臺北：稻香，2005），頁 73。

³⁷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06），頁 7、14。

³⁸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生徒給與規則〉，《臺灣總督府府報》，明治 32 年 7 月 7 日府令第五十五號。

³⁹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91。

⁴⁰ 莊永明，〈日治時代的醫學教育〉，《臺灣史料研究》，頁 7。

總督府醫學校的成立，可說是總督府重視醫學教育的表現，成立醫學校的目的，不在於增加被殖民者的教育機會，而是藉由總督府醫學校體系培育臺灣人成為醫師，以確保醫師的來源，幫助推動總督府的衛生政策。

總督府醫學校出身的醫師，最初的資格為「臺灣醫學得業士」，可依《臺灣醫業規則》，持醫學校畢業證書以及相關的履歷書，經由地方廳向民政局申請執照。

「臺灣醫學得業士」，僅能擔任囑託與雇員，執業地僅限臺灣、澎湖，無法在日本內地開業，原因在於總督府醫學校的醫學訓練與內地醫學校不同，必須另外參加考試，才能取得由內務大臣核發的開業執照。⁴¹

1906年日本內地頒佈醫師法、齒科醫師法，再次訂定醫師與牙醫師的開業資格，但《醫師法》、《齒科醫師法》並沒有在臺灣實施，直到1916年《臺灣醫師令》、《臺灣齒科醫師令》公布，⁴²才沿用1906年制定的《醫師法》、《齒科醫師法》的部分條文。《臺灣醫師令》、《臺灣齒科醫師令》對於醫師、牙醫師資格的規定如下：

《臺灣醫師令》

- 一、依據〈醫師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一號取得醫師資格者
- 二、臺灣總督指定的官立、公立醫學校畢業者
- 三、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者
- 四、臺灣總督所指定的醫師考試及格者
- 五、外國醫學校畢業，或在外國具有醫師執照的帝國臣民，並符合總督府的認定者。

另外，領有內務大臣所核發的醫師免許證者，則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得成為醫師。⁴³

⁴¹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卷2期（臺北，2004），頁1-75。

⁴² 參考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659100、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九年・法律第四十七号・医師法（国立公文書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659200、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九年・法律第四十八号・歯科医師法（国立公文書館）。

⁴³ 醫師法第一條為：凡帝國大學醫科大學醫學科，或者是官立、公立。若為文部大臣所指定的私立醫學專門醫學科畢業者。〈臺灣醫師令〉，《臺灣總督府府報》，大正5年1月13日律令第一號；JACAR：A03020659100。

《臺灣齒科醫師令》

- 一、符合齒科醫師法第一條第一號者。
- 二、臺灣總督所指定的齒科醫師考試合格者。
- 三、外國齒科醫學校畢業、或者在外國領有齒科醫師執照的帝國臣民，符合總督府之認定者。

另外，領有內務大臣所核發的醫師免許證者，則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得成為齒科醫師。⁴⁴

另外，《臺灣醫師令》的附則也規定：「臺灣醫師令施行之前，已獲得醫師執照者，依照本令可取得醫師執照，但是地點與期間的限制仍然維持不變。」⁴⁵

簡言之，在 1916 年《臺灣醫師令》、《臺灣齒科醫師令》公布以前，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持畢業證書，經過一定程序後，即可取得在臺開業的執照，其後總督府醫學校的學制與畢業資格也有所變化。191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並開始招收日本學生，至此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資格，也改稱為「臺灣醫學得業士」，不過開業地點僅限於臺灣與澎湖的部份，仍然不變。直至 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畢業生的資格改為「醫學士」之時，開業地點才不再受限制，但在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以前，臺灣醫師若欲取得在日本開業的執照，必須再參加考試。⁴⁶

第三節 臺灣醫師的養成與習醫熱潮的興起

總督府最初對醫學教育的規劃，目的在於培養醫師作為殖民統治的協力者，補足醫療人才的缺口，因此總督府對於臺灣人習醫，自始即採「鼓勵」的態度，

⁴⁴〈臺灣齒科醫師令〉，《臺灣總督府府報》，大正 5 年 1 月 13 日律令第二號；JACAR:A03020659200。

⁴⁵〈臺灣醫師令〉，《臺灣總督府府報》，大正 5 年 1 月 13 日律令第一號。

⁴⁶ 范燕秋，〈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收於國史館編著，《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研討會論文集》，頁 170。陳三郎，〈日據時期臺灣的留日學生〉（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頁 29-30。

因為臺灣醫師可作為總督府推展衛生政策、輸入近代文化的媒介，而且與日本醫師相較，臺灣醫師語言、風土適應方面具有優勢，執行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時，也能降低臺人的恐懼與不安，從而使工作順利進行。不過總督府之意，並非將臺灣的衛生全數託付與臺灣醫師，而是以日本醫師為主，臺灣醫師為輔執行衛生工作。

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依《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第十四條規定：「接受學費補助的學生，自取得畢業證書的五年期間，有義務從事臺灣總督府所指定的職務。但若有特別情勢，且獲總督府允許者，不在此限。」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至第八屆皆為公費生，自第九屆開始方招收自費生，⁴⁷因此醫學校學生畢業後，不少人會先進入府立醫院實習。

臺灣醫師在總督府立的醫院，大多擔任各科助手，從事輔助的角色，如 1919 年進入臺南醫院服務的韓石泉回憶：

蓋所任職務為醫務助手，其上有醫官補、醫官、醫長，權限劃明；余僅抄處方、檢查、問病歷，並不擔任治療工作，頗乏興趣。⁴⁸

至醫院實習的醫師，無論地位、薪水皆不如日人，臺灣醫師在醫院停留一兩年後，便出外開業。⁴⁹原則上，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出路有三，自行開業、任職官立醫院、從事研究與教職，其中以自行開業的人數較多，任職官立醫院、從事研究與擔任教職的人數較少。

1902 年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學生畢業，也約莫從這年開始，招生狀況逐漸好轉。翌年，入學志願者為創辦以來新高，錄取率也降至新低的兩成二，此後錄取率長期徘徊於兩三成之間，甚至曾降到一成以下，⁵⁰1910-1918 年總督府醫學校與

⁴⁷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臺灣總督府府報》，明治 32 年 7 月 7 日府令第五十四號；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90。

⁴⁸ 韓石泉，《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臺北：望春風文化，2009），頁 97。

⁴⁹ 以日治時期的宜蘭醫院為例，前後 21 名醫師當中，留院 5 年以上的只有 5 名，即使超過 10 年，大部分醫師最後也以自行開業居多。范燕秋，《宜蘭縣醫療衛生史》（宜蘭：宜蘭縣政府，2004），頁 92。

⁵⁰ 根據 1899-1924 年醫學校累年入學志願者卒業及事故者一覽表可見，1901 年「入學志願者」，首度超越「入學者」，意即錄取率不再是百分之百。開始實施入學考試的 1903 年，入學志願者為 157 人，最後錄取 34 人，入學志願者達到新高，此後始終維持低錄取率；入學志願者的增加，也反應立志習醫者的增加，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88、90。

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國語學校師範部相較，總督府醫學校的錄取率始終最低；⁵¹能夠進入該校者，乃是菁英中的菁英。

總督府醫學校，由原先招生不順，逐漸轉變為競爭激烈、菁英群聚的學府，主要的原因在於，總督府逐步整頓衛生制度、推展衛生措施，改變了臺灣的醫療衛生，臺灣社會對於「醫師」的認知與觀感也慢慢轉變。對於臺灣人而言，進入醫學校就讀、畢業後成為醫師，乃是當時少數幾種提升社會經濟地位的管道之一。而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醫師，在各地開業的成功，也慢慢影響臺灣社會對醫師的觀感。

不僅如此，臺灣醫師的診療技術，漸為日本人所信賴，病患中有臺灣人，也有日本人。對於總督府而言，這些醫師無論在醫院任職或者自行開業，皆對當地的衛生工作有所幫助。杜聰明的回憶錄中談到：

（前略）... 畢業生在全島各地開業，診療成績很好，獲得一般人士之尊敬及信用，優秀青年集中於醫學校，成為全島最優秀的學府。...（中略）... 如此醫學校畢業生不但在本島成功，在海外亦很活動成功之。...（中略）... 當時，在臺灣的日本人一般有優越感輕視本島人，但罹病時，不往日本人開業醫師，反來醫學校畢業生求診，可知醫學校畢業生，如何在本島獲得信用矣。⁵²

在大環境改變，以及醫師社會觀感逐漸轉變的情況下，立志習醫的青年逐漸增加，許多家長也期望子女能夠成為醫師。陳君愷將這個現象，稱為「習醫偏執」，並認為習醫偏執是受到臺灣重商趨利的傳統，以及中國科舉文化的影響所產生的現象。

53

由於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使然，公學校畢業後，若要留在島內習醫，選擇非常

⁵¹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88、91；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頁 93-94。

⁵²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臺北：龍文，2001），頁 61-62。

⁵³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人「習醫偏執」所反映的社會意義及其影響〉，《文化實踐與社會變遷》，創刊號（臺北，2010），頁 127-195。

有限；總督府雖曾於 1915 年增設特設科、1919 年增設熱帶醫學專攻科，但始終沒有新設醫學校，或是大幅增加入學名額，而且總督府於 1915 年增設的特設科，乃是招收中國留學生，畢業後需返回中國執業。

1899 年，山口秀高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之由來以及將來之企望〉演講中談到：

不只臺灣一島，即連華南地帶，甚至對東洋全域也可能帶來一大變動。同時，本校不斷進步後，日後若成為大學，則廣大清國中，比較開化的華南之地如福州、泉州、或廣州等地，必有不少人士志願負笈留學本校。臺灣與對岸這些地方，生活程度相近，要留學時也不必付出太大的費用。⁵⁴

由此可以發現，山口秀高早有招攬中國留學生的打算，不過在 1915 年特設科成立之前，即有許連成（1901 年入學，第五屆）、王兆培（1910 年入學，第十四屆）兩名清國留學生；換言之，在特設科成立前，已有中國留學生進入就讀，既然如此，特設科成立的背景，可能與當時總督府的對岸政策有關。

1915 年，時任廈門旭瀛書院院長的岡本要八郎，向總督府學務部長隈本繁吉提出意見書，岡本認為，醫學與教育是日本在中國培植勢力的有效方式，也建議總督府在旭瀛書院設立具有醫科與商科的高等科，總督府若派遣技術高明的醫官前來主持，不僅能夠擔任高等科的教育工作，也能兼任當地日本醫院的院長，指導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開業。⁵⁵不過，這樣的構想直至 1918 年廈門博愛會醫院成立，才得以實現。

1915 年，總督府醫學校成立招收籍民與中國學生的特設科，在 1916 年 7 月份的《臺灣教育》裡，可以看到特設科的相關訊息：

（前略）臺灣醫學校，自前年特設醫學專科，收容支那人，或拘留籍民留學生，規定三個年畢業，誠為求學者之便也，前年本院三名，本年五名…（中

⁵⁴ 山口秀高主講、韓良俊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之由來以及將來之企望〉，《臺灣史料研究》第 8 期，（臺北，1996），頁 49-55。

⁵⁵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廈門一年間ノ所感ト卑見（旭瀛書院岡本要八郎），2414-2，頁 1-13。

略)…倘有志往臺灣醫學留學者，宜速到院報名，倘會員諸君，若有親戚朋友，亦可介紹，但學力需支那小學畢業以上之程度者，通學距遠者，本院有特設寄宿舍之便，特此佈聞。⁵⁶

亦即只要是畢業於中國的小學，就能夠報考特設科，總督府也鼓勵旭瀛書院的學生前來報考。特設科自 1915 年開辦，1919 年停辦，當時總督府醫學校 1915 至 1919 年的預科錄取率，分別為百分之八、八、九、十三、十，然而特設科的錄取率，據說為百分之二十五。依規定特設科僅允許籍民子弟與中國學生入學，但因錄取率高於本科不少，因此有家長甚至先將子女送入旭瀛書院就讀，再以籍民子弟的身份報考特設科。特設科開辦五年，一共培育 34 名醫師，其中來自臺灣者接近一半，有 15 名。⁵⁷

自特設科畢業的臺灣人，許多前往中國繼續深造或行醫，如呂耀唐、蘇永隆等人進入滿洲醫科大學就讀；曾曉、蘇福來、謝水双、翁滄海於廈門開業，黃丙丁於泉州開業。另外，陳昭宗、黃子正兩人分別任職於廈門博愛會醫院、福州博愛會醫院。⁵⁸

總督府成立特設科，一開始不是為了提供臺灣籍民的就學機會，或者是培育中國醫師、增進中國人民的福祉；總督府的真正目的，是以醫學教育的方式，培植親日的勢力。與在廈門成立醫學校相比，直接在總督府醫學校內成立特設科，並以較短的三年修業年限，較為優厚的全公費制度作為條件，招攬中國的留學生，似乎是較為快速、經濟的作法。

1919 年設立的熱帶醫學專攻科與研究科，則是因南進政策之故而增設，招收五年制醫學校畢業生。熱帶醫學專攻科為期一年，前後有畢業生二十名。研究科

⁵⁶ 〈旭瀛書院通信〉，《臺灣教育》169 號，大正 5 年 7 月。

⁵⁷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97-99。

⁵⁸ 在特設科第三屆的畢業生共有林伯輝、楊翰西、曾曉、蘇福來、黃丙丁、黃啓崇、謝水双七名，其中林伯輝的出身地，經查明為福建省連江縣鎮海小埕梅花村。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24），頁 146-14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242000（圖 35）、病院關係雜件／博愛病院關係（B-H-04-01-00-01-06-00-0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14700（圖 5）、在本邦特選留學生補給實施關係雜件／推薦關係 第二卷（B-H-05-03-00-01-02-0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為期三年，因年限較長而無人入學。⁵⁹

特設科與熱帶醫學專攻科、研究科的成立，乃因殖民政策導向之故，主要不在於提供臺灣人求學的機會，總督府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對於臺灣人而言，總督府醫學校本身入學不易，而且除了總督府醫學校之外，島內也沒有其他的醫學校可供選擇。殖民地的教育政策與學制對臺人處處制限，即便 1922 年制定臺灣教育令，揭櫫「日臺共學」的方針，也不見臺人的入學名額增加。

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人在島內的習醫機會，可以說是僧多粥少。因此經濟寬裕者，多半會以「留學」的方式，以謀求更好的教育機會，在這同時，也有不少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醫師有意至海外進修。這些有意習醫、再進修的學生與醫師，以前往日本內地為主，從時間上來看，人數更是逐年成長；留學日本的臺灣學生當中，習醫的比率甚至曾高達五成六。⁶⁰

除了直接進入醫學專門學校、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者，也有父母先安排子女進入日本內地的中學校就讀，畢業後直接參加各醫學專門學校、各大學醫學部的考試。以宜蘭的陳土金醫師為例，陳醫師先後將四個兒子送往東京的獨逸學協會中學校就讀，在此之後，長男陳長炫考上九州齒科醫學專門學校，次男陳鎮榕考上日本大學齒學部，⁶¹陳土金醫師家族的例子，反映了當時臺灣人求學策略的演變。

總之，日本對臺灣衛生的改造，連帶地改變了社會對於醫師的觀感，醫師的高收入、高社經地位成為許多人欽羨的職業，面對臺灣島內僧多粥少的習醫機會，臺灣人開始前往海外尋求機會。另一方面，在總督府訂定證照制度後，臺灣社會上各種的醫療行為，逐漸受到法律規範，在證照制度下無法生存的無照醫師，開始向外尋求發展的機會。

相對的，公共衛生水準低落，開業資格限制寬鬆的中國，也成為一股拉力，

⁵⁹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頁 145-146。

⁶⁰ 陳三郎，〈日據時期臺灣的留日學生〉，頁 28-37、144。

⁶¹ 陳力航，〈陳以文先生訪問記錄〉，《宜蘭文獻雜誌》，87、88 期（宜蘭，2011），頁 137-168。

吸引著臺灣醫師的目光。



第三章 日本在中國的醫療事業與臺灣醫師的外放

第一節 日本在華的醫療事業

近代的「公共衛生」概念，在 19 世紀的中國，始終停留在萌芽階段。在 19 世紀來華歐美人士的回憶錄中，有關衛生環境惡劣的描述不勝枚舉，大體來說，歐美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城市的環境髒亂、民眾的衛生觀念不良；公共衛生與醫療水準的落後，給予列強以「醫療」作為培植勢力與傳教的機會。

19 世紀西方醫學在中國的發展，起初並非由政府發起，而是由東印度公司與教會主導，1820 年代起以華南為發源地，由下而上漸次的擴散至各地。1860 年代以前，教會的醫療事業成績斐然，醫師、醫療傳教士經營的醫院獲得中國民眾的信賴，1860 年代以後，藉由開港，西方醫學在臺灣落地生根；臺灣與廣州等較早開放的通商口岸相較，並不是最先接受西方醫學的地方，教會與傳教士在臺灣從事的醫療行為，對當時的臺灣社會影響有限。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接受來自殖民母國的衛生改造，衛生環境、防疫、醫事教育發展的程度，逐漸與對岸的中國產生距離。雖然清廷在執政的最後幾年，曾由上而下進行衛生方面的改革，但是推行的力道，遠不及於擁有近代國家權力、亟欲穩定統治的臺灣總督府。

1901 年，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提出許多改革方案，並得到清廷的同意，⁶²劉坤一與張之洞的新政改革意見當中，有關醫學的部分，除了強調醫學重要性之外，也主張醫制的改良。⁶³

光緒年間，江寧府知府柯逢時與兩江總督端方都曾經進行中西醫的考試，不過，柯逢時的醫師考試，隨著他的去職而停止；端方的醫師考試則被認為是中國

⁶² 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編著，《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1998），頁 6-8。

⁶³ 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128。

醫師資格認證、執業試驗的濫觴。⁶⁴柯逢時與端方的醫師試驗，雖然代表了清廷對於中、西醫規範的嘗試，但是卻受限於時空環境而未能普及。

1905年清廷在新成立的巡警部下設警保司，警保司又分三科，其中的衛生科負責審核醫學堂設置、醫生執照，相關的衛生事務由此科負責，此「巡警部衛生科」，為中國史上第一個以「衛生」命名，專門職掌公衛事務的政府機關。衛生科為草創的中央單位，其運作的成效、布達的範圍似乎也有限，即便清廷瓦解，進入民國時期，公共衛生的發展雖然有所進展，但是與臺灣相較，仍屬於落後的狀態。

另外，19世紀由英、美教會所主導的醫療事業，在進入20世紀以後也有了變化，這樣的改變，來自於日本的崛起。1902年成立的同仁會、1917年成立的廈門博愛會，皆為日本在華醫療事業的代表性團體。

1902年「同仁會」在東京成立。同仁會的目的在於增進中國、亞洲各國的醫藥發達與普及醫療技術；該會的組織乃來自於「東亞同文醫會」與「亞細亞醫會」兩會的合併。在說明同仁會的組織之前，首先針對「東亞同文醫會」與「亞細亞醫會」這兩個組織加以說明。

成立於1902年初的東亞同文醫會，成員多來自東亞同文會，如近衛篤磨公爵、長岡護美子爵，以及醫學界的片山國嘉、北里柴三郎、岸田吟香等人。⁶⁵其中北里柴三郎、片山國嘉等人，也另外與高木友枝、藤井覺一等人組成亞細亞醫會，並有意擴張東亞同文醫會的組織。

1902年3月17日在大日本私立衛生會所召開的協議會中，東亞同文醫會、亞細亞醫學會決定合併，新的組織定名為「同仁會」。該會的成員主要是政治界的近衛篤磨、長岡護美與醫學界的北里柴三郎、片山國嘉等人，這些同仁會的領導階層與東亞同文會有所關連，同仁會實際上也是東亞同文會之下的組織。

⁶⁴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7），頁217-218；龐京周，〈上海近十年來醫藥鳥瞰〉，《申報》，1933年6月12日，第3版。

⁶⁵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32），頁1。

東亞同文會的成立，與 1870 年代以降日本的大陸政策有關，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後，對鄰近的中國即懷有野心，對此，日本人紛紛組成社團研究中國問題，並作為雙方交流的媒介，這些團體歷經多次改名與整併，最後由東亞同文會所統轄。

1898 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會，也是由「東亞會」與「同文會」整併而來，然而兩會的方針略有不同，兩會合併之後，東亞同文會也是以同文會的方針為主。⁶⁶同文會主張成立啟發中國人的團體，亦即在華發展文化事業，這樣的方針，也影響東亞同文會以及同仁會的發展。

1902 年 6 月同仁會舉行成立大會，推舉長岡護美為首任會長，1902 年 9 月經會員們決議，將組織變更為財團法人，日本政府也於翌年 2 月通過同仁會成為財團法人的要求。⁶⁷

同仁會的經費，最初主要以募捐的方式籌措，日本政府另外會在一般會計項提供部分補助，爾後成立對支文化事務局，由對華文化事業經費項下補助該會經費，而對華文化事業經費的來源，有部分為「庚子賠款」。⁶⁸

1904-1912 年間，同仁會先後派遣 329 名醫師前往海外，其中以中國、朝鮮為主，少部分前往南洋。派往中國的醫師共有 123 名，大多分散於東北、華北、華中地區，少部分前往廣東、福建地區；亦即 1900 年代，同仁會雖然有派遣醫師至華南、南洋一帶，不過事業的重心，仍集中在華中以北。⁶⁹

1905 年 9 月日俄兩國簽署《樸資茅斯和約》，俄國承認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並讓出大連、旅順、南滿鐵路，日本與清廷於 12 月底訂定《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取得上述地區的所有權益，⁷⁰1906 年先後成立關東都督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1900 年代，同仁會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朝鮮與東北，如 1905-1907 年間，即

⁶⁶ 東亞同文會編著，《對支回顧錄上卷》（東京：原書房，1981），675-684。

⁶⁷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頁 2。

⁶⁸ 黃福慶，《近代是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專刊（45），1982），頁 69-74。

⁶⁹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頁 59-62。

⁷⁰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上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頁 399-403。

先後於朝鮮的平壤、大邱，中國東北的營口、安東成立醫院。⁷¹不過，1910 年日本併吞朝鮮，同仁會將朝鮮的醫院交由朝鮮總督府管理，東北的安東醫院、營口醫院，也先後於 1910、1912 年由南滿洲鐵道會社接手；亦即 1910 年代，同仁會的事業重心開始有南移的傾向。1911 年在武昌起義爆發的同時，同仁會派遣救護隊前往華中、華南，⁷²1914-1925 年間，同仁會也先後於北京、漢口、濟南成立醫院。然而，華北、華中各地的同仁會醫院，其經營狀況受時局影響甚深，中日之間的衝突姑且不談，即便是軍閥之間的爭鬥，對於醫院的經營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設立醫學校方面，1906 年東京同仁醫藥學校成立，此校專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目的在於培育有志成為醫師、軍醫、藥師的中國學生，日後成為同仁會事業的助力，不過 1911 年即停辦，東京同仁醫藥學校停辦的原因，主要開支過於龐大，導致入不敷出有關。⁷³1924 年，同仁會成立青島醫學校，該校受限於經費因素，加以國民黨於 1926 至 1928 年間進行北伐，動盪的時局直接影響該校的招生狀況，因此不得不於 1930 年停辦。⁷⁴

總之進入 1910 年代，東北地區的醫療事業由南滿洲鐵道會社經營，華北、華中地區的醫療事業由同仁會經營，當同仁會的勢力在華北、華中逐步發展時，華南也成立了代表臺灣總督府的博愛會醫院，博愛會醫院，可說是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的具體成果，所謂的「對岸政策」，可以說是「總督府版本的大陸政策」，隨著日本取得臺灣，對岸政策也逐漸萌芽。

1896 年，桂太郎擔任臺灣總督期間，已主張在福建培植親日勢力。不過，桂在臺灣停留的時間半年不到，旋即返日就任陸軍大臣，因此對岸政策的運作直至兒玉、後藤主政時期才正式啟動。⁷⁵

⁷¹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32），頁 201。

⁷²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頁 57-194。

⁷³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頁 69-74、115-116。

⁷⁴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頁 154-155。

⁷⁵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頁 40-60。

1898 年清廷默許日本提出的「福建省不割讓」要求，⁷⁶等於承認福建為日本之勢力範圍。1900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趁八國聯軍之際，以廈門的本願寺被焚為藉口，出兵廈門；日本此舉原本獲得中央的支持，不過行動卻引來英、美的反對，最後以失敗收場，此即「廈門事件」的來由。

「福建不割讓」與「廈門事件」，引起中國人的仇日情緒與恐慌，惟恐日本佔領福建。然而歷經「廈門事件」的挫折，臺灣總督府不得不重新檢討對岸政策，並且修正施行的方針。身為主導者的兒玉總督，在廈門事件後談道：

以對閩粵之經營而言，在於將勢力潛伏於國際視聽的注目之外，以獲取利益。

兒玉這段話，反映總督府在面臨挫折以後，企圖轉而以和平、非武力的方式，扶植親日勢力，收攬民心。⁷⁷設立醫院的構想，也在此時出現，不過，成立醫院所費不貲，即便總督府同意，也無法即刻實行。

雖然在 1900 年代，總督府即有在對岸成立醫院的構想，但是因為經費問題而擱置，不過進入 1910 年代之後，在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兩任總督積極推動南進政策下，臺灣也成為日本帝國南進的基地，此即「大正南進期」。與明治時期的不同之處在於，明治時期是以華南地區為主，大正時期的南進政策，則擴張至南洋，⁷⁸總督府針對華南，以學校、醫院、報社「三本柱」為文化事業的重點項目，⁷⁹其中「醫療」也是總督府極為重視的一環；因此 1900 年代，因經費問題而擱置的醫院構想，進入大正南進期後，開始有了轉機。

1915 年 10 月民政長官內田嘉吉離職，由下村宏繼任。在對華南的態度上，下村基本上承襲兒玉、後藤的方針，同時也主張成立中日合作的財團法人，並由此團體負責在華南經營醫院，這個財團法人就是博愛會；由博愛會所經營的醫院，

⁷⁶ 日本所提的「福建不割讓」，真正的用意在於方便日本染指福建省。詳見《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頁 51-61。

⁷⁷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頁 98-99。

⁷⁸ 中村孝志，〈「大正南進期」と臺灣〉，《南方文化》第八輯（奈良，1981），頁 209-217。

⁷⁹ 「三本柱」一詞，乃中村孝志所提出。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頁 153。

稱為博愛會醫院。

1917 年廈門博愛會首先成立，翌年，廈門博愛會醫院也正式開院，其後 1918-1924 年間，總督府先後於福州、廣州、汕頭成立博愛會醫院；各地的博愛會成員主要以日、臺、中三方人士為主，此舉意義在於拉攏中方有力人士的參與，以降低中國民眾的戒心，從而掩蓋總督府真正的意圖。以廈門博愛會為例，成員當中，中方代表佔有三分之一，福州、廣州、汕頭，也是以類似的模式進行。

由日、臺、中人士組成的博愛會，表面看似由日中合辦，實際上無論人事、設備、補助，主要是由總督府所提供，⁸⁰總督府的文化事業補助金，也大多用以補助博愛會醫院。即便外務省與各地領事在博愛會的成立與補助的事項上，有一定的干涉權力，⁸¹但各地博愛會醫院的人事，卻不能不依賴臺灣總督府的支援，博愛會醫院成立初期，院內的醫師多由總督府派遣，因此總督府與博愛會的關係，不只補助，也支援醫療人才。

廈門、福州、廣州、汕頭在清代已是重要的商港，對外開放甚早，鴉片戰爭前，廣州甚至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這些城市，遲至 1860 年代已全部開港，因此在博愛會醫院成立之時，西方醫學至少已傳入這些城市半個世紀之久，並已落地生根。這些城市內由西洋醫師、中國醫師經營的醫院與診所，規模大多不大，因此對於這些城市而言，博愛會醫院的成立，也為當地的醫療生態帶來威脅，如廈門當地英美系統醫院的醫師，在得知廈門將成立日中兩國合資的醫院後，便發起反對的運動。⁸²

博愛會與同仁會這兩個團體，雖然成立的背景、成員組成、活動範圍皆有所不同，但是它們卻同樣以「醫療」作為培植親日勢力的方式。這兩個團體相較之下，同仁會與東亞同文會有所關連，成立時間較早，成員多為日本中央政界、醫

⁸⁰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南投：臺灣文獻館，2009），頁 55-80。

⁸¹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頁 55-80。

⁸² 中村孝志，〈廈門及び福州博愛会医院の成立—臺灣總督府の文化工作—〉，《南方文化》第 15 輯（奈良，1988），頁 10-12。

界的人物，所接受的補助也大多直接來自日本政府。

直至 1930 年代末期，接收博愛會海南島支部之前，同仁會勢力範圍仍以華北、華中為主。然而同仁會並不是沒有向南擴張的打算，1924 年，同仁會曾在臺灣設立支部，由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擔任支部長，幾位總督府的官員也出任支部的幹部。不過華南各地在博愛會的經營之下，同仁會能夠涉足的餘地有限，因此臺灣支部也被批評為「有名無實的臺灣支部」。⁸³

同仁會與日本中央淵源較深，與臺灣的關係，反而沒有博愛會來的密切，但少數臺灣醫師如謝唐山等人，也曾經由引介進入同仁會的醫院任職。相對的，博愛會的成立背景，則與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有關，博愛會招攬中國人士作為發起人，以降低中國民眾對博愛會醫院的疑慮，雙方也得以合資的方式經營醫院。由於博愛會自始即為臺灣總督府所主導的組織，在對岸政策的脈絡下，活動的地點自然以華南沿海的重要城市為主。

同仁會與博愛會的活動，代表日本大陸政策在中國的開展，自 1900 年代同仁會、1910 年代的博愛會開始，日本醫學的影響力，經由文化事業的活動，逐漸呈現輻射式的擴散；而在總督府強力執行衛生政策之下，醫療衛生水準提升的臺灣，也成為一股支援日本在華醫療事業的助力。

博愛會與同仁會醫院的成立，創造許多的職缺，對於在臺灣島內的臺灣醫師來說，無疑也是另一條出路。此外這兩個團體在中國成立的醫學校，也成為有志習醫的臺灣青年，在參加總督府醫學校的考試以及留學日本之外的選擇。

臺灣與華南的往來向來密切，華南也是許多漢人的原鄉地，部分地區不僅語言相通，生活習俗也相近。即使在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這樣的關係也不因政治因素全然斷裂，語言、習俗等文化連帶也成為影響臺灣人流動的因素，加以博愛會與臺灣總督府有所關聯，活動範圍為華南，自始即有不少臺灣醫師在各地博愛會醫院任職。

至於華北、東北地區，清代雖然也與臺灣有所往來，若與一水之隔的華南相

⁸³ 拓殖通信社，《同仁會と南支経営・臺灣議會請願の經過》（東京：拓殖通信社，1926），頁 1-7。

較，相對疏遠。進入日治時期以後，對於與臺灣距離較遠的華中、華北，甚至是東北地區，必須要有特定的因素，如任職、就學的機會，才會驅使臺灣人前往這些距臺較遠、語言風俗相差較大的地區。對於臺灣而言，同仁會雖然成立較早，但是因為活動範圍偏北，因此早期前往同仁會創辦的醫院、醫學校求職、求學者，少於華南。

第二節 華南的臺灣醫師與博愛會

一、日治時期臺灣與華南的往來

日治初期，臺灣與華南往來，雖然受到旅券制度的管制，但兩地長久以來的互動，沒有因此終結，臺灣人在中國分佈的數量，也以華南居多；⁸⁴在華南的臺灣人，其身份也因具有日本國籍，成為擁有諸多特權的「臺灣籍民」。其中，廈門聚集最多的臺灣籍民，1899-1926年間，臺灣人出國的目的地，也是以廈門為主，其次為福州、汕頭、香港、廣州，人數也與廈門有所差距。根據許雪姬的研究，臺灣人前往華南，主要有求學、求職、經營事業、不滿日本的殖民統治、能夠享有特權等原因；⁸⁵鍾淑敏認為，廈門在華南的城市當中，與臺灣的語言、原鄉的隔閡較少，因此聚集較多的臺灣籍民。⁸⁶

受此影響，臺灣醫師在華南的分布，也集中於廈門、福州、汕頭、廣州等地，雖然也有臺灣醫師的蹤跡，但是與廈門相比，人數上仍有一段差距。

二、臺灣醫師在華南的資格問題

臺灣醫師若前往華南開業，必須面臨外地執業資格的問題，海外執業資格的申請有一定的程序，撇開無照醫師不談，早期前往華南的臺灣醫師，多係當地日本醫院或者是由籍民團體所招聘。醫師必須獲得總督府的允許，或通過限地醫考

⁸⁴ 本文的「華南」，主要指福建與廣東兩省，不包括上海。

⁸⁵ 許雪姬，〈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頁 370-374。

⁸⁶ 鍾淑敏，〈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頁 408-411。

試，才能獲得海外開業的執照。⁸⁷不過，對於開業的資格限制不高、醫療需求大的地區，即使是無照醫師也有不小的發展空間，換言之，總督府對臺灣醫師前往海外開業的資格，已有一定的申請程序與規範，但是即使不按照正常程序申請執照，在華南仍然能夠執業；開業限制低、醫療需求大，其實也反映華南與臺灣在衛生方面的差異。

進入民國時期，華南地區出現相關的資格規定，如 1916 年 7 月，廈門警察廳的《醫師試驗規則》，藉由測驗的方式，審定醫師的資格，不及格者必須停止執業，臺灣醫師也適用這條規則。⁸⁸實施的結果無從得知，但由於時局不穩，即便制定規則，未必能落實。

1910 年代的華南，能夠有效、徹底的管控醫療行為的醫師法，可以說幾乎不存在，進入 1920 年代，這樣的情形仍然沒有改善，1923 年，廣州軍政府的《管理醫生暫行規則》規定，外國醫師擁有該國的開業許可證，並經外交部證明，即可領取許可證。《管理醫生暫行規則》中，比較特殊的地方在於，本國人只要在公立醫院擔任醫員三年以上，有實績與證明文件，或是擁有醫療知識，在本規則施行前，已行醫五年以上，有確實證明，並有三位醫師作保者，也具有開業資格。⁸⁹與同時期的臺灣，只有出身被認可的醫學院校，或是通過醫師考試者才有資格的情況相比，南方政府的醫師資格則相對寬鬆。

1927 年，國民政府在內政部下設衛生司，1928 年改名為衛生部，1929 年 1 月，衛生部頒布《醫師暫行條例》，此條例明確定義醫師資格，並照會各國領事。本條例對於開業資格的規定，在規範上較為嚴謹，外國醫師資格的部分不變，但若非國內外經認可的醫學院校畢業，或是通過國內外的醫師考試者，則不具有開業資格。⁹⁰

外籍醫師的領證程序為：先呈交相關證明文件給該國領事館，取得證明書後，

⁸⁷ 李騰嶽，《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衛生篇（一）》（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3），頁 36-37。

⁸⁸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41648300，（圖 15-16）、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B-1-5-3-06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⁸⁹ 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 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9），頁 167-168。

⁹⁰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頁 293-294。

連同履歷書一份、兩吋照片兩張、印花稅，交予當地衛生局；如果沒有衛生局，公安局或縣市政府也可，這些機關轉報內政部，後由衛生署發給證書。1930年5月《西醫條例》公布，其中有關醫師資格的規定，與前一年公布的《醫師暫行條例》幾乎相同，因此《醫師暫行條例》可以說是《西醫條例》的前身。⁹¹

不過這些條例與規定，對於無照執業的臺灣醫師來說，似乎不太有約束力。以廈門為例，1930年11月，日本領事寺島廣文在報告書中提到，廈門的臺灣醫師有60名，有17名醫師領有執照，經營診所、任職於醫院，另外43名醫師則不具執照。寺島領事也針對無照的臺灣醫師，與外務省進行商議，⁹²商議的結果，礙於資料上的限制，無法得知詳細的內容；不過有關醫師執照的規則頒佈後，無照臺灣醫師的數量並沒有大幅減少，此也許與當地政府執法不力，或者是無法有效地取締具有臺灣籍民身分的臺灣醫師有關。

對於正規醫學教育出身、有意前往海外的醫師，華南也是目的地之一。這些醫師大多能夠取得總督府的海外開業執照，他們前往海外的動機，往往不是因為在臺灣無法取得執照所致，可能與其他的因素，例如薪水的高低，或者是因故無法在臺灣開業等等。

以臺中州出身的謝清海為例，謝清海1913年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先是在中部地方開業，由於品性端正，因而博得當地民眾的信賴。其後，謝清海卻因故失信於民眾，來院的病患逐漸減少，加以債臺高築，因此於1914年10月向總督府申請海外開業許可證，有意前往廈門發展。⁹³不過，由於謝清海畢業未滿五年，依《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第十四條規定：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在畢業五年內必須從事臺灣總督府所指定的職務，但總督府方面認為謝清海的情形特殊，也同意核發海外開業執照。⁹⁴由此可知，因為在臺灣無法生存，而前往海外開業的

⁹¹ 小野得一郎，《中華民國醫事綜覽》（東京：同仁會，1935），頁28-30。

⁹²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774700，（圖2-4）、各国ニ於ケル医学及医術關係雜件／中国ノ部（I-3-3-1-01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⁹³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謝清海廈門ニ於テ醫術開業許可，（2242-20），頁1-4。

⁹⁴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臺灣總督府府報》，明治32年7月7日府令第五十四號。

醫師，並不只有無照或執照被收回者，部分正規醫學教育出身的醫師，也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促使他們轉換環境。對於在臺開業成績不佳的謝清海而言，前往廈門發展，也是改善經濟、擺脫負債的機會。⁹⁵

總之，華南地區雖然先後出現許多規範醫師資格的規則，但是可能由於政府態度與籍民身份的保障，這些規則並沒有徹底執行。公權力不張，無照的醫師能夠持續執業，甚至獲得不錯的收入，對於在臺灣無法取得開業執照者，自然有其吸引力。

三、臺灣醫師前往華南的主要原因

臺灣醫師前往華南的原因，主要可分就職與求職、習醫；就職指的是直接去官立或私立醫院任職，求職指的是自行開業。

（一）就職與求職：在華南的日本人與臺灣籍民，所成立的醫院需要醫師的進駐，因此許多臺灣醫師應聘或是奉派前往這些醫院。臺灣總督府以提高薪資的方式，鼓勵臺灣醫師前往對岸任職，⁹⁶爾後各地的博愛會醫院先後成立，許多臺灣醫師也前往華南各地的博愛會醫院任職。原先在府立醫院的臺灣醫師，薪水、地位皆不如日人，前往華南之後，在薪水方面可獲得較為優厚的待遇。

另外，在華南自行經營診所的醫師也不在少數；不具有或者是無法取得在臺灣或海外其他地區開業資格者，也會選擇前往距離教近、開業限制低、醫療需求大的華南執業。

（二）習醫：由於臺灣島內醫學校入學不易，負笈日本內地所費不貲，因此臺灣人無不尋求入學相對容易、花費相對便宜的升學機會。對於經濟較不寬裕，但是卻懷抱留學夢想的臺灣子弟而言，在華南的醫事教育機構，也成為臺灣人負笈海外的選擇之一。其中，由日本所創辦的醫學校，與當地學生相比，臺灣學生

⁹⁵ 謝清海前往廈門後的情形，礙於資料而無法得知，但在 1917 年 4 月 19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了謝清海自殺未遂的消息，詳見《臺灣日日新報》第 6036 號，大正 6 年 4 月 19 日，第七版「醫師の自殺未遂」。

⁹⁶ 林吉崇，《景福札記》（臺北：作者自刊，2004），頁 175。

不僅入學相對容易，在語文方面也有優勢。⁹⁷

不過相較之下，醫師前往華南就職、求職的人數似乎較多，而負笈外地的臺灣人，多以選擇日本創辦的醫學校與醫事教育機構者為主。在華南地區，僅福州博愛會醫院與廈門博愛會醫院曾於 1922、1924 年，先後成立醫學講習所、博愛醫學校，而且兩者皆因經費的問題，被迫先後於 1925、1928 年關閉，僅成立不到五年的時間。博愛醫學校一共有 67 名畢業生，目前已知有 21 名的臺灣學生，⁹⁸這些在異地培養的臺灣醫師，大多留在廈門或是前往華南各地執業。

臺灣醫師前往華南「就職」者，大多以總督府醫學校或日本內地的醫學校出身為主，以廈門為例，1910 年左右，總督府醫學校出身的醫師即應聘前往廈門的醫院任職；華南的各博愛會醫院成立以後，前往各院支援的臺灣醫師，早期也以總督府醫學校、日本內地醫學校畢業者為主，其後則部分摻雜博愛醫學校的臺籍畢業生。這樣的情況，可能與接受官方醫學教育出身者，較受官方與民間信賴所致，他們大部分也同時領有領事館所核發的海外開業執照，這些醫師憑藉著所學，即使自行開業，也很受當地民眾信賴。

若是「求職」的情況，出身背景則相對多元，以自行開業的醫師為例，除了正規醫學教育出身、具有合法資格的醫師以外，不具有在臺灣執業的資格，或是無法取得總督府海外執業資格的醫師的人數不少，這些醫師的背景可能是中醫、醫學校中途輟學或曾擔任醫師的助手等，雖然不具有正式的資格，但是在醫療需求大、醫師資格規定寬鬆的華南，還是能夠生存，以廈門為例，依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記載：

即以臺灣一方面而言。自改隸後。醫士之來廈營業者。年有增加。試舉其

⁹⁷ 1910 年代成立的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乃是在中國招生，然後在臺上課。與博愛醫學校在廈門上課的情況有所不同。

⁹⁸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頁 14、31、33、56、101、120、148、152、229、250、275、309；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頁 92、282、287；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論文集》，頁 41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5016194400，（圖 40、92）、參考資料關係雜件／支那各地博愛病院關係（B-H-07-02-00-04-0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著名者而言之。西醫如蔡世興、蔡章勝、莊天能、陳恩張等。間惟二蔡惟應聘醫院外。余皆自立一幟。漢醫如曾宗瀛、張宗足、傅宗城等。開設藥舖者。此外其有寂寂無聞者。尚不知凡幾。又業牙醫者。亦有數氏。如張有枝。莊火爐。徐愚山等。皆來自臺灣者。諸氏在廈之營業。頗行好況。雖由個人具有藝學。足以樹立。然亦見廈埠醫界之可以托足也。或曰廈地邇來人口。日有增加。故醫藥業務。亦隨之暢旺。此其信歟。⁹⁹

也就是說 1911 年的廈門，已聚集許多臺灣醫師，上述沒有提到實際的醫師人數與來廈時間，但 1911 年的廈門，光著名的臺灣醫師已有十多人，實際的臺灣醫師人數應在此之上；這些醫師同時抵達廈門的可能性並不高，應是先後抵達廈門，可能早在 1900 年代後期，已於廈門執業，其中，蔡世興與蔡章勝出身總督府醫學校。

蔡世興為總督府醫學校第六屆畢業生，1910 年前往博愛醫院任職，¹⁰⁰其後長期停留廈門，經營「世興博愛醫院」，醫術為當地民眾所信賴；¹⁰¹蔡章勝為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畢業生，1911 年應聘前往廈門，任職於臺灣籍民汪子春與他人合夥成立的醫院。¹⁰²在「二蔡」之後，前往廈門的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還有第六屆的王震謙、第十二屆的林家東等人。¹⁰³

除了廈門之外，鄰近的漳州、泉州，也有醫師前往開業。至於其他地區，相對於廈門而言，臺灣醫師人數較少，不過在博愛會醫院成立之前，也有零星數名醫師前往華南的其他城市。如 1914 年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張瑞鳳（第八屆）前往福州，福州的臺灣醫師較少，早期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的醫師亦僅張氏一人。即便前往其他地區的臺灣醫師較少，但在各地籍民的職業比當中，醫師這個職業，也

⁹⁹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071 號，明治 44 年，9 月 23 日，第三版「臺醫紛集」。

¹⁰⁰ 此「博愛醫院」與「博愛會醫院」不同，博愛醫院成立於 1907 年，出資者為愛久澤直哉的三五公司。雖然名為醫院，但是醫師流動率高、規模不大，現有的醫師僅蔡世興及另一名日籍的人倉榮暉兩人。許多史料當中常以博愛醫院代表博愛會醫院，容易產生混淆。詳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583 號，明治 43 年 4 月 9 日，第四版「醫院得人」。

¹⁰¹ 《臺灣日日新報》第 4456 號，大正元年 10 月 27 日，第 6 版「廈門通信 臺灣人之獲舉者」；吳雅純編，《廈門大觀》（出版地不詳：出版項不詳，1947），頁 135。

¹⁰²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996 號，明治 44 年 7 月 9 日，第三版「公立醫院」。

¹⁰³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24），頁 131-145。

佔有一定的比例。¹⁰⁴

1918 年至 1924 年間，臺灣總督府先後在華南各地成立博愛會醫院，1918 年廈門博愛會醫院最先成立，其次為福州、廣東、汕頭；博愛會醫院的成立，具有強化臺灣醫師與華南關係的作用，也提供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日本內地醫學校畢業生的就職機會；另一方面也反映臺灣出身的醫療人才，已成為博愛會醫院各分科運作上的助力。博愛會醫院的成立，加強了臺灣醫師「臺灣—華南」的流動走向。

1918 年成立的廈門博愛會醫院，院內一開始分為內科、外科、眼科、皮膚科四科，共有十名醫師，除了擔任各科醫長的四名日本醫師外，其餘六名醫師為林振聲、王劉銅鐘、黃國材、劉壽祺、陳昭宗、賴和，¹⁰⁵皆為總督府醫學校、新潟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的臺灣醫師，這樣的編制規模大過於同時期廈門當地的任何醫院。

即便這些醫師離開博愛會醫院，在廈門當地開業，也會與博愛會醫院維持聯繫。另外，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同在廈門執業的醫師，還有程水源、陳春木、陳信、游溪連、鄭木生、翁俊明、陳有年、林維馨、詹東壁。¹⁰⁶

福州、廣州、汕頭，雖然臺灣人較少，博愛會的組織以日、中雙方的人士為主，不過仍有臺灣醫師前往任職，其中屏東出身的吳克己，先後任職於福州、汕頭博愛會醫院，並曾任汕頭博愛會醫院外科醫長一職，¹⁰⁷直至 1938 年賴尚和擔任樂生療養院的醫長為止，在臺灣島內的官立醫院擔任醫長者，絕大多數為日籍醫師，臺灣醫師在臺灣島內昇任醫長的情況，可謂鳳毛麟角，然而早在 1920 年代後半，吳克己卻已昇任外科醫長。其後，在博愛會系統的醫院擔任醫長的臺灣醫師，還有鄭德和與魏火曜。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相較於任職島內官立醫院的醫師，任職海外日本醫院的醫師較有晉升的機會。

¹⁰⁴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頁 124-126、128、131-132。

¹⁰⁵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17 卷 188 期，大正 7 年，頁 712。

¹⁰⁶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17 卷 188 期，大正 7 年，頁 712。

¹⁰⁷ 詳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0382 號，昭和 4 年 3 月 15 日，第四版「屏東街出身者。臺灣總督府技師汕頭博愛會醫院外科醫長從七位醫學士吳克己氏」；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24），頁 131-145。

四、廈門的醫師團體

1910 年代，隨著在廈門的臺灣醫師逐漸增加，許多醫師團體也應運而生，如博愛醫院日本國籍醫藥懇談會、總督府醫學校校友會、博愛會醫院內的雜誌抄讀會、廈門醫學會、閩南醫藥學會等。扣除同窗會性質的總督府醫學校校友會，這些團體的性質大致為醫藥專業的交流，以下由成立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評介。

1911 年 12 月，在廈門當地臺、日醫藥從業人員增加的背景下，「日本國籍醫藥懇談會」成立，該會的宗旨為互相交流、增進醫術。「日本國籍醫藥懇談會」一個月集會一次，成員主要以廈門的臺灣醫師與日本醫師為主，雖名為日本國籍，但此會亦有開放非日本籍醫藥從業人員參與的打算。¹⁰⁸

由於博愛會醫院的成立，前來就職的臺、日醫師增加，院內醫師們為彼此交流而成立數個醫師團體，如雜誌抄讀會、廈門醫學會、閩南醫藥學會等，以及由總督府醫學校出身的醫師所組成的校友會。

1918 年 5 月，雜誌抄讀會成立，目的在於「新知的交換」，成員主要為院內的醫師，爾後亦有美國教會醫院的醫師參加。抄讀會的形式為，每次由三名左右醫師進行演講，¹⁰⁹同月，15 名總督府醫學校出身的醫師在廈門市內集會，為校友會分部的成立做準備，同年 10 月，總督府醫學校校友會廈門分部成立，此為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個海外校友會支部。¹¹⁰與其他的醫師團體不同之處在於，校友會為聯誼性質，且具有封閉性，不過校友會分部成立的意義，表示廈門為總督府醫學校醫師前往海外的重要據點。總督府醫學校校友會，雖然不能完全視為博愛會醫院院內的團體，但是在廈門，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的醫師，不是任職於院內，就是與博愛會醫院有密切的互動，在此情況下，實與博愛會醫院院內的醫師團體無異，只是性質有所不同。¹¹¹

同年 8 月，在「將廈門地方在住官民醫家的匯集於一堂的時機已成熟」的情

¹⁰⁸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10 卷 99 期，明治 44 年，頁 84-86。

¹⁰⁹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17 卷 188 期，大正 7 年，頁 712；〈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33 卷 350 期，昭和 9 年，頁 898。

¹¹⁰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17 卷 193 期，大正 7 年，頁 1049。

¹¹¹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17 卷 188 期，大正 7 年，頁 712。

況，廈門醫學會應運而生。此會由時任院長的右田吉人兼任，宗旨在於「統一地方的醫界與開創醫學啟發之端緒」，然而此會運作模式與雜誌抄讀會類似，皆由醫師們輪番進行專題報告，但是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廈門醫學會規模較大，除了成員的發表外，不時也會邀請來賓前來演講，¹¹²這是兩會稍有不同之處。

1934年，「閩南醫藥學會」成立，為此廈門領事塚本毅向外務省申請五萬圓的經費補助，不過此要求並沒有獲得外務省同意。在塚本領事的報告當中，該會的成立背景，除了「以日本醫學為中心，圖日支之提攜」之外，也有「提高日本醫學權威的同時，掃除不純無免許醫的期待」，然而該會雖然標榜「醫藥的學術研究與改善公衛保健」，但真正的目的是「促進醫藥業者的相互協力」、「使支那人信賴日本醫術，有助於日支提攜」。

閩南醫藥學會的成員，以醫師、藥劑師、當地醫藥業者為主，會長由博愛會醫院的院長兼任，每年三、六、九、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召開會員研究發表會，第一個星期四則舉行抄讀會。¹¹³閩南醫藥學會則以醫院為中心，做為指導當地醫術與衛生事業的組織，此會形式與廈門醫學會、雜誌抄讀會類似，但規模更為宏大，交流性質濃厚，也常有日本內地的醫校教授前來演說。¹¹⁴

原則上，晚成立的廈門醫學會、閩南醫藥學會的組織與運作，較抄讀會、懇談會來的複雜與龐大，不過不論規模大小，這些團體的運作模式，多由醫師們進行報告，其中有許多前往博愛會醫院任職的臺灣醫師，在會上發表自己的研究，發表的內容，大部分以院患者作為對象，或是延續在前一個醫療機構的研究，參與的成員不限於臺、日醫師，也包含當地的中、美醫師與醫藥業者，具有交流的意味。顯然，醫師雖分別屬於不同系統的醫院，但醫師團體著實為當地的醫師間提供學術、技術交流的平臺，它們對親善是否發揮效果，礙於資料有限，目前仍無法得知效果為何，不過在醫師們至少在醫學專業的部份，能夠交換意見。

¹¹²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17卷191期，大正7年，頁882。

¹¹³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5015861300，（圖1-7）、助成費補助申請關係雜件第二卷（B-H-06-02-00-02-00-0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¹¹⁴ 〈廈門通信〉，《臺灣醫學會雜誌》第29卷298期，昭和5年，頁103。

除開廈門，其他地方的博愛會醫院也有醫師團體的存在，如廣東博愛會醫院內，也舉辦抄讀會，臺灣醫師也有應聘前往福州、廣東、汕頭博愛會醫院者。不過，由於這些地區與廈門的臺灣醫師人數相比，差距很大，加以各院的資料有限，因此，以下將以臺灣醫師人數最多的廈門作為探討對象。

五、臺灣醫師在華南的活動

前往華南的臺灣醫師，並不全然只在自己的診所，或者是受聘僱的醫院工作，部分醫師也會兼任日本在華機構、當地公家機關、學校的醫務工作。以相關經歷較豐的劉壽祺、李秉文、許恩錫為例，劉壽祺曾擔任旭瀛書院的校醫、日本領事館的醫務囑託、警察醫；¹¹⁵李墨（李秉文），曾任旭瀛書院校醫、中華小學校校醫、全閩新日報社社醫、廈門市市醫，本身為基督徒的他也致力於教會活動；¹¹⁶許恩錫曾任廈門地方法院醫官長達七年，其後轉任廈門臺灣居留民會會醫。¹¹⁷

部分醫師也會參與公共事務，例如參加臺灣居留民會，並擔任該會幹部醫師也不少。除此之外，參與政治活動、與中方過從甚密的醫師也大有人在，如曾慶福、黃煙篆、翁俊明等人。以下先後介紹這些人的生平事蹟。

（一）曾慶福

曾慶福出身屏東竹田，為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四屆畢業生，1917年前往廣東的陸軍醫院內科任職。曾慶福十分活躍，並跨足經營香蕉出口貿易，1934年前往上海投效國民政府，先後擔任第一區船舶管理處處長、第二區寧波船舶管理處處長。由於具有參加臺灣民眾黨等社會運動的經驗，因此被日本政府列為「要注意的臺人」，戰後曾慶福返回屏東開設長春醫院，曾任屏東市參議會參議員，以及麟洛鄉、鹽埔鄉衛生所主任。¹¹⁸

（二）黃煙篆

黃煙篆出身瑞芳，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四屆）後，曾先後擔任臺北、臺南

¹¹⁵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420。

¹¹⁶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43），頁441。

¹¹⁷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75。

¹¹⁸ 許雪姬，〈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頁369-403。

醫院的醫務助手，以及臺南北門嶼（今臺南市北門區）公醫。1916年前往中國，於孫傳芳麾下擔任軍醫，期間長達十五年，返臺後於基隆碳礦瑞芳醫務室服務，並出任地方公職，如庄協議會員、方面委員等。黃煙篆的長子黃子正，畢業自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日後前往滿洲，輾轉成為溥儀的私人醫師，次子黃子修也曾前往中國擔任軍醫。¹¹⁹

（三）翁俊明

翁俊明出身臺南，為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三屆畢業生。在醫學校時代即開始關心中國之政治情勢，不僅參加同學王兆培的同盟會在臺組織，也負責發展會務。1916年，翁俊明前往廈門，在廈門的翁氏，與總督府仍然保持聯繫，不僅自行開設俊明醫院，也擁有日本領事館核發的醫師執照，1918年廈門博愛會醫院成立，翁俊明也曾任職該院。儘管離開臺灣，翁俊明仍不時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醫學會雜誌》上，為文介紹廈門的衛生與傳染疾病。¹²⁰翁俊明也利用開業之便，與各行各業的人士交遊，並收集各種情報，以此周旋於南北軍之間。¹²¹換言之，翁俊明不只有和日本勢力所有互動，對於中國的政治活動也有所涉足。

其後，翁俊明前往上海成立俊明醫院。並聘請林安息、林錦生等醫師擔任醫務，翁俊明為求上海醫院的發展，向總督府提出意見書，表示「利用施以醫療作為以賦予親日的氛圍，雖然範圍不大，應可漸收其功效」，意思是，要促成日中親善，首要成立醫院，對於日本而言，翁俊明無疑是總督府的對岸政策中的協力者。對此，總督府專賣局長池田幸甚認為「如果能得到十名翁俊明，相信能夠獲得許多有趣的情報而活動」，池田甚至主張：應讓翁俊明在醫學校的畢業生當中，挑選具有「理解東亞共存之大義的志同道合者」，將其招至上海，並將翁俊明的醫院作

¹¹⁹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頁188-189。

¹²⁰ 《臺灣日日新報》第6658號，大正8年1月1日，第59版「廈門の傳染病」；《臺灣日日新報》第6891號，大正8年8月22日，第7版「廈門の虎疫」；《臺灣日日新報》第7029號，大正9年1月7日，第7版「昨年の衛生狀態」。

¹²¹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長池田幸甚文書》〈手記〉（2007C-1-6），頁11-13。

為情報機關利用。¹²²

翁俊明也在廈門與上海成立醫事教育機構，並跨足實業界，擔任樟腦局長。不過，中日戰爭爆發後，翁俊明決定入中國籍，並在香港組織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與日本勢力劃清界線。1943年，臺灣黨部遷至漳州，由翁俊明出任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也成立「中正醫院」，作為革命事業的掩護，不過同年卻因誤飲毒酒而驟逝。¹²³

第三節 同仁會的活動與臺灣醫師

1910年代，同仁會在東北的營口、安東兩院，轉由南滿洲鐵道會社經營，同仁會的事業重心也轉移至華北、華中。原先同仁會計畫自1918年起，至1927年為止的十年時間，在華北、華中等三十二個城市興建醫院，然而這個計畫並沒有實現，最後同仁會只成功在北京、漢口成立醫院，並接管青島、濟南醫院。¹²⁴相對於博愛會，同仁會不僅事業範圍偏北，與臺灣總督府的關係較為疏遠。

再者根據鍾淑敏的統計，七、八成的臺灣人，出國的目的地是華南地區，¹²⁵若沒有特殊因素，臺灣醫師在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與地緣因素的影響之下，自然以華南為首選，1910年代，臺灣醫師前往華中、華北、東北的人數，不如華南地區。

在華南以外的地區，臺灣醫師的分布，以上海、東北地區較多，由於上海乃是國際大都市，也吸引許多籍民前來發展，前往上海執業、習醫的臺灣人也不在少數。東北地區，則因1911年南滿醫學堂的成立，以及1922年代，滿洲醫科大學的出現，負笈東北行醫、習醫的臺灣人，逐漸增加。

至於其他的大城市，如天津、南京，並不是沒有臺灣醫師前往，只是數量不多，分布較為零星。

¹²² 林錦生與林安息皆為總督府醫學校出身的醫師，林錦生是第十五屆，林安息是第十七屆，參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24），頁138、140。

¹²³ 陳澤編，《臺灣先賢先烈傳 第三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180-200。

¹²⁴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頁79-86。

¹²⁵ 鍾淑敏，〈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頁408-411。

一、臺灣醫師在東北、華北、華中的開業資格問題

在這些地區當中，華中、華北的開業資格問題，與華南類似。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中、西醫的管理法令，因直奉戰爭爆發而未能實行，換言之，中央政府所制定的醫療法令，都會因為時局動亂而執行困難，¹²⁶地方的情況，自然也相去不遠。由於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中國形式上完成統一，1929年頒布的《醫師暫行條例》，也適用於華中、華北。

《醫師暫行條例》規定：

第三條 凡年二十歲以上，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呈請給予醫師證書：

- 一、在國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立私立醫學專門學校以上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 二、在外國官立或政府有案之私立醫學專門學校以上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或在國外政府領有醫師證書者。
- 三、外國人曾在各該國政府領有醫師證書，經外交部證明者。
- 四、經醫師考試及格領有證書者。¹²⁷

據此，出身正規的醫學院校、或是在臺灣領有執照的臺灣醫師，前往華中、華北，也能夠以畢業證書，或是臺灣總督府核發的醫師執照，向中國官方申請醫師執照。

然而，政局的不穩，也連帶影響法令的執行，因此不具有任何執照的臺灣醫師，在這些地區也能夠執業；不過與華南不同的是，這些地區不會有為數眾多的「臺灣無照醫師」。前面章節所談到的無照醫師，在前往海外執業時，由於這些地方距臺較遠，加以風俗民情也有所差異，多半不會是他們的「首選」，因此這些地區不會有廈門「無照執業醫師有數十名」的情況，受聘前往這些地區的醫師，大多為正規醫學教育體系出身，即便是自行經營診所的醫師，也大致如此。

東北的部分，臺灣醫師在關東州的開業資格，基本上適用1901年的《醫師取締規則》，1912年，臺灣總督府行文照會拓殖局總裁元田肇與關東都督民政長官白

¹²⁶ 朱潮，《中外醫學教育史》（上海：上海醫科大學，1988），頁83-86、95。

¹²⁷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頁293-294。

仁武，表示臺灣醫師在關東州的開業資格，以限地執業為限。¹²⁸

二、臺灣醫師前往東北、華北、華中的原因

1930年代以前，臺灣醫師前往這些地區的原因，仍以就職與求職、求學為主。

（一）就職：由於同仁會在1906至1925年間，先後在安東、營口、北京、漢口、青島、濟南設立醫院，這些醫院的成立，自然也增加臺灣醫師的海外任職機會。求職：部分醫師也會前往上海、南京、天津、東北地區發展。前往上海的有廖煥章、袁錦昌、陳震謙、黃國材，前往天津的有蘇維石、前往南京的有蘇樵山等人。¹²⁹在謝唐山之後，總督府醫學校出身、前往東北的醫師，有邱鳳儀、謝秋涓、謝秋濤、孫德芳、邱鳳翔、梁宰、孟天成、陳章哲、陳英、李晏等人。¹³⁰前往這些地區的臺灣醫師，不是自行經營醫院，就是任職於當地的醫院。

（二）習醫：習醫者，以前往上海、東北為主，這與這兩地的醫學院校有關。如南滿洲鐵道會社的南滿醫學堂，上海的東南醫學院，無不成為臺灣學子的升學目標。因此臺灣醫師的留學，除了日本、華南之外，前往華中、華北，甚至是東北者，也大有人在，隨著1920年代南滿醫學堂升格為滿洲醫科大學後，前往東北地區習醫的臺灣人也不斷增加。

三、前往東北、華北、華中的臺灣醫師們

1906年11月，後藤新平出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首任總裁，後藤認為像學校、寺廟、醫院這些施設若不完備，無法使移民產生長居之心，因此後藤也引介過去的下屬前往滿鐵任職，1907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出身的謝唐山，也在後藤的引介之下，前往營口的同仁會醫院任職。1908年，後藤返日出任第二次桂太郎內閣的遞信大臣。雖然後藤離開了滿鐵，但是其重視學校、醫院的理念，也間接

¹²⁸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5-6。

¹²⁹ 這些醫師當中，並非每個人皆長期停留在同一地區，如袁錦昌日後前往滿洲、廖煥章也曾至南京擔任省立醫院的外科醫長。在廈門的翁俊明、黃國材，也曾前往上海發展。范燕秋，〈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頁181-185；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臺北：龍文出版，2001），頁117-122。

¹³⁰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1-75。

影響日後大連醫院與南滿醫學堂的成立。¹³¹

1911年，同仁會將營口兩院，交予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營，同年，南滿醫學堂成立，分醫學、藥學兩科，修業年限為預科兩年，醫學科四年、藥學科三年。南滿醫學堂一共招收十四屆學生，畢業生 427 名當中，已知有王標、呂耀堂、林漢、戴神庇、戴耀閻、蘇永隆，一共 6 名臺灣人入學。¹³²

1922年3月，日本頒佈勅令第162號，南滿醫學堂正式升格為滿洲醫科大學，由南滿醫學堂長稻葉逸好兼任滿洲醫科大學校長，該校設有大學預科、大學別科，吸引不少臺灣子弟前往就讀。在滿洲國成立以前，即有臺灣醫師前來東北，分別是以求職、求學進修為主，前來滿洲醫科大學的臺灣人，也多達數十名。

1926年，東南醫科大學成立於上海，1930年更名為東南醫學院，是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學校，東南醫學院的成立，也吸引臺灣人就讀，目前已知有 18 名臺灣人畢業自該校。東南醫學院出身的臺灣醫師，除了自行經營診所之外，多半於同仁會、博愛會醫院、中國各地的私人醫院任職。¹³³

上海還有張錫祺所經營的光華眼科醫院，張錫祺原籍福建惠安，幼年隨母赴臺，其後負笈東京求學，1925年自千葉醫科大學畢業後，先是留在母校學習眼科，並於翌年返臺。張錫祺起先於高雄新濱町開業，其後前往廈門、上海開設光華眼科醫院。在上海的光華眼科醫院由於設有施診部免費為下層民眾服務，因而受到當地人的好評，以白內障的收費標準為例，富人開白內障的費用是一條金條，窮人開白內障則不收費，不過開刀時間僅限於上午九點以前。¹³⁴在從事研究與執業

¹³¹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32），頁 201；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4 滿鉄時代 1906-1908》（東京：藤原書店，2005），頁 321-326。

¹³²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 66-67；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4 滿鉄時代 1906-1908》，頁 321-326；泉孝英，《外地の医学校》（東京：株式会社メディカルレビュー社，2009），頁 104-105。

¹³³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6、51、55、76、120、162、163、175、256、266；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 11、14、94、126、191、208、216、265；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頁 265。

¹³⁴ 根據顏世鴻先生的回憶，當時上海金條每條為十市兩，依照 1930 年中華民國所公布的《度量衡法》計算，十市兩為 312.5 公克。詳見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臺北：啟動文化，2012），頁 104；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cggi/lg law>（2012 年 7 月 19 日瀏覽）。

之外，張錫祺也培育眼科醫師，早在高雄新濱町開業的同時，即有將近十名年輕人在醫院學習眼科，出自其門下的醫師所開設的醫院，也以「光華」作為醫院的名稱，¹³⁵目前已知有臺灣人盧賜等、莊榮輝、莊福、顏興等人曾至該院學習眼科。顏興日後與張錫祺的堂妹成親，莊福則為張錫祺之兄張錫珪的女婿。¹³⁶據顏興之子顏世鴻先生回憶：

二舅的學生在高雄時白天工作，晚上上課兩小時，1929年(或許六月底)，二舅選擇到上海開業，他的學生就散到汕頭、廈門、泉州、溫州、南京、深滬各地。¹³⁷

張錫祺的學生當中，盧賜等在廈門經營光華眼科，顏興於泉州開設光華眼科專門醫院。全中國共有十幾間光華醫院，光上海一地即有六間，可謂桃李滿天下。¹³⁸

1929年前往上海的張錫祺，除了在南昌路開設光華眼科醫院，也曾擔任上海東南醫學院眼科教授（日後成為校長）、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細菌學科研究生。¹³⁹張錫祺開業的收入非常可觀，顏世鴻先生也回憶：

父親的老師——我的二舅張錫祺先生，當過上海東南醫學院校長，他的收入據說一天可以買一台福特的車…(中略)…但他的錢都花在辦校、幫忙一些朋友(如謝春木先生)，自己坐過三等的有軌電車去學校上班。¹⁴⁰

張錫祺與同為千葉醫大出身的陳卓人、趙師震等人，共同維繫東南醫學院的運作，並以醫院大半收入資助該校。¹⁴¹

除了在上海發展的張錫祺外，總督府醫學校第五屆的廖煥章，第十四屆的蘇維石、蘇樵山，也先後前往天津、南京。

¹³⁵ 許雪姬訪問、張慧貞記錄，〈顏世鴻先生訪問稿〉，收入吳文星、許雪姬採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31-48；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頁80、104、384；

¹³⁶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頁80、87、89。

¹³⁷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頁104。

¹³⁸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225、311；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265。

¹³⁹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頁170；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1940）頁432。

¹⁴⁰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頁104。

¹⁴¹ 張穎生，〈一個真正高尚的人——懷念張錫祺教授〉，《遠望》270期（臺北，2011），頁52-62。

（一）廖煥章

廖煥章，出身西螺名門廖家，1906年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前往京都大學藥物學教室進修，1913年前往南京省立醫院，擔任外科醫長，1917年，辭去醫院的職務，前往上海柘子路開設中和醫院。¹⁴²由於來院患者眾多，院內先後聘請數名醫師分科看診，中和醫院也設有送診部，特別時段到院者，診療費用得以減免。¹⁴³直至1940年代，中日戰爭時期，廖煥章仍於上海執業，成為日軍的軍醫，1944年病逝於上海。¹⁴⁴

（二）蘇樵山

蘇樵山，南投埔里人。總督府醫學校時期，與杜聰明、蔣渭水、翁俊明、曾慶福等人，參與王兆培的同盟會在臺組織。蘇樵山曾前往京都留學，並在杜聰明的介紹下，前往南京省立醫院接替廖煥章的位子，¹⁴⁵其後蘇樵山於南京火瓦巷開設樵山醫院。¹⁴⁶謝春木曾形容他是一個「財神爺一般笑口常開的好好先生」，與當局的關係密切，「南京政府的要人、軍官，請他看過病的人也很多，黨國方面也有很多熟人」。¹⁴⁷1936年3月，人在南京的林獻堂因身體不適，而由蘇樵山負責診治，兩人因此結識，同年8月，蘇樵山在上海險被便衣捉拿，在領事館的保護下得以脫險，在避居東京一段時間後，再度前往上海，戰後回臺。¹⁴⁸

（三）蘇維石

蘇維石，新竹東門人，¹⁴⁹1916年，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起初任職於臺北赤

¹⁴² 同仁會編，《中華民國醫事綜覽》（東京：同仁會，1935），頁78。

¹⁴³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67-81；《申報》第18692期，1925年3月17日，第17版。

¹⁴⁴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120-122；林偉洲、張子文、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 明清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頁656。

¹⁴⁵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77-78。

¹⁴⁶ 同仁會編，《中華民國醫事綜覽》，頁85。

¹⁴⁷ 謝春木，〈新興中國見聞記〉，收於氏著，《臺灣人は斯く観る》（東京：龍溪書舍，1974），頁68-70。

¹⁴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五）：1943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頁212-213。

¹⁴⁹ 蘇維石的胞弟蘇維松，曾考進臺北師範學校，爾後前往天津投奔蘇維石。蘇維松的兒子蘇則仁出生於天津，1940年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蘇大平，〈父親的故事—懷念我的父親陳明〉，《臺聲》，2010：1（北京，2010），頁40-42。

十字社醫院內科，之後前往慶應義塾大學進修，¹⁵⁰1917年4月，應聘前往天津的東洋共和醫院，擔任眼科主任一職，此院位於天津的日本租界，其成立的目的據說與日支親善有關。¹⁵¹同年，蘇維石也與艋舺陳其春的三女陳根定下婚約，但是醫院的工作，似乎異常繁忙，以致蘇維石無法抽身返臺，雙方婚事一度告終，後經由其父蘇鴻元出面與陳家商談後，雙方決定先將陳根送往蘇家，之後再北上與蘇維石成婚。¹⁵²1920年，蘇維石離開東洋共和醫院，自行開設更生醫院。蘇維石對待貧苦的患者相當寬厚，時常減免其醫藥費用，因而被民眾所愛戴，蘇維石開業非常成功，與中國政要如黎元洪、徐世昌亦有往來。¹⁵³

在1930年代以前，受到地緣因素影響，前往華中、華北、東北這些地區的臺灣醫師，比前往華南的人數來的少，這些地區當中，以東北、上海聚集較多臺灣醫師，其他地區臺灣醫師的數量較少。這樣的情況，在進入1930年代後有了改變，1930年代，隨著九一八事變、滿洲國建國、七七事變，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也由緊張演變為全面開戰，外在的環境變化，也改變了原先「臺灣—華南」的流動模式。

¹⁵⁰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117-122；陳百齡，〈新竹第一保正—蘇鴻元的醫師家族〉，《竹塹文獻雜誌》，第41期（新竹，2008），頁90-91。

¹⁵¹ 《臺灣日日新報》第6045號，大正6年4月28日，第6版「應聘共和醫院」。

¹⁵² 《臺灣日日新報》第6516號，大正7年8月12日，第4版「送女結婚」。

¹⁵³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117-122；陳百齡，〈新竹第一保正—蘇鴻元的醫師家族〉，頁90-91。

第四章 日本的擴張與臺灣醫師

第一節 1930 年代日本的擴張與佔領地的衛生政策

1930 年代，日本的對華政策日趨積極，隨著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 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中關係迅速惡化，中國境內的日本醫療事業也受到波及，同仁會、博愛會醫院的營運即受到不小的影響，情勢嚴重時，甚至面臨閉院、撤僑的處境。

1932 年 3 月，滿洲國成立，由溥儀出任執政；¹⁵⁴滿洲國名義上雖為獨立國家，實際上卻不得不聽命於日本。滿洲國以防疫、醫療、鴉片禁斷三項，作為醫療衛生的首要方針，這些政策的推動，勢必需要大量醫療人員的投入，因此滿洲國也開始設立培養醫療人才的醫學校。¹⁵⁵

滿洲國建國初期，境內的醫事教育機關，主要有滿洲醫科大學及其專門部、盛京醫學專門學校、吉林國立醫院附屬醫學校、哈爾濱醫科專門學校、哈爾濱第一、第二齒科醫學校，1938 年，吉林國立醫院附屬醫學校，升格為新京醫科大學。1939 年哈爾濱醫科專門學校，升格為哈爾濱醫科大學。1940 年盛京醫學專門學校升格為盛京醫科大學。¹⁵⁶

1936 年廣田弘毅內閣公布「滿州移住計畫」，即以二十年的時間、百萬戶的移民為目標，將北滿洲地區的武裝移民，以「分鄉分村」的方式，進行集團性的移民計畫。¹⁵⁷為了快速養成前往這些「開拓地」的醫師，開拓醫學院也應運而生，1940 年，滿洲國成立哈爾濱開拓醫學院、齊齊哈爾開拓醫學院、龍井開拓醫學院，1942 年，興安省立醫學院成立，1944 年錦州省立光州醫學院、東安省立醫學院也

¹⁵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頁 720。

¹⁵⁵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 11-14。

¹⁵⁶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 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頁 1194-1195。

¹⁵⁷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 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頁 528。

分別成立。¹⁵⁸

這些開拓醫學院負責培育前往滿洲各開拓地的醫師，可說是確保開拓地醫師來源的一種方式。開拓醫學院的學生，必須接受為期兩年的臨床醫學訓練，畢業生具有有限地醫師的資格，必須前往開拓地服務；其中，興安省立醫學院，負責培育前往蒙古執業的醫師，該校也以蒙古學生為主，學生必須接受兩年醫學教育，畢業後具有有限地醫師的資格，可以說是「蒙古版」的開拓醫學校；其他如錦州省、東安省的醫學院，也都是培養限地醫師的學校。¹⁵⁹

另外，1940年成立的佳木斯醫科大學，雖然校名沒有「開拓」二字，畢業生依照日本的醫師法，也能夠獲得日本的醫師執照，與開拓醫學院的只有限地醫資格不同，但特別的是，佳木斯醫科大學規定畢業生必須前往開拓地服務一段時間。¹⁶⁰除了開拓醫學校之外，1935年，滿洲國立滿洲國軍醫學校成立，1939年，關東州廳立旅順醫院附屬醫學校成立，1941年升格為關東州廳立旅順醫專，畢業生的資格為「滿洲內限地開業」，即限地醫資格，只能在滿洲境內執業。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軍醫不足的情況越來越顯著，1943年，旅順醫專由文部省統轄，更名為官立旅順醫專，專收日本學生，轉以培育軍醫為主。¹⁶¹

總而言之，滿洲國的醫學教育機構，主要可分為醫科大學、開拓醫學校、省立醫學校三個系統，以及培育軍醫的滿洲國軍醫學校、滿洲限地醫的旅順醫專（爾後轉為軍醫養成）。

日中戰爭全面展開後，隨著日本軍事的勝利，華北、華中以及華南沿岸的大城市，先後為日軍所控制。日軍所佔領的大城市如廈門等，成立特別市政府；1937年12月，由王克敏主持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名義上統轄華北；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由梁鴻志所主持的維新政府，名義上統轄華中；1940年3月，

¹⁵⁸ 泉孝英，《外地の医学校》，頁96-131。

¹⁵⁹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滿洲国史 各論》，頁1195；厚生省医務局，《医制百年史（記述編、資料編共）》（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1977），頁67。

¹⁶⁰ 神谷昭典《日本近代医学の相剋：総力戦体制下の医学と医療》（東京：医療図書出版社，1992），頁299；旺文社編，《全國上級學校綜覽》（東京：旺文社，1945），頁182。

¹⁶¹ 泉孝英，《旅順医学専門学校》，《滋賀文化短期大学研究紀要》，17期（滋賀，2007），頁98-99。

汪政權成立，由汪兆銘自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原南京的維新政府取消，華北的臨時政府，也改組為華北政務委員會。¹⁶²

1937 年以後，隨著日本佔領地不斷擴大，同仁會與博愛會也直接參與佔領地的醫療衛生事業，同仁會與博愛會，主要以「班」、「處」為單位，從事佔領地的防疫與醫療工作。1937 年 9 月，同仁會派遣由 40 名醫護人員所組成的醫療班，前往前線從事醫療工作；¹⁶³1938 年 6 月，福州博愛會醫院院長小林義雄，率領 30 名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團，自臺灣出發，前赴南京支援衛生工作；¹⁶⁴1939-1942 年間，同仁會也在華北、華中、蒙疆等許多城市，分別設有類似的醫療單位。

博愛會的活動區域，主要在華南與南洋，¹⁶⁵1939 年 1 月，時任警務局衛生課技師的下條久馬一，率領由 27 名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團前往廣州，該醫療團在廣州市內外進行巡迴診療，¹⁶⁶博愛會的巡迴醫療班，也曾前往廣西的南寧、欽縣活動。¹⁶⁷

同時，廣東博愛會醫院也成立「南支派遣衛生班防疫部」，從事瘧疾帶原者的血液檢查；¹⁶⁸1939 年 3 月，海南島的博愛會支部成立於海口；1941 年，閣議決定，臺灣總督府必須順應中央的南方政策，即所謂的「一元化政策」，¹⁶⁹在此方針下，

¹⁶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頁 794-798。

¹⁶³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461 號，昭和 12 年 9 月 13 日，第七版「戰禍の地に 診療班を急派 同仁會で決定」。

¹⁶⁴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740 號，昭和 13 年 6 月 21 日，第七版「臺灣から南京へ 同仁會の醫療團 あす香港丸で出發」。

¹⁶⁵ 除了華南的日本佔領地之外，博愛會在印度支那（今越南）、東印度諸島（今印尼）、泰國等地，都分別設有診療班、診療所。參考近藤正己，《總力戰と臺灣—日本殖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 130-131。

¹⁶⁶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49 號，昭和 14 年 1 月 17 日，第七版「博愛會醫院の後續部隊が到着これで陣容全く整ふ」；《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50 號，昭和 14 年 1 月 18 日，第七版「博愛會南支派遣の衛生班が巡回診療」；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39），頁 168。

¹⁶⁷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58 號，昭和 15 年 6 月 13 日，夕刊第二版「博愛會の診療班 欽縣と南寧に進出」。

¹⁶⁸ 飯島涉，《マラリアと帝国—植民地医学と東アジア広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頁 191-204。

¹⁶⁹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95 號，昭和 14 年 3 月 4 日，第七版「博愛會の支部 廿日頃海口に誕生」；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96700，(圖 1-12)、公文別録・内閣（企画院上申書類）・昭和十五年～昭和十八年・第二卷・昭和十六年(国立公文書館)。

博愛會也直接轉由中央統制。1942年4月，博愛會海南島支部轉交予同仁會，新任支部長為下條久馬一，¹⁷⁰海南島支部的轉移，可以視為此「一元化政策」的表現。

由兩會在各地成立的單位來看，「防疫」與「診療」是日本在佔領地的衛生措施當中極為重要部份，當然這些醫療衛生工作，主要是以穩固佔領地的統治、維持軍隊的健康為目的。

除了衛生工作之外，日本也在佔領地設立醫事教育機構，早在1920年代，同仁會即在青島設立青島醫學校；博愛會在廈門設立博愛醫學校、福州的醫學講習所，兩會所成立的醫學校，多礙於經費、時局動亂等因素，而無法長期維持。這樣的情況，在日中戰爭爆發之後有了改變，日本重新整編了佔領地既有的公、私立醫學院校，許多日籍教員以顧問、名譽教授的名義，奉派、進駐這些醫學院校。

171

日本除了整編之外，也新設醫學校，1939年，青島成立東亞醫科學院，最初名稱為「東亞醫科大學」，其設立的時空背景，與佔領地政策不無關係，東亞醫科大學的目的，無非是培養醫師，以支應在中國的軍事活動所衍生的醫療需求。起先陸軍有意在濟南開設醫學校，但以失敗告終，1939年初，在海軍、政界、醫界，以及當地日本人的支持下，向文部省提出設校申請，同年3月，設校提案雖然通過，但是興亞院持反對的態度，認為東亞醫科大學建校的準備不足，促使文部省一度取消設校許可。¹⁷²

即便如此，《臺灣日日新報》上，仍然出現該校的招生訊息。雖然設校的時程有所拖延，但各地招生工作仍然進行，¹⁷³考試結果公布後，部分沖繩、臺灣、朝

¹⁷⁰ 《臺灣日日新報》第14170號，昭和14年8月27日，第七版「南支に活躍する 博愛會の組織強化 誇る南方醫學の實力發揮」；《臺灣日日新報》第15013號，昭和17年4月3日，第三版「海南島醫學陣強化 博愛會を同仁會に統合」。

¹⁷¹ 這些醫學校主要有：國立的北京大學醫學院、中央大學醫學院、河北醫學院，省立的北洋醫科大學、山東醫學專科學校、桐旭醫學專科學校、開封醫學專科學校，私立的輔仁大學醫學專修科、青島醫學專門學校、同仁大學醫學院。參考泉孝英，《外地の医学校》，頁145-162。

¹⁷² 青友會編，《青友史》（橫濱：青友會事務局，1981），頁98。

¹⁷³ 《臺灣日日新報》第14017號，昭和14年3月24日，夕刊第二版「青島に日支共學の東亜醫

鮮的學生，已先行前往青島。

另一方面，遭到興反對的學校申請案有了轉變，設校的主導權轉由興亞院所掌握。1939年8月，興亞院改以「東亞醫科學院」的名義，向文部省提出申請，同年12月，再度獲准設校。自提出設校申請開始，歷經計畫取消、再度申請、獲准設校波折過程，也反映戰時體制下，海軍、陸軍、興亞院的矛盾與爭端。¹⁷⁴

東亞醫科學院的學制為，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研究科兩年，課程上特殊的地方在於，學生自預科以至本科第四年為止，皆必須修習中國語以及東亞文化史，另外，依規定通過畢業考試，取得畢業證書的學生稱為「東亞醫科學院醫學士」，必須在中國從事醫務工作至少三年以上。¹⁷⁵

然而矛盾的地方在於，該校雖是由文部省批准成立，但是卻不具有文部省的認定資格，意即該校並非「文部省認定校」，依規定，文部省認定的醫學校，學生畢業後，持畢業證書辦理簡單手續，即有醫師免許證，能夠在日本內地執業，可謂畢業即為醫師；若非文部省認定校，畢業生便不具有在日執業的免許證，若欲取得免許證，必須另行參加醫師考試。東亞醫科學院無法獲得文部省承認的原因，與該校的師資與設備不足有關。雖說該校畢業生以留在佔領地服務為主，但資格的問題如不解決，該校學生結束三年的服務時限，返回日本內地、朝鮮、臺灣執業時，勢必面臨資格的問題，因此校方也極力爭取成為「文部省認定校」。¹⁷⁶

1941年，東亞醫科學院劃歸同仁會管轄，並更名為「同仁會東亞醫科學院」。該校在同仁會主導之下，師資與設備大幅改善，許多出身東大的教授，也前來東亞醫科學院任教，¹⁷⁷1944年7月31日，日本中央終於以勅令三二八號，宣布東亞醫科學院改名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正式成為「文部省認定校」，即日起與日本內地醫學校相同，畢業即具有醫師免許證。已於1943年11月畢業的第一屆學生，

科大學設立 近く臺北でも入學試験」。

¹⁷⁴ 青友会編，《青友史》，頁97-99。

¹⁷⁵ 青友会編，《青友史》，頁91-96。

¹⁷⁶ 青友会編，《青友史》，頁110-111；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年6月27日、7月11日訪問。

¹⁷⁷ 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6月27日、7月11日訪問。

礙於當時該校仍處於「非文部省認定校」的狀態，此「畢業」可謂「沒有醫師免許證的畢業」，直至 1944 年升格為青島醫專，畢業生的資格問題得以解決，已畢業的第一屆學生，方能獲得醫師免許證，1944 年 11 月畢業的第二屆學生，則成為此升格案的受惠者，一畢業即有醫師免許證。¹⁷⁸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直至 1945 年 12 月宣布閉校之前，一共招收七屆學生，其中有三屆畢業生，畢業生的出路主要有三：留在母校的各科教室研究、任職於中國各地的同仁會醫院、加入軍隊；青島醫專也是日本在佔領地新設的學校當中，維持的時間較長、營運較為成功的醫學校。

在大正時期，同仁會已有在上海設立醫學校的計畫，設校的構想是與上海醫院的設立計畫同時進行，不過雖然早在 1923 年，同仁會理事會即已通過上海醫院附屬醫科大學的設校決議，但是同年 9 月爆發關東大地震，原先可望來自國庫的補助款因而泡湯，也延宕了醫院與醫學校的成立計畫。1942 年，推動上海設立醫科大學的構想，在同仁會的內部重新進行了討論，並決議設校，1944 年 9 月，上海醫科大學也正式開辦。

日本在佔領地的衛生政策，不外乎成立診療班負責醫療、成立防疫班負責防治疾病，同時也進行調查工作，這些措施的推動，必然需要人力，因此日本政府以整編、新設醫學校的方式，培養醫療人才。除了就地培養之外，由母國、殖民地抽調醫師，也是方法之一。在 1930 年代以後，特別是伴隨戰爭所帶來的新變局，如日本在華醫療事業的人力需求，以及整編、新設的醫學校林立，也為產生新的「推力」與「拉力」，影響臺灣醫師的流動。

第二節 滿洲國的成立與臺灣醫師

¹⁷⁸ 青友會編，《青友史》，頁 110-11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2303300(圖 1)、御署名原本・昭和十九年・勅令第四八六号・大正十年勅令第三百二十八号東亜同文会ノ設立スル東亜同文書院大学等ニ関スル件及昭和十八年勅令第四百三号財団法人同仁会ノ設立スル青島東亜医科学院ニ関スル件中改正ノ件(国立公文書館)。

在滿洲國成立以前，來到東北的臺灣醫師主要以就學、開業為主，在滿洲國成立之後，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改變在於就學人數的增加。

1936年11月，滿洲國公布「醫師法」，滿洲國的醫師法，與1906年日本內地的「醫師法」與1916年的「臺灣醫師令」大同小異，如必須為官、公立醫學校或者是經認可之私立醫學校出身、醫師考試及格、外國醫學校畢業或在外國具有醫師執照等。略有不同之處在於：滿洲國醫師人數不足，因此在本法施行之前，已受到官方認定的醫師，仍然適用此法，毋須重新認定。在東北的臺灣醫師，以自滿洲國的醫學校畢業者最多，人數超過百名；其次為日本內地的醫學校畢業者，有36名；畢業自臺灣的醫學校，有28名；醫師考試及格者當中，也有臺灣人，不過人數似乎不多。¹⁷⁹由於滿洲國建國以後，不僅新設醫學院校，原先的醫學院校也紛紛升格，因此，有意負笈滿洲的臺灣學生們，也增加許多選擇與機會。

根據許雪姬的統計，已知有127名臺灣人曾負笈滿洲習醫，其中以就讀滿洲醫科大學的人數最多，就讀該校醫學部的有36名，專門部有46名，其次為新京醫科大學，有21名，加起來一共103名，佔滿洲習醫者八成；就讀開拓醫學院、軍醫學校人數不多，加起來僅7名。¹⁸⁰換言之，前往滿洲習醫的臺灣人，以就讀滿洲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為主。

依據日本的醫師法（1906年頒佈）的第一條第一項，「帝國大學醫科大學醫學科，或官立、公立，或者由文部省所指定的私立醫學專門學校醫學科畢業者，得以獲得內務大臣所核發的醫師執照。」由內務大臣所核發的執照，也能夠在日本執業。滿洲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佳木斯醫科大學，先後成為日本政府指定的醫科大學，畢業生能夠直接取得日本的醫師執照。¹⁸¹因此臺灣人較青睞醫科大學的原因，可能也與畢業後，能夠直接獲得內務大臣的執照有關，不過滿洲、新京兩校的臺灣學生的數量，遠較哈爾濱、佳木斯兩校的學生來

¹⁷⁹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5-8、66-67。

¹⁸⁰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66-67。

¹⁸¹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 各論》，頁1194。

得多，¹⁸²加上佳木斯醫科大學規定，畢業生必須至開拓地服務一段時間，這樣的條件可能也影響了臺灣學生的入學意願。¹⁸³

由於臺灣人大多聚集於滿洲國中南部的大城市，地理位置偏北的哈爾濱與佳木斯，冬天嚴寒，臺灣人也相對較少。以曾就讀哈爾濱醫科大學的盧昆山為例，其原先在大連的仁和醫院、博愛醫院擔任助手，因為不具有正式的醫師資格的緣故，曾被人檢舉，盧昆山受此刺激，遂興起進修的念頭，考取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之時，盧昆山面臨未來出路的問題，最後選擇前往鞍山的天生醫院，理由主要是鞍山較哈爾濱溫暖、天生醫院的薪水較優渥，前往鞍山醫院一事，乃由盧昆山之外甥女梁許春菊所引介。¹⁸⁴由於滿洲北部較為寒冷，多少降低臺灣人前往該地的意願，盧昆山是因一心習醫而前往哈爾濱，但畢業後卻選擇不滯留該地，而是前往氣候條件及待遇較佳、同為臺灣人經營的鞍山天生醫院任職。

由血緣、親屬、師友關係所構成的人際網絡，本身就是牽動臺灣醫師前往滿洲的因素之一，這種關係網絡，對於身處滿洲的臺灣醫師而言，也具有互相提攜的作用。出身滿洲醫學院校的醫師，畢業後大多留在滿洲行醫，這些臺灣醫師的出路相當多元，以自行開業、受聘於臺灣人醫院，或任職於公家醫院為主，亦有人進入研究、教學體系，如擔任滿洲醫科大學各科教室助手、各科醫員。而畢業於日本內地、臺灣醫學校的臺灣醫師，由於來到滿洲時已具有醫師身份，因此以直接開業，或者是任職於臺灣人經營的醫院、公家醫院為主，這些醫師之所以來到滿洲，不少是受到親族、友人的招攬、引介者，而當他們在滿洲開業有成以後，也同樣經由招攬、引介的方式，使其親族、友人也前來滿洲；若已具有醫師身分，則直接協助看診，若不具醫師身分，則擔任醫院助手的工作，或在滿洲擇校就讀，

¹⁸² 根據許雪姬的統計，加上出身哈爾濱醫科大學的盧昆山口述，以及查閱 1954、1958、1966、1975 年份的醫師名冊的結果。就讀哈爾濱醫科大學的臺灣人並不多，目前已知有 4 名。另外，也不見有臺灣人就讀佳木斯醫科大學的記錄，雖然資料上沒有記載不代表沒有，但可想見的是人數並不多。

¹⁸³ 旺文社編，《全國上級學校綜覽》，頁 182。

¹⁸⁴ 鞍山之天生醫院為臺灣人楊澄海所經營，楊澄海之妻梁金蓮為梁道的長女，梁許春菊為梁道長男梁成之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五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273-276。

畢業後在自行開業或協助看診。另外，亦有已具醫師身份，來滿洲之後再度進修者。

以撫順天生醫院的梁宰為例，梁宰畢業自總督府醫學校，為第十一屆。1914年前往滿洲，起先任職於滿鐵醫院，爾後於撫順開設天生醫院。其後，梁宰的侄子梁成、梁炳元、梁松文、侄女婿羅福嶽、同窗之子林昌德、親族楊藏誌，以及同樣來自臺灣的吳連芳、高進紀、劉漢、王火炎等人，也先後在梁宰的醫院任職。梁成、梁炳元、梁松文、林昌德、楊藏誌、高進紀、王火炎畢業自滿洲醫科大學；羅福嶽來自臺北醫專；劉漢、吳連芳則分別畢業自東京興亞醫學館、東洋醫學院。

185

滿洲對於臺灣醫師而言，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地區，由於政治環境、醫療生態對臺灣醫師有利，接受醫學教育的機會也較多，因此即便前往滿洲相對於華南、華中遙遠，仍然有許多臺灣醫師與學生，不辭辛勞的前往這個臺灣人的新天地。

第三節 佔領地的臺灣醫師與徵集令

1937年7月，日中戰爭全面展開以前，在中國的臺灣醫師，以華南、滿洲地區數量最多，此外也有少部分的醫師前往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執業，這樣的情況，在1937年以後有了變化。造成改變的主要原因，與日本在佔領地的衛生工作、成立醫事教育機關有關，1937年以後為日本佔領的地區，原先的日本醫院重新運作，昔日的中國、西方系統的醫院，也為日本人所接管。

1938年，日本政府公布「國家總動員法」，在此基礎之下，又於1941年12月公布「醫療關係者徵用令」，1942年2月，臺灣總督府也以府令十一號，公布「醫療關係者徵用令施行細則」。簡言之，依照本令，厚生大臣得以徵用醫師、牙醫師

¹⁸⁵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22-27。

等醫療相關從業人員，¹⁸⁶此時，無論是在日本、臺灣，或是身處佔領地的臺灣醫師，也成為徵用的對象。

日本的醫療體系，隨著進入戰時體制的建立而改變，連帶影響了殖民地臺灣。1941年8月，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醫師試驗規則」，原先的限地醫師考試改稱乙種醫師考試；1942年2月，日本政府公布「國民醫療法」，並先後廢止「醫師法」與「臺灣醫師令」；11月，「國民醫療法」施行細則公布，凡醫療從業人員，如醫師、齒科醫師、護士等，皆被納入戰時的統制體制下。原先醫師的領照規定也有變化，醫師自醫學校畢業，必須再經一年的訓練後，才具有領取醫師免許證的資格。¹⁸⁷

因開戰而撤離的同仁會、博愛會的相關人員，先後組編診療、防疫班，在中國境內從事防疫、醫療的活動，在臺灣本島以及日本內地所培養的醫師，也成為這些診療、防疫班的助力。這些醫療單位戰前即有，並非戰爭的產物，但是不同之處在於，戰爭爆發後診療、防疫班的數量急遽增加，分佈的地區也隨著軍事行動而有所拓展，此時殖民地臺灣，也扮演支援角色，許多的臺灣醫師，也任職於佔領地的醫療單位。以出身嘉義的張嘉英與鄧水造為例，張嘉英自長崎醫科大學畢業後，返回嘉義醫院任職，1941年，經由長崎醫大校長的引介，前往北京的鐵路醫院任職，後來張嘉英離開鐵路醫院，並應邀接管友人的醫院。¹⁸⁸

鄧水造是基督徒，畢業自日本大學醫專部，因有意前往中國行醫、傳教，在高天成醫師的介紹下，1944年9月離開東京，前往蘇州，先後任職於蘇州博習醫院、通州縣立醫院。¹⁸⁹鄧水造回憶在蘇州的行醫的日子：

那個時代中國人的醫生非常少，整個醫院裡面有正式讀過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只有三個。而醫院裡面總共只有六個醫生，我們就在那邊為中國大

¹⁸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22663400，（圖 1-12）、御署名原本・昭和十六年・勅令第一一三一号・医療関係者徴用令（国立公文書館）。

¹⁸⁷ 李騰嶽，《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衛生篇》，頁 36。

¹⁸⁸ 顏尚文計畫主持、馬有成採訪編輯，《嘉義市醫療業口述歷史》（嘉義：嘉義市文化局，2005），頁 83-85。

¹⁸⁹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167。

陸的百姓診療。我在那邊的時候，其實他們對我們臺灣人都沒有很好的印象，他們就認為我們是日本人啊。中國那邊主要是日本人去那邊做宣傳啦，宣傳日本的好。¹⁹⁰

鄧水造認為，日本在中國的醫療活動，特別是對當地住民的診療，實際上是具有宣傳、安撫的目的性，希望藉由醫療，以安撫、籠絡佔領地的民心。

由同仁會、博愛會所構成的日本在華醫療網絡當中，臺灣醫師的人數並不少；臺灣醫師任職於各地的醫院與診療防疫班，亦有醫師在佔領地的醫學院校任教。在這些醫療單位中，位居要職的臺灣醫師不在少數。這些臺灣醫師，也順著日本在華的醫療網絡，活躍於佔領地。

臺灣醫師在醫療單位中，並非全部擔任副手、助手的角色。以華南為例，如魏火曜與鄭德和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的醫長、林千種曾任廣東博愛會醫院第二分院院長、林進生曾任廈門日本海軍診療所所長、陳堅曾任任香港博愛會醫院小兒科醫長，以及在海南島的陵水縣衛生院院長的李繼興、在同仁會崖縣醫院擔任院長的吳遠球、還有在日本窒素附屬醫院擔任副院長的王百焜等人；¹⁹¹華中、華北的部分，如劉家琅曾任上海特別市政府衛生專員兼處長、李枝盈任教於上海東南醫學院、林茂生擔任北京鐵路醫院院長。¹⁹²實際上，擔任基層職務的臺灣醫師更多，在日本醫療單位的人事結構當中，臺灣醫師是重要的組成份子。

在佔領地服務的臺灣醫師，有部分戰前即服務於各地的日本醫院，隨著戰爭爆發、撤僑而離開，當醫院重新開啟，這些醫師又回到當地，如博愛會醫院的醫師們。在戰爭爆發後，各地的醫療單位急需醫療人員，原先在日本內地與臺灣的部分醫師，也自願或被派前往各地的醫療單位任職，此外，許多戰時前往佔領地習醫的臺灣學生，畢業後也進入各地的醫療單位服務。

¹⁹⁰ 顏尚文計畫主持、馬有成採訪編輯，《嘉義市醫療業口述歷史》，頁 130。

¹⁹¹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1-2、4、6、16、33、76、237。

¹⁹²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6；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 126；許雪姬，〈1937 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 卷 1 期（桃園，2008），頁 66。

對於當時的臺灣學生而言，由於《臺灣日日新報》會定時刊載有關各地醫學院校成立的報導，著名的函授雜誌《受験旬報》則提供各類科學校的升學訊息，因此有意負笈外地習醫的臺灣學生，能藉由這類的報章雜誌獲得相關的升學資訊。

193

1939年3月26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了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

（前略）本次連同平沼首相在內的各大臣，在各方面的資助下，以兩百萬元作為基金，於青島成立日中共學的財團法人東亞醫科大學，創立的委員長竹下文隆先生，為東京醫專的董事、前政友會的議員，首任校長由前長崎醫科大學校長的林郁彥先生出任，五月十五日起創校，以青島市江蘇路的市立醫院作為校舍，修業年限為四年，為了培訓兩百名的第一屆學生，四月二十三日起，自內地開始，在京城、臺北等各帝大以及當地舉辦入學考試。¹⁹⁴

東亞醫科大學的入學考試吸引許多人前來報考，以該校第一屆畢業生吳庭茂為例，吳庭茂之父吳媽西醫師畢業自總督府醫學校，伯父吳臥龍、吳希揚、吳克己皆為醫師。由於吳媽西醫師希望子弟習醫，並於報紙上得知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吳庭茂因而前往臺北，參加該校的入學考試，其後也順利錄取，成為第一屆的學生。¹⁹⁵

東亞醫科學院第一屆一共招收兩百名學生，已知至少有六十名左右的臺灣人，更精確地說是 58 人。¹⁹⁶全部的學生被分為甲、乙兩組，分組的依據是抵達青島的

¹⁹³ 歐文社於 1932 至 1941 年間發行的《受験旬報》為函授性質的升學雜誌，因內容翔實、豐富，是各地中學生與重考生必備的參考書。詳見陳延媛，〈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頁 117-119。

¹⁹⁴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017 號，昭和 14 年 3 月 24 日，夕刊第二版「青島に日支共學の東亞醫科大學設立 近く臺北でも入學試験」。

¹⁹⁵ 刊載東亞醫科大學招生訊息的似乎不只有《臺灣日日新報》，據吳庭茂醫師回憶，當初並不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看到招生的訊息，但確定是由報紙得知招生訊息。陳力航訪問、記錄，〈吳庭茂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 年 7 月 4 日訪問；汪乃文、吳振乾編，《一五〇年來吳葛親族》（屏東：家族自印本，1990），頁 100-101。

¹⁹⁶ 目前確定是第一屆的人有：方國韶、王生王、王定邦、王苔和、何文思、吳秀全、吳庭茂、吳鎮柱、吳鎮茂、吳鏡清、李月德、李祥洲、李惠宗、李煥燭、林子殷、林博老、林葆源、邱金生、翁博文、高文宗、高俊傑、康明田、張炳興、張啓陽、許金掘、郭炳堂、郭國夫、郭欽俊、陳木火、陳辰夫、陳南邦、陳南垣、陳清溪、陳善述、陳霖海、曾德銓、湯延齡、馮光治、黃兆啓、

時間順序，較早抵達者編入甲組，較晚者編入乙組，甲組的學生主要是日本人，臺灣人礙於交通問題而晚到者多，因此大部分在乙組。¹⁹⁷

對於臺灣學生而言，該校的成立，不僅創造習醫的機會，若是對「祖國」有所憧憬者，也是個前往中國的契機。東亞醫科學院的學生，主要來自日本內地、臺灣，朝鮮人較少，中國學生的入學管道則與日本、臺灣、朝鮮的學生不同，人數也不多。¹⁹⁸

不過，東亞醫科學院師資不足的問題，連帶影響了部分課程的開設，加以硬體設備不足，部分的學生認與原先的期待有所落差，因此選擇中途離校。設校過成的波折，也影響了學生的情緒，從第二屆開始，入學的臺灣人大幅減少。¹⁹⁹

儘管如此，東亞醫科學院仍然是佔領地當中，最多臺灣學生入學的醫學院校，1939 至 1945 年間，該校先後招收七屆學生，光前四屆的 420 名學生當中，已有 102 名臺灣學生入學，若加上五、六、七屆入學的臺灣學生，實際的人數勢必在此之上。²⁰⁰但是這個數字所指的是入學的人數，與實際畢業的人數有落差，最後畢業自該校的臺灣醫師約莫有八十名左右。²⁰¹

由於同仁會自 1941 年起接掌東亞醫科學院，在中國各地的同仁會醫院，自然也成為該校畢業生的去處。因為地緣關係，以前往同仁會青島、濟南醫院最多，其次為華中、華北地區的同仁會醫院與診療防疫班，如漢口、開封、天津、北京、海州、徐州、蘇州、鄭州等地。畢業生除了服務於同仁會的醫院外，也有一部分選擇留在母校的各科教室從事研究。²⁰²

黃金盛、黃逢世、楊日煥、楊碧惠、葉聰祺、董郡泉、劉明恕、劉震嵩、蔡文東、蔡玉邦、蔡溪泉、蔡錫圭、蕭敏捷、賴日生、賴起魁、戴雅音、謝東榮、謝炳章、謝榮發，一共 58 人。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 年 6 月 27 日、7 月 11 日訪問。

¹⁹⁷ 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 年 6 月 27 日、7 月 11 日訪問。

¹⁹⁸ 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 年 6 月 27 日、7 月 11 日訪問。

¹⁹⁹ 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 年 6 月 27 日、7 月 11 日訪問；青友會編，《青友會名簿》（大阪：青友會事務所，2001）。

²⁰⁰ 穗坂唯一郎編，《同仁會四十年史》，頁 178-179。

²⁰¹ 有關青島醫專出身的臺灣人名單，詳見附錄二；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 年 6 月 27 日、7 月 11 日訪問。

²⁰² 青友會編，《青友史》，頁 134；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26、51、65、70、77-78、80、82、85、94-95、102、106、116、128、149、159、162、182-183、190、195、202、207、209、211、

此外同仁會曾兩度組成「海南島派遣團」，派遣醫師前往海南島。1944年1月，在東京同仁會本部出差的向山美弘（時任東亞醫科學院的學院長），接到來自海軍「派遣東亞醫科學院的畢業生十二名，前往海南島」的請求，向山學院長急忙返回青島，並決定派遣員的人選，當時畢業自該校、人在東京的戴雅音醫師，也成為派遣團的一員，同年2月，該派遣團搭乘石原產業的運輸船「丸田丸」號，自門司港出發，並與其他船隻會合，船隊行至臺東與綠島中間時，忽然遭到美軍潛水艦的攻擊，「丸田丸」號沉沒。派遣團的醫師僅2名倖免，戴雅音亦不幸罹難。事發後，向山學院長緊急派遣新保護三教官前往臺灣，並集合在臺的畢業生再次編組派遣團，第一次派遣團成員罹難的消息，也被以軍事機密的方式隱匿。²⁰³

在臺召集的第二次派遣團，成員也臺灣人為主。被編入派遣團的臺灣醫師有黃逢世、郭炳堂、王定邦、張啓陽、何文思、楊碧惠、蔡溪泉、黃兆啓、吳鎮茂、馮光治等10人，由於派遣團體認到船運的危險性較高，因此希望搭乘飛機前往海南島，不過要求並沒有被接受。1944年5月，派遣團只好以軍屬的身分，搭乘「室戶」特務艦自高雄港出發，並順利抵達海南島。第二次派遣團的成員，皆服務於海南島各診療防疫班，其中，黃逢世前往榆林；何文思、楊碧惠、蔡溪泉、馮光治、黃兆啓、吳鎮茂前往海口；王定邦、張啓陽、郭炳堂則前往北黎。²⁰⁴

另一方面，1938年，也有一群臺灣醫師，選擇加入李友邦的臺灣義勇隊，這些加入臺灣義勇隊的臺灣醫師，大部份不具有在臺執業的資格，如：

在臺灣的時候，由於沒有營業執照，被日本政府和臺灣醫務界歧視和排擠，先後回到福建，在閩南的漳州、泉州一帶開業，不幸又被當地醫務界佔優勢的英美派排擠，因為他們的業務屬於德日派。²⁰⁵

這些因為無照，而無法在臺灣執業的醫師，反映了臺灣的醫療證照制度對無照醫

222、241、246、260、272、274、278、296、305。

²⁰³ 青友會編，《青友史》，頁109；戴雅音出身澎湖瓦硯，據說在船隊遭受攻擊時，戴氏為了搭救溺水的同胞，自身卻因心臟麻痺而死。詳見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師〉，頁409。

²⁰⁴ 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談記錄〉，未刊稿，2012年6月27日、7月11日訪問；青友會編，《青友史》，頁134。

²⁰⁵ 張畢來，〈臺灣義勇隊〉收入《革命史資料》第8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頁53。

師產生了排擠效應。1939年，這些醫師在浙江金華成立醫療所，並設有醫療巡迴隊，為鄰近的鄉鎮實行義診服務。由於原先的醫院與巡迴隊無法支應當地的需求，臺灣義勇隊決定將規模擴大，並於1940年9月成立「臺灣醫院」，²⁰⁶臺灣醫院主要透過醫療的方式，襄助臺灣義勇隊的革命活動，與同仁會、博愛會醫院的活動，也形成有趣的對比。

1944年，同仁會成立上海醫科大學，由於接近戰爭末期，加以該校存在的時間並不長、資料有限，因此，無法確切得掌握入學的學生情況。由於上海原先的醫學院校，不是內遷就是停辦，戰時前往上海習醫的臺灣人，多就讀日人所創辦的厚生醫學專門學校，目前已知來自此校的臺灣醫師有：張維南、徐潮松、劉子豪、林仲璋、王明道、黃清泉、陳明宗、王國雄、劉振邦等9名，大多任職於同仁會杭州醫院或上海的日本醫院。²⁰⁷

原則上，前往中國習醫的臺灣人，大多選擇佔領地新設的日本官、私立醫學院校就讀，選擇既有醫學院校就讀的人較少，畢業後，大部分任職於日本的醫療單位。戰時在中國開業、奉職的臺灣醫師，還是以佔領地與日本的醫院與診療防疫班為主，這些新設的醫學校，以及醫療單位，也改變以往臺灣醫師的流向與分布。

第四節 戰後的流動與困境

1945年8月，隨著戰爭結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面臨的又是另一個變局，不少臺灣醫師選擇回到故鄉繼續行醫；也有部分醫師，因故無法返臺，最後客死異鄉；甚至有的醫師選擇前往日本，或是留在中國，而不返臺。換言之，臺灣醫師面臨時局的變化，自身也有所選擇，因此戰後初期的臺灣醫師的流動與肆應，

²⁰⁶ 王政文，〈政治宣傳與醫務生產：論臺灣義勇隊的組織與活動〉，《史耘》第12期（臺北，2007），頁103-106。

²⁰⁷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17、49、67、142、219、257；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86、142、287；有關厚生醫學專門學校的資訊，可參考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643/node67657/node67734/node67908/userobject1ai65242.html>（2011年3月25日瀏覽）。

也具有多元化的面相，這些選擇當中，以返回臺灣的人數最多，即便戰爭結束，這些醫師們返回臺灣的過程也是多所驚險，順利返回臺灣的醫師，大多回到自己的原鄉開業、在地方經營診所。

在地方衛生機構任職的臺灣醫師，以畢業自中國的醫學校，如廈門博愛會醫院博愛醫學校、青島醫專、滿洲醫科大學等校的臺灣醫師為例，這些醫師中，有一定的比例任職於地方衛生機構。以廈門博愛會醫院的博愛醫學校為例，目前已知 18 名出身自該校的畢業生當中，有 10 名畢業生任職於臺灣各地衛生所，比率最高；其次，青島醫專、滿洲醫科大學、上海東南醫學院的畢業生當中，任職地方衛生機關、公立醫院者，分別有 18 名、21 名、5 名，其他具有中國經驗或出身其他中國醫學校的醫師，任職於上述單位的有 28 名，若將全部的數量相加為 74 名。不過，在《臺灣醫師名鑑》、《臺灣省醫師名鑑》裡，醫師即使擁有中國經驗，不一定會完全寫在履歷上，如嘉義的張嘉英醫師即為一例，張醫師戰時去過北京，但是在兩本名鑑裡的張醫師履歷皆無記載，加以兩本名冊僅能提供 1954、1958 兩年的情況，因此在資料的侷限之下，僅能找出 74 名，具有中國經驗、戰後服務於公家機關的醫師，實際上數量，應該會多於 74 名，但是這個部分只能依靠其他的資料補充。²⁰⁸

這些醫師也成為戰後臺灣公衛體系的中堅份子，其中如顏春輝曾任臺灣省衛生處處長、魏火曜曾任臺大醫學院院長、高天成曾任臺大醫院院長、王洛曾任臺北市衛生院長、賴雅徵曾任臺北鐵路醫院副院長、徐裕增曾任臺南市衛生院的院長、梁松文曾任高雄鐵路醫院院長、吳庭茂曾任省立澎湖醫院院長等。²⁰⁹

戰後的臺灣，有兩個醫生資格核准的辦法，一個是檢覈，另一個是甄訓。檢

²⁰⁸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1-4、14、16-17、33、55-56、73、85、101、106、116、120、148-149、162-163、182-183、202、209、211、222、229、265-267、284、286、303、308-309；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 24、47、66、92、112、137、259、315、319。

²⁰⁹ 顏春輝出身臺南，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醫學博士。其父顏振聲，早年隨臺南醫館的安彼得醫師習醫。賴雅徵，畢業自臺北帝大醫專部，曾任職於大連醫院，其妻為梁宰之女。徐裕增畢業自滿洲醫科大學，曾於滿洲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任職。梁松文為梁宰之姪，畢業自滿洲醫科大學。詳見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 第二輯》（高雄：高雄醫學院，1962），頁 153；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2、208、253；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 24、47；陳力航訪問、記錄，《吳庭茂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

覈以醫學院校畢業生為主，以畢業證書至考試院審查，如果是國民政府認可的醫學院校，就可以去內政部衛生司申請醫師證書；甄訓也是去考試院，以過去曾經有醫師相關資歷者為主，可以選擇口試或筆試，醫師證書也在內政部衛生司領取。

²¹⁰換言之，回到臺灣的醫師，正式醫學校出身者，必須辦理登記的手續，以取得醫師證書與開業許可。若非正式醫學校出身，必須依規定接受甄訓。

透過甄訓的方式，許多戰前的無照醫師也紛紛取得執照，對於這樣的現象，戰後曾於臺南、臺北執業的吳平城醫師如此感嘆：

戰後，密醫受到政府的政策保護，全部變成正式醫生，只要經過形式上的考試甄選；也就是說，如果你有三年以上的密醫經驗，有三個醫師證明，就通過了。（中略）周圍被這些「光復牌」的醫師包圍，約有六、七名，有的是以前的密醫，有的是藥局生，有的是以前在臺灣當藥局生，戰時到廈門等地，戰後回臺灣，通通都是互相平等的大醫師了。²¹¹

返臺的醫師，除了服務於各地的衛生機關、開業之外，也有醫師前往日本服務，1960年代的日本，以「國民全體保健制度」（按：即國民皆保險制度）的引進為開端，進入醫療政策的轉換期，導致開業醫師朝都市集中，部分地區面臨醫師不足的現象，對此當地政府開始自昔日的殖民地臺灣、韓國招聘醫師，²¹²由於許多臺灣醫師通曉日語，並擁有在日本執業的執照，因此有部分臺灣醫師也應聘前往無醫村服務，以青島醫專為例，有十數名畢業自該校的臺灣醫師，戰後前往日本的無醫村診療所任職。²¹³曾經在無醫村服務的青島醫專畢業生，目前已知有吳庭茂、許茂柚、范國展、高俊傑、康明田等人。其中，吳庭茂於1970年代前往日本，先後在岩手縣大槌町、宮城縣高清水町兩地服務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²¹⁴

不過，由於戰後初期時局混亂，並非所有的臺灣醫師皆能順利返臺，如孟天

²¹⁰ 陳力航、黃懷賢，〈黃文生先生訪談記錄〉，未刊稿，2011年2月11日訪問。

²¹¹ 吳平城、胡慧玲著，《草地醫生》，頁108。

²¹² 今野卓美，〈戰後日本の外国人医師導入：医師不足と旧植民地出身医師〉（名古屋大學大學院國際開發研究科博士論文，2002），頁1。

²¹³ 青友會編，《青友史》，頁123。

²¹⁴ 陳力航訪問、記錄，《吳庭茂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年7月4日訪問。

成戰後即遭共軍逮捕，雖然性命無虞，但被迫交出醫院，行動自由也受到限制，其後孟天成曾在解放軍的醫院擔任院長，並終老大連；²¹⁵在撫順開業的梁宰，在共產黨軍隊進入撫順後，被以私藏國民黨員的罪名拘留，在衛生不佳的拘留所裡，不幸染上回歸熱，本身即患有糖尿病的梁宰，由於治療回歸熱的藥物與糖尿病相剋，加以戰時醫療資源的缺乏，致使梁宰的病情不斷惡化，最後病逝。²¹⁶

另外，戰後未返臺，或是返臺又奔赴中國者亦有。如 1910 年代即前往天津的蘇維石，戰後輾轉前往東北，任職於大連市衛生局。²¹⁷原先在上海開業的張錫祺，戰後返臺出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並遞補為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參議員（補吳鴻森之缺）。1947 年張錫祺出任東南醫學院的校長，翌年以校務繁忙，無法抽身為由，請辭省參議員獲准，²¹⁸其後張錫祺即滯中不返，致力於東南醫學院的校務發展，也受到周恩來與朱德的器重，出任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院長，1960 年病逝。²¹⁹

少部分的臺灣醫師，戰前即已加入共產黨，以李應章(李偉光)、吳秀全(吳敬新)、李惠宗等人為例：李應章(後改名李偉光)出身彰化二林，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組織「二林蔗農組合」領導蔗農與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對抗，二林事件爆發後被捕入獄，刑滿出獄後加入蔣渭水創設的臺灣民眾黨。1932 年李應章前往廈門開設「神州醫院」，並於當地加入共產黨，1943 年前往上海日本租界定居，改名「李偉光」，開設「偉光醫院」，戰後李偉光並未返臺，曾擔任臺灣解放政協代表、上海臺灣同鄉會會長、中共人大代表。²²⁰

²¹⁵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頁 22。

²¹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五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 311-314。

²¹⁷ 陳百齡，〈新竹第一保正—蘇鴻元的醫師家族〉，頁 91。

²¹⁸ 《申報》第 24744 期，1947 年 1 月 4 日，第 08 版「張錫祺博士就任 東南醫學院院長」；董翔飛，〈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4)，頁 8；臺灣省諮議會 http://www.tpa.gov.tw/big5/Councilor/Councilor_view.asp?id=245&cid=4&urlID=20 (2012 年 6 月 2 日瀏覽)；臺灣省參議會(1948-06-13)。[省參議員張錫祺辭職經臺灣省政府函告遺缺由范姜萍遞補，惟范員逝世改由彭德遞補等文件。]《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www.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20/d6.html> (2012 年 6 月 2 日瀏覽)。

²¹⁹ 張穎生，〈一個真正高尚的人—懷念張錫祺教授〉，頁 52-62。

²²⁰ 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2000)，頁 134；朱真一，〈早期留俄的臺灣人(4)：戰後的謝雪紅女士與醫界人士〉，《臺灣醫界》，51 卷 4 期(臺北，2008)，頁 177。

吳秀全又名吳敬新，新竹人，1943年自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其後加入共產黨，吳秀全曾於八路軍山東縱隊從事醫務工作，戰後並未返臺，曾歷任解放軍軍醫，山東軍區、濟南軍區醫院婦產科主任。²²¹吳秀全似乎在政治方面頗為活躍，曾擔任濟南市、山東省臺灣同胞聯誼會的會長，從事對臺聯絡與宣傳的工作。李惠宗同樣出身自青島東亞醫科學院，戰後未返臺，亦曾擔任濟南市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²²²



²²¹ 青友会編，《青友史》，頁123。

²²² 高克亭、李奇辰編，《八路軍山東縱隊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1057-1065；山東省省情資料庫 <http://sd.infobase.gov.cn/bin/mse.exe?seachword=&K=b1&A=14&rec=112&run=13>（2012年3月25日瀏覽）。

第五章 結論

人才的流動，受到許多內在、外在因素所構成的推力、拉力影響，或者可以進一步探討，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人群的「前往」與「離開」某地，這些因素，隨著時間推移也有所改變，呈現階段性的變化。

戰爭、醫學院校的成立，是階段性變化的主因，本來以前往華南為主的臺灣醫師，在 1920 年代，南滿醫學堂升格為滿洲醫科大學，上海成立東南醫學院，前往滿洲與上海的人數開始增加。進入 1930 年代，滿洲國建國，創設許多新的醫學校，因此前往滿洲的醫師更多，1939 年青島成立東亞醫科學院，吸引許多臺灣人前往青島，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同仁會、博愛會也因此更加活躍，臺灣醫師也隨著兩會在中國的擴張與活動，而被派往早期臺灣醫師鮮至的其他地區，如濟南、杭州、漢口、海南島等地。

以下則歸結本文所發現的島內、外因素，來看日治時期臺灣醫師前往中國習醫、行醫的推力與拉力，以及臺灣醫師在中國各地的分布情形。

一、島內因素

（一）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臺灣衛生環境惡劣，為避免危及統治，總督府採取了諸多衛生措施，這些工作常需要醫療人材的投入，由於醫師的工作性質，與殖民利益並不違背，殖民政府希望臺灣人成為醫師，以協助地方衛生工作，若衛生有所改善，統治的不安定因素便降低。因此，醫師一職的興起，本身即為衛生政策的產物。1900 年代後半，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在各地開業的成功，也改變社會對醫師的觀感，醫師成為人人稱羨、嚮往的職業。

總督府建立的證照制度，也將無照的臺灣醫師向外排擠，總督府以證照制度的方式，規範臺灣醫療行為，既有的漢醫體系因此沒落。無照的醫療從業者，若有意繼續執業，除了再度嘗試取得執照之外，鄰近的地區，如醫療水平落後、醫

師證照規定鬆散的華南，便成為這些無照醫師的選項之一。

（二）總督府的教育政策：醫師高收入與高社經地位，促使許多臺灣人以習醫作為升學的目標，總督府醫學校的入學考試也轉趨競爭，然而總督府增設的特設科與熱帶醫學專攻科，乃是與南進政策有關，並非為了擴大總督府醫學校的招生名額，即便 1922 年升格為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36 年臺北帝大採醫學部、醫學專門部並存的一校兩制，對臺灣人而言，島內的習醫機會，始終是處於僧多粥少的狀態。因此，有意習醫的臺灣人，便不得不前往海外尋求機會。所謂的海外，並不僅止於日本內地，臺灣人若不是前往日本內地，而是前往中國習醫的話，其所就讀的學校，大多與日本有所關連。

（三）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總督府以「醫療」，作為對華親善的方式之一，如 1900 年代成立的同仁會，1910 年代成立的博愛會，即為在華醫療事業的代表性組織。其中，由臺灣總督府所主導的博愛會，先後在華南沿海廈門、福州、廣州、汕頭設立醫院，並以高薪鼓勵醫師前往博愛會醫院任職，許多的臺灣醫師也受到影響，前往華南的博愛會醫院。

二、島外因素

（一）行醫的機會：清末民初的中國，醫政制度紊亂、醫療衛生水準低落，中國官方雖然有頒佈相關的醫師法規，但是在內亂頻仍的情況下難以落實，也提供臺灣醫師一個發展的新天地，以廈門為例，即使是無照的臺灣醫師，都能有不錯的發展機會。

（二）習醫的機會：如廈門博愛會醫院的博愛醫學校、與滿鐵有關的滿洲醫科大學、同仁會的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等校。原先前往滿洲習醫的人數，即因 1920 年代滿洲醫科大學升格，而逐漸增加，1932 年，滿洲國建國後，新設的醫學校，也吸引臺灣人前往就讀，1939 年，青島東亞醫科大學成立，前往該校就讀的臺灣人也多達一百多名。

在廈門、滿洲、青島習醫的臺灣人，畢業後大多留在當地，或是前往附近的

官立醫院任職。

唯一非日本系統，而臺灣學生較多的是上海東南醫學院，至少有十九名左右的臺灣醫師出身自此校，但是此人數若與滿洲醫科大學、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的畢業生相比，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上海東南醫學校出身的臺灣醫師，只約略與博愛醫學校相當，²²³然而博愛醫學校自 1924 年創校，至 1928 年即關閉，僅存在四年，而上海東南醫學院自 1926 年創校，至戰時內遷為止，至少維持十幾年的時間。由此可知，博愛醫學校的臺灣學生入學率，也較上海東南醫學院來得高。

這現象反映，前往中國習醫的臺灣人，仍然傾向就讀於日本系統的醫學校，選擇中國人創辦的醫學校就讀者相對較少，不過也並非每一間由日本所創立的醫學校，都會受到臺灣人的青睞，以滿洲為例，就讀畢業生僅具限地醫資格的開拓醫學校的臺灣人即不多。

換言之，臺灣的學生在選校時，也將未來的出路納入考量，就算是畢業之後，不受開業地區限制的醫科大學，因氣候、地理因素，也影響臺灣人就讀的意願。如滿洲的醫學校內，僅有滿洲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的人數較多，哈爾濱、佳木斯大學的入學人數較少，此與當地的氣候、臺灣人際網絡有所關連。

（三）日本的大陸政策：臺灣醫師前往博愛會醫院的原因，一方面是總督府的鼓勵，一方面是博愛會醫院的成立，產生職缺，吸引臺灣醫師前往，兩方的因素都有。與博愛會相較，同仁會的事業範圍偏北，與臺灣總督府比較沒有直接的關聯，1930 年代以前，前往同仁會醫院臺灣醫師，人數比較少，受到總督府鼓勵的成份也較低，如謝唐山前往同仁會營口醫院執業，主要與後藤新平個人的引介有關。

進入 1930 年代，日本建立滿洲國、擴大在華的佔領地，也為原先以華南為主的醫師流向帶來變化，同仁會、博愛會也在各地設立醫療單位，以配合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隨著日中之間戰事與衝突逐漸擴大，不少的臺灣醫師也被動員，前

²²³ 博愛醫學校的 67 名畢業生當中，已知有 23 名的臺灣學生，佔整體畢業生的比率三分之一。上海東南醫學院在維持的時間較長的情況下，出身臺灣的學生僅有 19 名。

赴日本的佔領地支援，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後，有許多的臺灣醫師被徵調到前線服務，分布在中國各地的醫療單位。

（四）臺灣人的特殊身分與人際網絡：在中國的臺灣人，由於具有特殊身分，在前往中國之後，不僅脫離殖民地的差別待遇，在許多層面上也視同日本人，享有特權。因此，前往中國的臺灣醫師，不是在臺灣籍民群聚的城市，就是在日本所控制，或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地區，這樣的分布，也因區位的因素而有所不同。

這些身處異地的臺灣人，也互相照顧、引介，以出身臺灣的地緣關係，形成人際網絡，這樣的人際網絡，也影響了臺灣醫師前往中國的分布。

總之，影響日治時期臺灣醫師流動的最大原因，與身為「殖民地」的功能導向性與差別性有關，殖民地臺灣所給予醫師的推力，大多與總督府的衛生、教育政策，以及日本中央的大陸政策有關；相對的，中國開業的低開業限制，以及日本在華創辦的醫院、醫學院校，也成為臺灣醫師前往中國的主要拉力。

三、區位現象

（一）華南

華南是臺灣醫師最早前往的地方，即便自1920年代開始，前往滿洲的醫師開始增加，但華南的臺灣醫師始終維持一定數目；臺灣醫師主要分布在福建、廣東的沿海城市，如廈門、福州、漳州、泉州、廣州、汕頭，其中以廈門的人數最多，可能有一兩百人次以上，此與廈門為臺灣人的原鄉、語言風俗相近、交通相對方便有關。由於華南日本系統的醫學校，僅有廈門的博愛醫學校，存在時間也不長，加上臺灣人就讀非日本系統醫學院校的人數不多，因此與開業相較，前往華南習醫者較少。在華南的臺灣醫師，大部分是已具有醫師身分，或是已有從事醫業的經驗，再前往華南任職或開業。

（二）滿洲

滿洲的部分，1900-1910年代雖然有陸續有臺灣醫師前往滿洲，或者是臺灣學生前往南滿醫學堂就讀，但整體人數不多，無法與同時期華南相比。1920年代起，

由於南滿醫學堂升格為滿洲醫科大學，前往滿洲習醫的臺灣人逐漸增加，在滿洲的臺灣人落地生根，也不斷的引介親友前來開業、就學。進入 1930 年代，由於滿洲國建國，在新設醫學校、政治環境友善的情況下，在滿洲習醫、行醫的臺灣人不斷增加，也始終維持一定人數。

與華南不同之處在於，在滿洲的臺灣醫師，以出身滿洲的醫學校、或曾在滿洲再度進修者居多，此與滿洲醫學教育體系完整、醫事教育機關林立有關，因此，在滿洲的臺灣醫師，許多是在滿洲的醫學校畢業之後，留在當地執業。由於滿洲與華南不同，距離較遠，語言、風俗也相差甚遠，之所以吸引臺灣人，在於其教育機會與政治環境，也因為語言、風俗相異，在滿洲的臺灣人，也較具有自我意識。這樣的意識，似乎也反應在醫院的規模上。簡言之，來到滿洲的臺灣醫師，在開業的形態上，也較為群聚，臺灣醫師在滿洲所經營的醫院，兩名醫師以上的醫院不少，院內的醫師大多也是臺灣人，甚至出現如孟天成、簡仁南、梁宰等人的大型醫院。

（三）華中

前往華中的臺灣醫師，多分布於大城市，如上海、南京、漢口；其中，以上海的人數最多。起先，前往上海的臺灣醫師主要以自行開業，或是任職於當地的私人醫院居多，著名有廖煥章與張錫祺等人，翁俊明亦曾在上海開設俊明醫院。1926 年東南醫學院成立後，前來上海習醫的臺灣人逐漸增加，1940 年代，上海成為日本的佔領地，由日人所成立的厚生醫專，也成為臺灣學生的前往上海習醫的另一選擇。根據統計，日治時期至少有 32 名臺灣人曾前往上海習醫，在這些人當中，有 27 名就讀東南醫學院、厚生醫專，其他的學校如上海南洋醫科大學、上海中國醫學院，也有臺灣人就讀，但人數不如東南醫學院與厚生醫專。畢業自東南醫學院與厚生醫專的醫師，主要任職於各地的同仁會醫院，或是上海的日本醫院與臺灣醫院。²²⁴

²²⁴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17、49、51、55、67、76、120、141-142、162-163、175、219、256-257、266；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頁 11、14、86、94、126、142、

前往南京與漢口的醫師，主要任職於當地的醫院，如漢口同仁會醫院，以及南京省立醫院。

（四）華北

前往華北的臺灣醫師，多分布於青島、北京、天津，其中以青島的人數最多。在青島東亞醫科學院成立之前，由於不具有強烈的誘因，前往青島的臺灣醫師並不多，1939年，青島東亞醫科學院成立，即便該校在畢業資格上存在問題，學校的運作也受時局的影響甚深，但是開校不到五年的時間，即有百餘名臺灣人入學。畢業後，不少留在母校服務、研究，或是在山東境內活動。在青島的臺灣醫師，絕大多數也出身自該校。由於戰亂的因素，加以青島東亞醫科學院成立的目的，即以培養支援軍事行動的醫師為主，在青島的臺灣醫師，以任職於公家機關者最多。

前往北京的醫師，自行開業、任職於同仁會北京醫院、鐵路醫院、北京大學附屬醫院等，或是就讀協和醫學院；前往天津的醫師，則以自行開業、任職於醫院居多。

總之，影響臺灣人前往中國習醫、行醫背後的原因，以及分布形態的階段性變化是殖民地差別性、日本帝國的大陸政策、臺灣人際網絡、區位差異現象等，所交錯影響的結果。

191、207-208、216、2；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頁123。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日文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659100、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九年・法律第四十七号・医師法（国立公文書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659200、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九年・法律第四十八号・歯科医師法（国立公文書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41648300、(圖 15-16)、臺灣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一卷 (B-1-5-3-06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774700、(圖 2-4)、各国ニ於ケル医学及医術関係雑件／中国ノ部 (I-3-3-1-01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5015861300、(圖 1-7)、助成費補助申請関係雑件 第二卷 (B-H-06-02-00-02-00-0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5016194300、(圖 40、114)、参考資料関係雑件／支那各地博愛病院関係_(B-H-07-02-00-04-04-0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5016194400、(圖 40、92)、病院関係雑件／博愛病院関係 (B-H-07-02-00-04-04-0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786500、(圖 23)、各国病院関係雑件 (I-3-3-1-02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14700 (圖 5)、在本邦特選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推薦関係 第二卷(B-H-05-03-00-01-02-0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729100, (圖 3-4)、在外本邦開業医
関係雑件/免許証下付申請関係 第四卷(I-3-3-1-008)(外務省外交史料
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596700, (圖 1-12)、公文別録・内
閣(企画院上申書類)・昭和十五年~昭和十八年・第二巻・昭和十六年(国
立公文書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2303300(圖 1)、御署名原本・昭和十
九年・勅令第四八六号・大正十年勅令第三百二十八号東亜同文会ノ設立
スル東亜同文書院大学等ニ関スル件及昭和十八年勅令第四百三号財団法人
同仁会ノ設立スル青島東亜医科学院ニ関スル件中改正ノ件(国立公文
書館)。

大田豊正編集,《新京医科大学圭泉会名簿》(大阪:新京医科大学圭泉会本部,
2008)。

小野得一郎,《中華民國醫事綜覽》(東京:同仁會,1935)。

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32)。

中西利八,《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1)。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長池田幸甚文書》〈手記〉
(2007C-1-6)。

拓殖通信社,《同仁会と南支経営・臺灣議會請願の経過》(東京:拓殖通信社,
1926)。

旺文社編,《全國上級學校綜覽》(東京:旺文社,1945)。

東亜同文会編著,《対支回顧録上巻》(東京:原書房,1981)。

青友会編,《青友史》(横濱:青友会事務局,1981)。

青友會編,《青友會名簿》(大阪:青友會事務所,2001)。

南支那研究所編纂,《南支那年鑑》,昭和 14 年版(臺北:臺灣實業社,1939)。

- 厚生省医務局編，《医制百年史 資料編》（東京：ぎょうせい，1976）。
- 柯萬榮編，《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
- 泉孝英，《外地の医学校》（東京：株式会社メディカルレビュー社，2009）。
- 《後藤新平文書》，明治 31 年 2 月，「臺北医院内ニ於ケル土人医士養成ノ景況」。
- 唐澤信夫，《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 島津長次郎編，《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上海：金風社，1940）。
- 張茂吉，《廈門現況》（廈門：南海時報社，1936）。
-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滿洲国史 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会，1971）。
-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滿洲国史 総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会，1970）。
- 黒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奉天：滿洲醫科大學，1936）。
- 著者不詳，《廈門指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出版年不詳）。
- 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編，《會員名簿》（東京：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1978）。
-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43）。
-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自昭和六至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
-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自昭和六年至昭和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
-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06）。
-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24）。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醫業規則制定，61-13，頁 1-3。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廈門一年間ノ所感ト卑見（旭瀛書院岡本要八郎），2414-2，頁 1-13。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謝清海廈門ニ於テ醫術開業許可，（2242-20），頁 1-4。
- 《臺灣總督府府報》，明治 32 年 4 月 9 日勅令第九十五號，「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官

制」。

《臺灣總督府府報》，明治 32 年 7 月 7 日府令第五十五號，「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生徒給與規則」。

《臺灣總督府府報》，明治 32 年 7 月 7 日府令第五十四號，「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

《臺灣總督府府報》，大正 5 年 1 月 13 日律令第一號，「臺灣醫師令」。

《臺灣總督府府報》，大正 5 年 1 月 13 日律令第二號，「臺灣齒科醫師令」。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071 號，明治 44 年，9 月 23 日，第三版「臺醫紛集」。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583 號，明治 43 年 4 月 9 日，第四版「醫院得人」。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996 號，明治 44 年 7 月 9 日，第三版「公立醫院」。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0382 號，昭和 4 年 3 月 15 日，第四版「屏東街出身者。

臺灣總督府技師汕頭博愛會醫院外科醫長從七位醫學士吳克己氏」。

《臺灣日日新報》第 869 號，明治 34 年 3 月 29 日，第二版「本島醫生取締と藥劑」。

《臺灣日日新報》第 4456 號，大正元年 10 月 27 日，第六版「廈門通信 臺灣人之獲舉者」。

《臺灣日日新報》第 6658 號，大正 8 年 1 月 1 日，第五十九版「廈門の傳染病」。

《臺灣日日新報》第 6891 號，大正 8 年 8 月 22 日，第七版「廈門の虎疫」。

《臺灣日日新報》第 7029 號，大正 9 年 1 月 7 日，第七版「昨年の衛生狀態」。

《臺灣日日新報》第 6036 號，大正 6 年 4 月 19 日，第七版「醫師の自殺未遂」。

《臺灣日日新報》第 6045 號，大正 6 年 4 月 28 日，第六版「應聘共和醫院」。

《臺灣日日新報》第 6516 號，大正 7 年 8 月 12 日，第四版「送女結婚」。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461 號，昭和 12 年 9 月 13 日，第七版「戰禍の地に 診療班を急派 同仁會で決定」。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740 號，昭和 13 年 6 月 21 日，第七版「臺灣から南京へ

同仁會の醫療團 あす香港丸で出發」。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49 號，昭和 14 年 1 月 17 日，第七版「博愛會醫院の後
續部隊が到着 これで陣容全く整ふ」。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50 號，昭和 14 年 1 月 18 日，第七版「博愛會南支派遣
の衛生班が巡回診療」。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58 號，昭和 15 年 6 月 13 日，夕刊第二版「博愛會の診
療班 欽縣と南寧に進出」。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95 號，昭和 14 年 3 月 4 日，第七版「博愛會の支部 廿
日頃海口に誕生」。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170 號，昭和 14 年 8 月 27 日，第七版「南支に活躍する 博
愛會の組織強化 誇る南方醫學の實力發揮」。

《臺灣日日新報》第 15013 號，昭和 17 年 4 月 3 日，第三版「海南島醫學陣強化
博愛會を同仁會に統合」。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017 號，昭和 14 年 3 月 24 日，夕刊第二版「青島に日支
共學の東亜醫科大學設立 近く臺北でも入學試験」。

《臺灣醫學會雜誌》〈廈門通信〉第 10 卷 99 期，明治 44 年，頁 84-86。

《臺灣醫學會雜誌》〈廈門通信〉第 17 卷 188 期，大正 7 年，頁 712。

《臺灣醫學會雜誌》〈廈門通信〉第 33 卷 350 期，昭和 9 年，頁 898。

《臺灣醫學會雜誌》〈廈門通信〉第 17 卷 193 期，大正 7 年，頁 1049。

《臺灣醫學會雜誌》〈廈門通信〉第 17 卷 188 期，大正 7 年，頁 712。

《臺灣醫學會雜誌》〈廈門通信〉第 17 卷 191 期，大正 7 年，頁 882。

《臺灣醫學會雜誌》〈廈門通信〉第 29 卷 298 期，昭和 5 年，頁 103。

《臺灣教育》169 號，大正 5 年 7 月，「旭瀛書院通信」。

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1940）。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穂坂唯一郎編，《同仁會四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43）。

（二）、中文

上海時光整形外科醫院 <http://www.sh-shuguang.com/gk/gk.html> (2012年6月4日瀏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五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六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革命史資料》第8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方玉珍、郭紫筠，《乘願藥師如來—廖泉生回憶錄》（臺中：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2000）。

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012年7月19日瀏覽）。

《申報》第21610期，1933年6月12日，第3版「上海近十年來醫藥鳥瞰」。

《申報》第22920期，1937年2月27日，第09版「臺灣人雜居泉州 泉城及晉南各鄉概查 多係醫生行動可注目」。

《申報》第24744期，1947年1月4日，第08版「張錫祺博士 就任東南醫學院院長」。

吳文星、許雪姬採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吳平城、胡慧玲著，《草地醫生》（臺北：玉山社，1997）。

吳雅純編，《廈門大觀》（出版地不詳：出版項不詳，1947）。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

李玲虹、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臺北：海峽學術，2007）。

李騰嶽，《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衛生篇（一）》（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3）。

-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上）》（臺北：龍文，2001）。
-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 第二輯》（高雄：高雄醫學院，1962）。
- 汪乃文、吳振乾編，《一五〇年來吳葛親族》（屏東：家族自印本，1990）。
- 周維新等編著，《限地醫生：周瑞醫師傳記》（臺南：基督長老臺灣教會公報社，2008）。
- 林吉崇，《景福札記》（臺北：作者自刊，2004）。
-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臺北：臺大醫學院出版，1998）。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八)：1946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五)：1943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
- 洪嘉惠編，《民雄先賢小傳》（臺南：盛春出版，1998）。
-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臺北：高昭義發行，1996）。
- 梁永祿，〈請詢問這個女孩子以測知臺胞愛國的熱烈〉，《新臺灣》，創刊號（北平，1946），頁4。
- 陳力航、黃懷賢訪問、記錄，〈黃文生先生訪談記錄〉，未刊稿，2011年2月11日訪問。
- 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年6月27日、7月11日訪問。
- 陳力航訪問、記錄，〈吳庭茂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年7月4日訪問。
-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臺》（臺北：前衛，1994）。
- 福建省檔案館編，《臺灣義勇隊檔案》（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7）。
- 臺大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1992）。
- 臺大醫學院，《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同學錄》（臺北：臺大醫學院，1952）。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

臺灣省諮議會 http://www.tpa.gov.tw/big5/Councilor/Councilor_view.asp?id=245&cid=4&urlID=20（2012年6月2日瀏覽）。

臺灣省參議會（1948-06-13）。[省參議員張錫祺辭職經臺灣省政府函告遺缺由范姜萍遞補，惟范員逝世改由彭德遞補等文件。]。《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www.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20/d6.html>（2012年6月2日瀏覽）。

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 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9）。

蕭開平、藍博洲，《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臺北：海峽學術，2004）。

濟南政府網 http://www.jinan.gov.cn/gtb/index.jsp?url=http%3A%2F%2Fwww.jinan.gov.cn%2Fart%2F2007%2F10%2F14%2Fart_37_760.html

韓石泉，《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臺北：望春風文化，2009）。

顏尚文計畫主持、馬有成採訪編輯，《嘉義市醫療業口述歷史》（嘉義：嘉義市文化局，2005）。

二、專書

Ming-Cheng 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pp.1-236.

- 小林道彥，《日本の大陸政策 1895-1914：桂太郎と後藤新平》，（東京：南窗社，1996）。
-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臺北：博揚文化，2011）。
-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臺北：樂學，2006）。
-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南投：臺灣文獻館，2009）。
- 王詩琅，《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1988）。
- 朱潮，《中外醫學教育史》（上海：上海醫科大學，1988）。
- 呂政達，《鐵膽佛心—法醫楊日松》（臺北：培真文化，2001）。
- 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
- 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2000）。
- 林偉洲、張子文、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 明清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
- 近藤正己，《総力戦と臺灣—日本殖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 金振林主編，《臺灣義勇隊在金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 范燕秋，《宜蘭縣醫療衛生史》（宜蘭：宜蘭縣政府，2004）。
- 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臺北：稻香，2005）。
- 神谷昭典，《日本近代医学の相剋：総力戦体制下の医学と医療》（東京：医療図書出版社，1992）。
- 張秀蓉，《臺大醫院利比亞醫療服務隊：1964年1月至1968年6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上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下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2），1992），頁 11-15。
-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
- 陳澤編，《臺灣先賢先烈傳 第三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 董翔飛，《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4）。
- 飯島涉，《マラリアと帝国—植民地医学と東アジア広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編著，《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1998）。
-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東京：藤原書店，2004）。
-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4 滿鉄時代 1906-1908》（東京：藤原書店，2004）。

三、論文

- 山室信一，〈植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満州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ピーター・ドウス、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大東亜共和圏」の思想と現実》（東京，1998年），頁 121-153。
- 今野卓美，〈戦後日本の外国人医師導入：医師不足と旧植民地出身医師〉（名古屋大學大学院國際開發研究科博士論文，2002）。
- 中村孝志，〈廈門及び福州博愛会医院の成立—臺灣総督府の文化工作—〉，《南方文化》第 15 輯（奈良，1988），頁 1-57。

- 中村孝志，〈汕頭博愛會醫院の成立—臺灣總督府の文化工作〉，《天理大学学報》第 162 輯（奈良，1989 年），頁 15-28。
- 中村孝志，〈廣東博愛會醫院をめぐる諸問題（1）〉，《天理大学学報》第 165 輯（奈良，1990 年），25-49。
- 中村孝志，〈廣東博愛會醫院をめぐる諸問題（2）〉，《天理大学学報》第 166 輯（奈良，1990 年），1-24。
- 中村孝志，〈「大正南進期」と臺灣〉，《南方文化》第八輯（奈良，1981）頁 209-257。
- 王政文，〈政治宣傳與醫務生產：論臺灣義勇隊的組織與活動〉，《史耘》第 12 期（臺北，2007），頁 87-110。
- 王學新，〈抗戰前博愛會醫院之運作與日本大陸政策之關係〉，《逢甲人文學報》，第 16 期，（臺中，2008），頁 107-131。
- 朱真一，〈早期留俄的臺灣人(4)：戰後的謝雪紅女士與醫界人士〉，《臺灣醫界》，51 卷 4 期（臺北，2008），頁 176-180。
- 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范燕秋，〈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收於國史館編著，《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研討會論文集》，頁 151-196。
- 泉孝英，〈旅順医学専門学校〉，《滋賀文化短期大学研究紀要》，17 期（滋賀，2007），頁 97-106。
- 莊永明，〈日治時代的醫學教育〉，《臺灣史料研究》，第 3 期（臺北，1996），頁 3-20。
- 許雪姬，〈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2000 高雄研究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2001），頁 369-403。
-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 卷 2 期（臺北，2004），頁 1-75。
- 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2），頁 396-417。

- 許雪姬，〈1937 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 卷 1 期（桃園，2008），頁 33-84。
- 陳力航，〈陳以文先生訪問記錄〉，《宜蘭文獻雜誌》，87、88 期（宜蘭，2011），頁 137-168。
- 陳三郎，〈日據時期臺灣的留日學生〉（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 陳百齡，〈新竹第一保正—蘇鴻元的醫師家族〉，《竹塹文獻雜誌》，第 41 期（新竹，2008），頁 87-107。
- 陳德智，〈評介駱明正《疆界內的醫生：在殖民地臺灣的專業性、民族性與現代性》〉，《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臺北，2005），頁 207-222。
- 陳姪媛，〈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19 卷 1 期（臺北，2012），頁 87-140。
-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人「習醫偏執」所反映的社會意義及其影響〉，《文化實踐與社會變遷》，創刊號（臺北，2010），頁 127-195。
- 張穎生，〈一個真正高尚的人—懷念張錫祺教授〉，《遠望》270 期（臺北，2011），頁 52-62。
- 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 卷 4 期（臺北，2011），頁 201-239。
- 鍾淑敏，〈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於《走向近代》（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399-452。
-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31 期（臺北，2003），頁 169-221。
-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 2063-2090。
- 蘇大平，〈父親的故事—懷念我的父親陳明〉，《臺聲》，2010：1（北京，2010），頁 40-42。

附錄

附錄一、前往廈門習醫者

廈門博愛醫學校（以下按姓名筆畫排序）		
姓名	戰後醫院名稱	簡歷
尤象祖		臺南州出身，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內科、小兒科醫員補。
王元右	名間鄉衛生所	博愛醫學校畢業，曾於汕頭、廈門等地開業。
何炳榮	愛民醫院	博愛醫學校畢業，日本廈門領事館限地開業醫師、曾於廈門禾山開業。
李騰萍		新竹州出身，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外科醫員補。
杜存仁	民眾眼科醫院院長	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博愛會醫院眼科醫師。
周桂林		臺北州出身，博愛醫學校畢業，廈門博愛會醫院內科、小兒科醫員補。
林長明	豐原鎮衛生所	博愛醫學校畢業，戰後曾任衛生所主任。
林清雲	快安診所	博愛醫學校畢業，曾於上海復康醫院、南京約翰醫院任職。
林溪海	太和醫院	臺北人，博愛醫學校畢業。
洪天成		臺北州出身，博愛醫學校畢業，廈門博愛會醫院外科醫員補。
范增泉	湖口鄉衛生所	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衛生所主任。
張 富	樂生療養院	博愛醫學校畢業。
張遊昌	礁溪鄉衛生所	宜蘭人，博愛醫學校畢業，衛生所主任。
陳日成	光華醫院	南投人，博愛醫學校畢業，曾於汕頭、廈門、潮州、澄海等地開業。
陳來安	健安醫院	嘉義人，博愛醫學校畢業。
陳昆玉	溪州鄉衛生所	彰化人，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汕頭博愛會醫院內科醫員。
陳松森	礁溪鄉衛生所	宜蘭人，博愛醫學校畢業。
陳鎮順	中寮鄉衛生所	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汕頭博愛會醫院醫

		員。
劉連文	仁德鄉衛生所	臺南人，博愛醫學校畢業。
劉新民 (劉道榮)		臺南人，博愛醫學校畢業後，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因參加抗日遊行而受到日方通緝，其後前往汕頭的國民革命軍補充團衛生隊擔任軍醫。戰時加入臺灣義勇隊，並擔任衢州臺灣醫院的院長。
戴天青		博愛醫學校畢業，在博愛醫學校學習中因成績優異，而前往臺南醫院特設科，爾後前往南京執業，亦曾任軍醫。
戴開新 (許開新)		澎湖人，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外科醫員補。
魏 強	魏醫院	南投人，博愛醫學校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醫官補，戰後醫師甄訓合格，曾服務於太麻里鄉衛生所。
<p>資料來源：</p> <p>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5016194400，(圖 40、92)、病院關係雜件／博愛病院關係(B-H-07-02-00-04-0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p> <p>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六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p> <p>同仁會編，《中華民國醫事綜覽》(東京：同仁會，1935)。</p> <p>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p> <p>金振林主編，《臺灣義勇隊在金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p> <p>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2)。</p> <p>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p> <p>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p> <p>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p>		

附錄二、前往青島習醫者

青島東亞醫科學院、青島醫學專門學校（以下按姓名筆畫排序）		
姓名	戰後醫院名稱	簡歷
方國韶	方婦產科診所	雲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為方瑞壁四男。
井上啓一 （原姓范，名字不詳）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戰後歸化日籍，為范國展之兄。
王生王	臺南二中校醫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東京同仁會醫院醫員。
王定邦	快安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青島同仁會醫院內科醫師。
王苔和	中和醫院	花蓮人，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曾於徐州自設仁愛醫院。
何文思	護生堂診所	嘉義民雄人，東京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前往青島東亞醫科學院就讀（第一屆），畢業後曾服務於同仁會海南島支部海口診療防疫班內科、小兒科，以及海南醫院婦產科。戰後曾服務於民雄鄉衛生院。
吳大洲	臺灣省立婦女教養所衛生組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青島同仁會醫院助手、青島民生醫院小兒科主任。
吳秀全 （吳敬新）		新竹人（客家人），1943年自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其後加入共產黨，吳秀全曾於八路軍山東縱隊從事醫務工作，戰後並未返臺，曾出任濟南軍區總醫院婦產科主任、濟南軍區軍醫學校教研室主任。先後兼任中華醫學會山東省分會常務理事，中醫學會山東省分會第一、二屆理事，濟南軍區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理事。1982年，吳秀全成為濟南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第一屆理事會會長。1985年，出任山東省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名譽會長。曾任政協山東省

		第五屆委員會委員、濟南市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1989年病逝。
吳庭茂	屏東縣衛生院	屏東人，為吳媽西醫師之四男，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曾服務於同仁會鄭州醫院。戰後吳庭茂曾擔任屏東縣衛生院第一課長，主要負責法醫工作，其後應省衛生處處長顏春輝之請，前往省立澎湖醫院擔任院長，1970年代前往日本岩手縣、宮城縣的無醫村服務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
吳慶祿	長生醫院	曾就讀青島東亞醫科學院。
吳鎮柱	人愛醫院	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
吳鎮茂	茂林醫院	彰化人，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戰後曾服務於彰化縣衛生院。
吳鏡清	三江醫院	嘉義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醫院醫員。
李月德	德惠診所	臺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李祥洲	李小兒科內科醫院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李惠宗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戰後留在中國，。
李煥燭	臺灣省立花蓮醫院	臺中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青島醫學專門學校附屬醫院醫員、同仁會蘇州病院婦人科醫員。
林子殷	臺南市南區衛生所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青島醫專副手、大同破礦醫院內科醫師、太原西北實業公司醫院內科醫師。
林山斗	林眼科醫院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國立山東大學醫學院主治醫師兼講師。
林長燦	全昌醫院	桃園人，曾就讀青島醫學專門學校。
林垂青	臺灣省立臺中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任同仁會青島醫院皮泌科醫師，為林春懷醫師的長子。
林柏棟	林婦產科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同仁會青島醫院婦產科醫員。
林清波	南英商工校醫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林博老	博施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青島同仁會研究生。
林溉水	西河醫院	臺中人，曾就讀青島醫學專門學校、擔任青

		島醫專附屬病院小耳科。
林葆源	葆源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青島醫院小兒科醫師。
邱金生	仁和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濟南醫院醫員、山東省立醫院主任醫師、山東省立醫科專門學校教授。
范國展	達生醫院	新竹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擔任青島醫專附屬醫院耳鼻喉科醫員。
翁博文	義竹鄉衛生所	嘉義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醫院醫員
高文宗	大安診所	東京高工學校畢業、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高俊傑	高內外科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華北開發組合北京醫院外科。
康明田	埔鹽鄉衛生所	彰化人，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研究生、同仁會診療班醫員。
張簡敏川	鳳山診所、張簡婦產科	高雄人，曾就讀青島醫學專門學校、臺大醫學院，爾後服務於高雄縣立鳳山醫院，並先後開設鳳山診所、張簡婦產科。
張炳興	月眉糖廠醫務室	臺中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青島、開封同仁會醫院。
張啓陽	啓陽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醫院醫員。
許金掘	仁慈醫院	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同仁會海州、徐州防疫班醫官。
許茂柚	仁愛醫院	屏東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青島醫專附屬醫院研究生、同仁會海州醫院醫師，戰後曾前往日本無醫村服務。
許清波 （大串清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戰後歸化日藉。
郭炳堂	協生診所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郭國夫		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
郭欽俊	臺北精神診所	臺北人，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
郭欽益		曾就讀青島東亞醫科學院。
陳木火 （田川短距）	北港鎮衛生所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陳辰夫	良皇慈善會診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療所	
陳南邦	南邦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青島醫專講師、附屬醫院外科醫師。
陳南垣	南垣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陳秋暉	明生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青島醫專附屬醫院內科、漢口同仁會醫院內科。
陳清溪		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第一屆）
陳善述	樂生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曾任天津市河東醫院內科主任、副院長、天津市防疫處技師。
陳霖海	福海醫院	新竹人，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
傅春鎧	傅外科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傅錫祺第六子。
傅浦缶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曾海	博仁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同仁會濟南醫院醫員。
曾春城	樂生療養院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戰後曾任樂生療養院治療科主任。
曾德銓	芳德醫院	臺中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湯延齡	飲和醫院	苗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曾任青島醫專附屬醫院助手、漢口同仁會醫院醫員，戰後曾服務於臺灣煤礦公司。
馮光治	馮婦產科醫院	新竹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戰後曾於新竹市南鄉產婦人科服務。
黃兆啓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黃金盛	志橋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黃逢世	平湖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青島同仁會醫院、海南島榆林同仁會醫院內科醫員。
楊日煥	楊眼科診所	苗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為著名法醫楊日松之兄，戰後先後於臺北長安西路、永和中山路經營楊眼科診所。
楊西華	西華醫院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楊碧惠	南靖糖廠醫務室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屆）、同仁會醫院醫員，琿崖公立醫院醫官。
楊麗水	楊婦產科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第五屆）
葉聰祺	葉小兒科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屆）
董郡泉		青島東亞醫科學院畢業（第一屆）。

劉 輝	輝陽診所	曾就讀青島醫學專門學校。
劉明恕	三張犁內兒科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曾服務於同仁會新鄉醫院，戰後出任樂生療養院院長、延平區衛生所主任。
劉震嵩	劉小兒科醫院	高雄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濟南醫院醫員。
歐李季坤	歐李婦產科醫院	新竹人，曾就讀青島醫學專門學校、臺灣大學醫學專修科。
蔡文東	榮春醫院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蔡玉邦	仁安醫療所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蔡溪泉	蔡小兒科內科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蔡錫圭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戰後服務於臺大醫學院。
鐘聯上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鄭騰煉	民生醫院	桃園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青島醫院內科研究。
蕭敏捷	敏捷醫院	彰化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蕭輔二	信義鄉衛生所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同仁會青島醫院醫員、青島大安醫院醫員。
賴日生	泰和醫院	臺東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賴時昌	迎安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服務於青島醫專附屬醫院內科。
賴起魁	恒德醫院	臺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
戴雅音		澎湖人，青島東亞醫學院畢業（第一屆）
薛國安	國安醫院	曾就讀青島醫學專門學校
謝東榮	同仁醫院	雲林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日本同仁會醫員，曾於林內鄉衛生所服務。
謝炳章	鶯歌醫院（謝內兒科醫院）	彰化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曾任同仁會醫員，戰後出任臺北市衛生院課長、省立臺北保健館組長。
謝榮發	光祐醫院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一屆）、同仁會天津醫院醫員、天津防疫處技師。
葉榮輝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戰後返臺經商。
龔德英	德英醫院	高雄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任同仁會醫院醫員。
資料來源： 呂政達，《鐵膽佛心—法醫楊日松》（臺北：培真文化，2001）。		

-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
- 洪嘉惠編，《民雄先賢小傳》（臺南：盛春出版，1998）。
- 青友會編，《青友史》（橫濱：青友會事務局，1981）。
- 青友會編，《青友會名簿》（大阪：青友會事務所，2001）。
- 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2）。
- 陳力航訪問、記錄，〈蔡錫圭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年6月27日、7月11日訪問。
- 陳力航訪問、記錄，〈吳庭茂先生訪問記錄〉，未刊稿，2012年7月4日訪問。
-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
-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
-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
- 濟南政府網 http://www.jinan.gov.cn/gtb/index.jsp?url=http%3A%2F%2Fwww.jinan.gov.cn%2Fart%2F2007%2F10%2F14%2Fart_37_760.html

附錄三、出身上海東南醫學院、上海厚生醫專的臺灣醫師

上海東南醫學院（以下按姓名筆畫排序）		
姓名	戰後醫院名稱	簡歷
李新海	義隆醫院院長	雲林人，上海東南醫學院。
李耀生	烏松鄉衛生所	屏東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日本外務省醫師考試及格、曾於廈門執業。
周永鐘	周眼科醫院	臺北人，別號鶴鳴，曾於廈門博愛會醫學校就讀，其後畢業自上海東南醫學院。
林祺煌	愛兒小兒科醫院	新竹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張鑒津	新竹縣衛生院	新竹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同仁會濟南醫院醫員、上海市政府施療所所長。
莊榮輝	莊眼科醫院	臺南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曾服務於上海光華眼科醫院。
陳雅八		彰化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陳新添	博愛醫院	宜蘭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彭火爐	仁厚醫院	桃園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曾擔任於同仁會北京醫院醫員。
程修全	崙背鄉公所	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曾於廈門博愛會醫院擔任醫員。
程清水	勝利診所	雲林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楊志雄	楊志雄醫院	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詹崇文	崇仁醫院	雲林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醫員、廣東葉山醫院內科主任。
廖東耀	虎尾鎮公所	雲林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同仁會濟南醫院、上海駒屋醫院。
劉家琅	大生醫院	新竹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戰前曾於漢陽兵工廠醫務課外科服務，上海特別市政府衛生專員兼衛生處長。
謝長萼	東山診所	苗栗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謝謹雄	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鍾英秀	博愛診所	苗栗人，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
上海厚生醫專（以下按姓名筆畫排序）		
王明道	明道醫院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曾擔任日本同仁會杭州病院外

		科部醫員。
王國雄	同仁診所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曾服務於杭州同仁會醫院。
林仲璋	中西診所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曾於上海執業四年。
徐潮松	上海義齊醫院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上海日本居留民病院外科醫師、同仁會上海市民病院外科醫師、義齊醫院、上海棉花場特約醫師、義合諸式會社醫師。
張維南	土城鄉衛生所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曾擔任杭州同仁會醫院內科醫員。
陳明宗	宏仁醫院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
黃清泉	清泉醫院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
劉子豪	北埔醫院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曾擔任同仁會醫院醫員。
劉振邦	福民醫院	上海厚生醫專畢業，上海鐵道醫院、上海筱崎醫院外科醫師。
<p>資料來源：</p> <p>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p> <p>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p> <p>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p> <p>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p>		

附錄四、前往滿洲習醫者

南滿醫學堂、滿洲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國立長春醫科大學、滿洲開拓醫學校、新京醫科大學、哈爾濱醫學院（以下按姓名筆畫排序）		
姓名	醫院名稱	簡歷
于文藻		新京醫科大學畢業。
王 洛 （王世恭）	臺北市衛生院	廈門旭瀛書院畢業，前往滿洲醫科大學就讀，並進入研究科專攻法醫學，曾擔任瀋陽警察廳衛生科保健股長，獲得科學盛京賞。
王 標		曾就讀南滿醫學堂。
王大樹	錦生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安東哈爾濱警察廳衛生課長。
王火炎	同安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滿洲醫大皮膚科教室、滿洲赤十字醫院外科醫員、於鞍山開業。
王伯群		新京醫科大學畢業。
王祖堦	博愛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在大連開同德醫院。
江文峯 （江塗龍）	南京產科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滿洲醫科大學婦產科擔任醫員。
池仲九	池仲九醫院	別號崇陽，遼寧醫學院畢業，曾於青島經營中久醫院。
余文奎	玉山林場管處 阿里山醫務室	滿洲開拓醫學校畢業。
余錫乾	泰安醫院	臺北泰山人，新京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新京特別市立醫院、滿洲電信電話會社附屬醫院擔任醫員，戰後回臺。
吳大杉	奉天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高森內科、同校平山外科、稗田病理教室、於奉天行醫。
吳昌禮	建成區衛生所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吳振茂	博愛醫院	新京醫科大學、西安碳礦病院、本溪湖開業。
吳慶輝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吳慶懷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呂耀堂		澎湖人，曾就讀南滿醫學堂，其後返臺於鶯歌醫

		院服務。
李德彰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杜慶祥		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
周壽源	周松波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與施義德具有親戚關係（姑表兄弟）。
林漢		南滿醫學堂畢業，其後曾於滿洲醫科大學內科教室服務。
林元晃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林老銓	林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任漢口同仁會醫院醫師。
林秀悌	長泰醫院	宜蘭羅東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滿鐵大連醫院外科服務。戰後曾擔任臺泥蘇澳廠醫師、蘇澳鎮衛生所主任，為林秀模之弟
林秀模		宜蘭羅東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為林秀悌之兄
林宗輝	奉天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大連赤十字醫院外科。
林昌德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林啓徽	詔安診所	滿洲開拓醫學校畢業。
林清南	臺南市民眾診療所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任滿洲醫大附屬醫院內科醫員、奉天日本赤十字醫院醫員。
林景修	長春診所	滿洲開拓醫學校畢業。
林欽明	欽明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服務於大連醫院內科。
林維喬	維喬醫院	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曾任及民省立醫院小兒科醫員
林肇周	豐原鎮衛生所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林肇基	臺中市西區	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赤十字社奉天醫院醫院醫員、安東市衛生醫院院長。
林樹敏	順天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邱金波	仁光醫院	曾就讀旅順醫專。
施義德	義德醫院	彰化鹿港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滿洲醫大小兒科、左營第五燃料廠小兒科服務。
洪源福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洪鴻儒	仁治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曾任滿洲醫附屬醫院副手兼醫員。
洪禮卿	臺北市立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洪禮峯	洪小兒科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洪禮照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洪禮憲	洪婦產科醫院	新京醫科大學畢業。
孫崧芳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徐得龍		中國醫科大學畢業。
徐裕增	臺南市衛生院	滿洲醫科大學、曾任滿洲醫大附屬醫院內科醫員。
徐樹藩	和仁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袁鈺昌		新京醫科大學畢業。
高進紀	天生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細菌學教室、撫順市開業。
高夢熊 (高夢雄)	慈民醫院	澎湖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其後前往北海道大學進修。
張少基	民生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新京市立醫院。
張政宏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張登川	安生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大附屬醫院婦產科醫員。
張登財	忠山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大附屬醫院、皮膚科醫員。
張華山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張嵩山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梁 成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梁育明		瀋陽醫學院畢業
梁松文	高雄鐵路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滿洲醫科大學平山外科教室研究、撫順天生醫院外科主任。
梁炳元	道仁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滿洲醫大內科學教室、研究科、撫順天生醫院內科小兒科、撫順新生醫院院長。
章榮秋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章榮基	裕德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服務於滿洲醫大附屬醫院、擔任青島市立醫院外科主任、青島聯勤總部外科主任。
章榮熙	章外科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莊金城	新興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許燦淵	恆春許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滿洲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小兒科。
郭仲舟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陳正乾	陳婦產科醫院	新京醫科大學畢業。
陳永福	省立臺北醫院	國立瀋陽醫學院畢業、國立瀋陽醫學院外科副教授。
陳守仁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陳有德	臺灣省立臺南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陳宋舫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陳東海	東海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大高森內科醫員、南滿洲鐵道會社撫順醫院醫員。
陳松齡	松齡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滿洲醫科大學眼科教室、臺灣鴻原眼科外科醫院服務。
陳炳煌	長安醫院	滿洲開拓醫學校畢業。
陳銘斌 （陳銘彬）	寬仁醫院	新京醫科大學、曾於東北吉林省立醫院小兒科服務。
陳寶琛	竹山鎮衛生所	南投縣人，新京醫科大學畢業，曾任省立澎湖醫院、宜蘭醫院婦產科主任、爾後返回南投，先後於鹿谷、竹山開設醫院，並擔任竹山鎮衛生所的主任。其兄陳錫欽曾於上海特別市政府任職，戰後任彰化縣長。
傅宏成	傅外科醫院	瀋陽醫學院畢業。
傅祖宗	大同醫院	新京醫科大學、大連市大同醫院醫員。
彭春水	淵明耳鼻喉科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畢業，曾擔任滿洲醫科大學耳鼻喉科副手、奉天赤十字、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哈爾濱特別市第一醫院醫長。
曾森林	北辰醫院	國立瀋陽醫學院畢業。
黃千壬		新京醫科大學畢業。
黃元河	臺南縣蚵寮鹽民衛生所	滿洲開拓醫學校畢業。
黃永盛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黃西時	私立臺南救濟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服務滿洲醫科大學平山外科教室。
黃昌名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黃啓章		曾就讀旅順醫學專門學校。
黃深智	仁慈醫院	彰化線西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任滿洲醫大小兒科教室助手、奉天市立傳染病院小兒科副醫長，為黃順記三弟。
黃順記	福民小兒科醫院	彰化線西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任滿洲醫大助手、奉天日本赤十字醫院副院長、開原縣醫師公會會長，於開原經營博愛醫院。黃順記為黃深智、黃雅幫之兄。
黃演敏	博愛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服務於滿洲醫大高森內科、小兒科。
楊有務	高樹鄉衛生所	瀋陽醫學院畢業。

楊希榮 (楊熙榮)		曾就讀滿洲醫科大學，其後轉往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
楊金涵	明德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楊宦奇	健民醫院	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1943-1945 服務於長春醫科大學小野寺內科。
楊崑松	信愛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楊毓奇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楊藏德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楊藏鈺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楊藏興	臺南市西區衛生所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楊鐘靈	彰基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葉步嶽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葉敏盛	三芝鄉衛生所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葉鳴岡	惠生醫院	花蓮人，新京醫科大學畢業，曾於熱河北票醫院、錦昌醫院服務
董延葭	屏東醫院	屏東縣人，新京醫科大學畢業、曾任新京市立第一醫院醫師，戰後於屏東醫院服務
廖永堂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廖泉生	仁愛外科醫院	臺中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於赤十字醫院病院皮膚泌尿器科擔任醫員，戰後取得滿洲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於臺中經營仁愛醫院。
廖涼棟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廖錦河		新京醫科大學（未畢業）。
劉 萬	萬全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劉光業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劉泗洲	保元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劉建止	新生醫院	臺中新社人，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滿洲醫科大學松井外科服務，與妻謝久子合力經營百川醫院分院，其後於沙鹿開業。
劉建亭	茂樹診所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劉謝久子	新生醫院	謝秋涓之女，先生為劉建止，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滿洲醫科大學婦產科服務，與先生劉建止合力經營百川醫院分院。
蔡啓猷	梧棲鎮衛生所	滿洲醫科大學、曾任滿洲醫科大學高森內科助手、聯勤瀋陽陸軍總醫院內科二等正軍醫。
鄭信章	厚安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奉天赤十字醫院皮膚科、滿洲醫

		大附屬醫院病理學教室。
鄭國輝	鼓山區衛生所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鄭登山	寬仁醫院	滿洲國立陸軍軍醫學校、曾任長春恩賜病院、吉林鐵路病院。
盧主恩		旅順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盧昆山	臺南市衛生院	哈爾濱醫學院、大連仁和醫院醫員、瀋陽中山醫院副院長、瓦房店慈愛醫院院長。
蕭金純	遠東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戴神庇		澎湖人，南滿醫學堂畢業，其後返臺開業。
戴耀閏	愛生醫院	澎湖人，南滿醫學堂畢業，曾任汕頭市立醫院院長。
謝 頂	仁和醫院	日本大學醫學科、大連醫院外科、奉天赤十字病院外科。
謝文炫		謝秋涓之子，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謝文燦		謝秋涓之子，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謝知母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魏木源		滿洲醫科大學（遭退學）。
羅燦楹	臺灣省立嘉義醫院	滿洲開拓醫學校畢業。
蘇永隆 （蘇烏目）		高雄州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曾就讀南滿醫學堂，在學期間過世。
蘇耀輝	宏福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曾任滿洲赤十字大連醫院外科醫員。
鐘柏卿	省立基隆醫院	滿洲醫科大學畢業。
<p>資料來源：</p> <p>大田豐正編集，《新京醫科大學圭泉會名簿》（大阪：新京醫科大學圭泉會本部，2008）。</p> <p>方玉珍、郭紫筠，《乘願藥師如來—廖泉生回憶錄》（臺中：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2000）。</p> <p>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五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p> <p>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六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p> <p>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p> <p>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卷2期（臺北，2004），頁1-75。</p> <p>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		

2002)。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奉天：滿洲醫科大學，1936）。

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編，《會員名簿》（東京：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1978）。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自昭和六至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



附錄五、具有中國經驗的臺灣醫師

中國經歷者 (以下按姓名筆畫排序)		
姓名	戰後醫院名稱	簡歷
丁敦仁		曾於廈門經營閩南花柳科。
丁瑞魚	瑞魚醫院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 (第二十三屆)，後赴日本醫科大學進修、曾任廈門集美醫院院長、臺灣省政府參議。
方瑞壁 (三田晃)		新竹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前往滿洲開業，其子方國銓、方國炤為醫師。
王 趁	生民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在廈門開設醫院。
王 寶		臺南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王 帶		曾服務於廈門黎明醫院。
王 錦		曾於廈門經營至誠醫院。
王雅三 (王三塗)		臺北州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畢業 (第二十二屆)，曾於上海北蘇州路開設醫院。
王水梅	香山衛生所主任	東京女子醫專畢業、曾服務於滿洲新京滿鐵醫院、上海江川醫院。
王百焜		臺灣醫專、曾任日奎海南附屬醫院副院長。
王伸甫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內坑鎮執業。
王宏仁	宏仁醫院	上海中國醫學院畢業。
王志義	志義醫院	山東省立醫學專科學校畢業。
王振謙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戰前曾於汕頭博愛會醫院任職，並於當地經營王振謙診療所。
王祖壇 (王通明)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上海行醫
王毓麟		臺中沙鹿人，王銅鐘之子，日本大學醫學部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王道南		曾於廈門大走馬路街開設中和醫院。
王劉銅鐘 (王銅鐘、王昭人)		臺中沙鹿人，1913年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曾於沙鹿開業，1922年赴廈門博愛醫院內科任職，隔年即返臺，1928年附東京醫專進修，其子為王毓麟。

王麗水		曾於廈門經營王醫院。
王漢霖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金井鎮執業。
王顯章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王顯標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石 樹		曾於廈門經營福建齒科醫院。
石山鑫	平和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於福建龍溪執業、擔任中國中央陸軍上尉軍醫。
石光海		宜蘭人，昭和醫專畢業，為石煥長之子，曾於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創設整形美容中心，也曾任上海市第五屆政協委員、上海臺聯會第一屆副會長、名譽會長。
石林玉燦		岡山人，東京醫科大學畢業，曾於哈爾濱醫院，爾後輾轉於滿洲各地開業。
石崑玉		牙科，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鎮永甯執業。
石煥長		宜蘭人，東京醫專畢業，1919年加入新民會，回臺後加入臺灣文化協會。1923年12月因治警事件時被捕，爾後前往上海開設整容醫院。
朱光輝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
朱騰輝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江文勇		京城醫科大學畢業，曾前往滿洲開業或任職。
江清耀	江內科醫院	昭和醫專畢業、交通部北平鐵路醫院醫師。
何大俤		曾於廈門經營勵進社民眾診療所。
何連養	何耳鼻喉科咽喉醫院	臺北醫專畢業、廣東博愛會醫院耳鼻喉科。
何嵩齡	嵩齡痔科醫院	上海醫專、福建龍溪縣衛生院痔科主任。
何禮朋	大湖鄉衛生所	總督府醫師考試及格、博愛會醫院醫員。
吳 筆	信安診所	醫師甄訓及格、曾於廈門、漳州開業。
吳光輝		戰前曾於福建南安官橋鎮執業。
吳百福		戰前曾於福建南安內坑鄉執業。
吳克己		屏東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五屆），曾於福州、汕頭博愛會醫院服務，並曾任汕頭博愛會醫院外科醫長一職，1929年過世。
吳春生		臺北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經營齒科醫院。
吳素月		曾於廈門經營長春醫院。
吳崑池	吳小兒科診療所	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部畢業。
吳移鄉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磁灶鎮執業。

吳連芳	天生醫院	日本東洋醫學院畢業、曾於東北撫順天生醫院服務。
吳壽全		曾於廈門經營壽全醫院。
吳遠球	福明醫院	臺灣醫師考試及格、海南島日本同仁會崖縣醫院院長、廣東崖縣衛生院院長。
吳耀東		臺北醫專、上海特別市政府醫院管理處長。
呂芳喻	濟仁婦產科醫院	臺北醫專、上海虹口博愛醫院院長。
呂豐昌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永甯鎮執業。
宋世慶		曾於廈門經營宋耳鼻咽喉科醫院。
李 曷		曾於廈門經營中外醫院。
李 晏		彰化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十八屆），曾於北里研究所研究，因為受到關東廳的邀請而前往滿洲，曾擔任關東廳的防疫醫、哈爾濱防疫研究所細菌部長、滿洲里醫院院長，其後前往法國進修。
李 墨 (李秉文)		澎湖人，自臺南長老教會中學(按：即今臺南長榮中學)畢業後，曾於岡山建安醫院擔任助手，並於大正 14(1925)年取得現地開業醫的資格，同年赴廈門經營快安醫院，在廈門時期擔任過旭瀛書院校醫、中華小學校校醫、全閩新日報社社醫，在居留民會內擔任過許多職務，也曾擔任廈門市市醫，因身為基督徒，故致力於教會相關活動。
李天受	仁武鄉衛生所	滿洲醫師考試及格、滿洲國政府指定紅十字診療。
李平心		曾於廈門經營平心醫院
李兆基	李兆基醫院	海南島博愛會醫院醫員補
李宗榮	卑南鄉示範衛生所	曾參與廈門醫學會、並服務廈門博愛會醫院
李枝盈	李婦產科醫院	南投人，臺北帝大醫學部畢業、上海東南醫學院教授。
李河民 (蔡川燕)		高雄出身，東京醫專畢業，曾前往同仁會北京醫院服務，李於北京加入共黨，其後前往張家口，戰後並未返臺，並獲選為公費留學團成員，前赴蘇聯中央製品科學檢定所擔任研究生。
李金英		曾於廈門經營英德醫院。
李哲園		曾於廈門經營兄弟醫院。

李國明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永甯鎮執業。
李國星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李淑榮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李景星	福成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於晉江法石公立醫院任職。
李道隆	胃腸病科道隆醫院	日本大學醫學部、曾任滿洲醫大高森內科副手。
李澤洲		牙醫，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
李錦松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李應章 (李偉光)		彰化二林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領導蔗農與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對抗，二林事件爆發後被捕入獄，刑滿出獄後加入蔣渭水創設的臺灣民眾黨。1932年李應章前往廈門開設「神州醫院」，並於當地加入共產黨，1943年前往上海日本租界定居，改名「李偉光」，開設「偉光醫院」，戰後李偉光並未返臺，曾擔任臺灣解放政協代表、上海臺灣同鄉會會長、中共人大代表。
李馨芳	明德醫院	上海中國醫學院卒、臺灣醫師考試及格。
杜六律		曾於廈門經營福安外科醫院。
杜存紅		曾於廈門民眾醫院任職。
杜存義		曾於廈門執業。
杜松雲	內科兒科松雲醫院	曾在廈門經營民眾醫院。
杜從雲		曾於廈門經營民眾醫院。
沈水鏞	宏生醫院	九州帝大醫學部畢業，曾任南滿洲鐵道會社內科醫員。
沈寬綿	池上鄉衛生所	醫師甄訓及格、曾任廣東博愛會醫員。
周 瑞		臺南出身，曾於打狗、臺南的長老教會醫院追隨安彼得（Dr.Anderson）、馬雅各二世（Dr.Maxwell,Jr）、蘭大衛（Landsborough III）三位醫師學習醫術，其後獲得這三位醫師聯合頒發的畢業證書。1916年，周瑞前往廈門塔仔街經營瑞安醫院，並領有廈門警察廳廳長黃承璋頒發的甲等醫士免許證，爾後返回高雄執業。
周有禮		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曾任職於漢口同仁會醫院。
周桃源	仁愛醫院	上海南洋醫科大學畢業、上海南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內科醫長。
周燕社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周燕壽	石牌醫院	總督府醫師考試及格、曾於福建泉州執業。
周燕福		戰前曾於福建崇安執業。
孟天成		臺東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大連醫院、小岡子私立宏濟醫院任職，其後經營「博愛醫院」，並於滿洲醫科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官龍金		曾於廈門經營壽紀齒科醫院。
林 櫻 (林玉川)		板橋林家出身，為林崇智之子，曾就讀於湘雅醫學院(戰後改稱湖南醫科大學)，三年級時毅然決定輟學加入空軍，其後曾赴美受訓，戰後以中校身份退役。
林人和		宜蘭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前往廈門執業
林千種	勝元醫院	臺北帝大附屬醫專部畢業、廣東博愛會醫院第二分院院長，戰後曾服務於省立花蓮醫院。
林川田		曾於廈門經營林花柳醫院。
林仁潭		新竹人，1931 年東京醫專畢業，1932 年擔任哈爾濱霍亂防疫醫官、1933 年轉任哈爾濱特別市政公署衛生科防疫股長，1934 年被任命為滿洲國民政部公醫(駐地為甘南)，1937 年獲得滿洲國醫師執照，於大連市開業，1938 年被任命為北支派遣同仁會濟南醫院醫員。
林天意	臺灣省立臺中醫院	昭和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任大連婦人醫院主任醫師。
林世昌		戰前曾於上海經營林齒科醫院。
林安息		臺南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任職於翁俊明在上海開設的醫院。
林秀雲	主惠婦產科醫院	東京女子醫專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婦產科醫員、廈門中山醫院婦產科主任。
林育伯		高雄出身，日本岡山醫專畢業，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醫師。
林東輝		東京醫專畢業，與李河民為同班同學，戰時曾前往浙江金華，加入抗日行列。
林金泉	穎川齒科醫院	曾任廈門博愛病院齒科醫員。
林阿能	林內科醫院	日本大學醫科、曾服務於同仁會煙臺醫院。
林思平		嘉義出身，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畢業，曾任太原鐵路醫院醫員。
林拱辰	林水源醫院	昭和醫專畢業、曾服務於廣東博愛會醫院內科。
林約書		曾於廈門經營同安醫院

林茂生		嘉義出身，名古屋醫科大學畢業，戰前曾擔任於青島鐵路醫院醫員、北京鐵路醫院院長、長辛店分院長兼醫長。
林茂祺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林茂椿	林齒科醫院	日本齒科大學畢業，上海兒童齒科醫院醫員。
林家東		臺北州出身（楓子林），1913年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結束臺北醫院的臨床實習後，1915年赴廈門博愛醫院，但停留時間僅一年，隔年四月便返回臺北醫院，之後開設「中和醫院」。
林容燈	平安醫院院	廈門博愛會醫院、海南島博愛會、海口同仁會醫師。
林恩魁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未畢業），曾任職於國立新京衛生研究所。
林振聲		雲林西螺人，新潟醫專畢業，曾於廈門博愛會醫院任職。
林祝安		曾於廈門經營祝安醫院。
林國彥		新竹人，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林智煉	集集鎮衛生所	乙種醫師考試及格、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醫師。
林進生	大同醫院	福建同安縣同安醫院院長、廈門日本海軍診療所所長。
林順發	朝陽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任廣東同仁會醫院內科小兒科醫師。
林經三		戰前曾於福建崇安執業。
林聖三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林夢熊	瑞穗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服務於日本赤十字醫院、博愛會病院。
林維馨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廈門五崎街經營明和醫院。
林蔡淑奴	瑞雲醫院	東京女子醫專畢業、曾服務於上海海軍第一醫院婦產科，為蔡培火之女。
林錦文		日本大學醫學部畢業。
林錦生	和光診所	高雄岡山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十五屆）曾於翁俊明的上海醫院任職。
林龍生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滿洲執業。
林應彬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林濬哲		千葉醫科大學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林繼明		曾於廈門經營林外科。
林耀星		曾於廈門經營保安醫院。

林艷昆	保安醫院	廈門保安醫院。
邱尾水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戰前曾於汕頭經營中山醫院。
邱鳳儀	普生診所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奉天滿鐵醫院醫員、奉天官立衛生院醫官。
邱壁蘭		曾於廈門曾於廈門經營兄弟醫院。
金傳賢		戰前曾於漢口同仁會醫院執業。
侯全成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任職滿鐵醫院。
侯定邦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
姜文瀾		曾於廈門經營文瀾診療所。
施錫卿		九州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施聰慧		高雄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經營齒科醫院。
柯水治		戰前曾於福建崇安執業。
柯明點		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前往滿洲醫院執業。
柯秉焜	柯內兒科醫院	東京東洋醫學院、撫順天生醫院。
柯國良		曾於廈門福量醫院服務。
柯雲鳳		京城醫科大學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柯碧霞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金井鎮執業。
柯福量		曾於廈門經營福量醫院。
洪大中		曾於廈門經營大中醫院。
洪水益	亦成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於金門開設洪氏醫院。
洪兆漢		臺北州出身，臺北醫專畢業，曾於汕頭開設瑞昇醫院，其後前往泰國執業。
洪桂玉	臺北市立醫院	曾於海州同仁會醫院服務。
洪清河		曾於廈門經營清河醫院。
洪榮譽		東京興亞醫學館畢業，曾前往滿洲的醫院執業。
范姜新鼎	范姜醫院	臺大醫學部，海南日本窒素附屬病院。
孫發	高內外科醫院	東京女子醫專畢業，上海福民醫院內科醫師。
孫德芳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任職南滿大連醫院。
徐榮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大連執業。
徐來興	內埔鄉衛生所 來興醫院	臺北醫專畢業（第十二屆）、汕頭博愛會醫院內科醫師。
徐阿山		曾於廈門經營茂生醫院。
徐堃榮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徐愚山		戰前曾於廈門執業。
徐銀格	桃園醫院	曾任大連市博愛醫院內科醫員

涂瑞鵬		曾於廈門經營長春醫院。
翁秀煌		戰前曾於福建崇安執業。
翁俊明		臺南人，為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三屆畢業生。翁俊明曾前往廈門開設俊明醫院，也擁有日本領事館核發的醫師執照，並任職於廈門博愛會醫院，其後前往上海成立俊明醫院。並聘請林安息、林錦生等醫師擔任醫務工作，也在廈門與上海成立醫事教育機構，並跨足實業界，擔任樟腦局長。不過，中日戰爭爆發後，翁俊明決定入中國籍，並在香港組織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與日本勢力劃清界線。1943年，臺灣黨部遷至漳州，由翁俊明出任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也成立「中正醫院」，作為革命事業的掩護，不過同年卻因誤飲毒酒而驟逝。
翁秋忠	秋忠醫院	日本大學醫學部畢業、華中蠶絲附屬無錫診療所所長、日本陸軍囑託軍醫，曾奉派至南方服務
翁清本	順天醫院	曾任廈門順天醫院院長
翁通逢	建成區衛生所	嘉義人，東京東洋醫學院畢業、曾於新京醫科大學擔任郭松根醫師的助手。
翁滄海		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曾於廈門經營仁濟醫院。
翁德修	翁德修醫院	福建實地醫學講習所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醫員。
袁湘昌	湘昌醫院	東京醫科大學、曾任東北長春醫院醫師，為袁樹泉之子。
袁錦昌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十一屆），曾輾轉於廈門、上海開業，爾後前往滿洲新京開設錦昌醫院，其叔父為袁樹泉。
高天成	臺大醫院院長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曾於鹽水行醫，其後再出任東京帝大附屬醫院鹽田外科、黴菌學教室副手，及執導外科指導員，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同年高天成前往南京擔任同仁會南京醫院外科主任兼院長，之後回日擔任東京醫院外科醫務長。戰後高天成滯日，擔任東京旅日同鄉會第一屆會長，1948年回臺任臺大醫學院教授兼外科主任，1953年任臺大醫學院院長，高天成之妻林關關為林獻堂之女。
高全成	全成診療所	英國長老教會醫學院畢業，福建省南安縣立鵬溪

		慈善醫院院長、在廈門開業。
高墀顯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永甯鎮執業。
高德欽		戰前曾於福建南安官橋鎮執業。
高耀東		日本大學齒科部畢業，曾於青島醫專附屬醫院的齒科部服務。
高耀星	建安醫院	彰化人，太原市川至醫專畢業，為高再祝四男。
張七郎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滿洲開業。
張文南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滿洲執業。
張文雅		曾於廈門經營文雅醫院。
張玉麟		曾於廈門經營福建醫院。
張光邦	光邦醫院	臺南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廈門日本醫院內科醫員。
張有枝		戰前曾於廈門執業。
張享寅		戰前曾任教會醫院醫師、小學校醫，曾於福建崇安執業。
張依仁	仁壽醫院	滿洲醫師考試及格。
張其祿	快安診所	醫師甄訓合格，曾於汕頭市開業。
張明福		高雄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經營仁和醫院。
張阿本	道生醫院	曾服務於福建樟浦源梁醫院
張松炎		新竹人，南方要員練成所畢業，曾於同仁會北黎醫院服務。
張昭明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張洪南	迎生婦產科診所	東京醫專畢業、曾任福建附屬集美醫院院長。
張海藤	愛德醫院	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八屆），戰前曾任職於廈門博愛會醫院。
張純籌		曾於廈門經營黎明醫院。
張望洋		臺北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張進城	鹿野鄉衛生所	曾任於同仁會海口診療班服務。
張進通	順天堂醫院	九州帝大醫學部、曾任南滿鐵道鐵嶺醫院內科醫長。
張雲騰		澎湖瓦硯人，早年從吳炳清醫師習醫，其後進入廈門集美醫院學習醫術，學成後前往南京執業，後成為軍醫。
張傳益	濟生診所	滿洲厚生部醫師考試及格。
張瑞鳳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戰前曾於福州經營共和醫院。

張萬居	回春醫院	中華醫學校畢業、海南島海軍特務部囑託醫師。
張嘉英		嘉義出身，長崎醫科大學畢業，戰前曾任職於北京鐵路醫院。
張銀樹		曾於廈門的光華眼科服務。
張錫祺		原籍福建惠安，年幼隨母來臺依親，其後負笈東京，就讀正則中學、千葉醫大，與日籍妻子馬場琦續子育有一女張秀蓮。張錫祺起先於高雄新濱町開業，其後前往廈門、上海，開設光華眼科醫院，曾擔任東南醫學院眼科教授、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細菌學科研究生，戰後返臺出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並遞補為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參議員（補吳鴻森之缺）。1947年出任東南醫學院校長，翌年請辭省參議員獲准，其後即滯中不返，致力於東南醫學院的校務發展，也受到周恩來與朱德的器重，出任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院長，1960年病逝。
曹光明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磁灶鎮執業。
梁 宰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撫順經營天生醫院，並於滿洲醫科大學進修病理學。
梁永祿		臺南州出身，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北京開設三安醫院。
梁金蓮		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前往滿洲的醫院開業或任職。
莊 福	莊眼科醫院	曾於張錫祺的光華眼科醫院學習眼科，並服務於上海光華眼科醫院，莊福為張錫祺之兄張錫珪的女婿。
莊仁傑	溫仁醫院	1927年在中國開業。
莊天能		基隆出身，持有臺灣醫生免許，曾前往廈門開業。
莊火爐		戰前曾於廈門執業。
莊約南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莊添和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莊慶煌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許有來	省立屏東醫院	曾任津浦地區交通部濟南鐵路醫院醫師。
許江珊		澎湖瓦硯人，為許祖紹之弟，曾擔任黃三朋醫師的助手，其後前往福建海澄開設「懷德醫院」。
許恩錫		高雄人出身，上海亞東醫科大學畢業，戰前曾擔任廈門地方法院醫官、廈門臺灣居留民會議員，並在廈門經營建安醫院。

許祖紹		澎湖瓦硯人，曾於吳炳清醫師的診所擔任藥局生，1933 年前往廈門開設懷德醫院。
許能辨		澎湖瓦硯人，曾於戴成的醫院學習調劑，其後前往福建同安開業
許慶用	平安堂診所	醫師考試及格、曾在廈門開設醫院。
郭汝侯	壽世醫院	閩南醫學校畢業、福建海軍陸戰隊第二混成旅醫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醫官，戰時加入臺灣義勇隊。
郭佩勤	嶺南診所	嶺南大學醫科出身。
郭宗海		曾於廈門經營海南醫院。
郭承榮	新店鎮衛生所	屏東人，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七屆），廣東博愛會醫院院長。
郭松根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新京醫科大學任教。
郭金爐	高雄鐵路病院 外科	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藤浪外科教室。
郭炳煌	郭醫院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十屆）、福建省立廈門醫院內科主任。
郭清棟	竹北鄉衛生所	醫師考試及格，曾任博愛會醫院醫員。
郭進木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孟天成的博愛醫院任職。
郭漢海		眼科醫師，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陳 本		曾於廈門經營福民醫院。
陳 永		曾於廈門經營福建齒科醫院。
陳 信 (陳連信)		澎湖馬公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與翁俊明於廈門聯合開業。
陳 英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大連博愛醫院任職。
陳 堅	大安區衛生所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專部畢業(第二屆)，曾任香港博愛會醫院小兒科主任。
陳 溪	懷仁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於福建永春、廈門開業，在廈門擁有限地醫資格
陳天星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戰前曾服務於福州經營養生醫院
陳太平		曾於廈門經營清河醫院。
陳世澤		曾於廈門經營世澤痔瘡專門醫院。
陳正中		長崎醫科大學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陳永裕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金井鎮執業。

陳玉波		曾於廈門經營清河醫院。
陳仰經		曾於廈門經營體仁眼科醫院。
陳光復		戰前曾於榮安齒科醫院實習，並於福建崇安執業。
陳有年		北投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九屆），曾於廈門開業。
陳有齊	慈惠小兒科醫院	總督府醫師考試及格、海南島海軍施設部醫務長。
陳汝舟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金井鎮執業。
陳百川	百川醫院	曾於廈門執業。
陳西湖		曾於廈門愛國醫務處。
陳男光	男光齒科醫院	京北高等齒科醫學校畢業、曾任廈門市鷺江齒科醫院長。
陳宗釜	樂生療養院	巴黎大學醫學院、江西省立醫專、河南大學教授。
陳尚明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滿洲的醫院執業。
陳金生		東京興亞醫學館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陳金安		曾於廈門經營清河醫院。
陳長章	長春小兒科醫院	滿洲醫師考試及格、曾任吉林省公醫、吉林省郭旗地區衛生委員長。
陳宣方	體仁醫院	曾赴廈門執業。
陳春木		彰化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戰前曾於廈門經營鷺江醫院。
陳春厚	快春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海南島三亞病院。
陳茂成		東洋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陳重明	愛隣醫院	岩手醫專畢業、曾任北平同仁會醫院醫員。
陳恩張		戰前曾於廈門執業。
陳振亞		戰前曾於廈門經營振亞醫院。
陳振明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陳振義		眼科，戰前曾於福建晉江永甯鎮執業。
陳振籌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陳祝明		戰前曾於北平開業，醫院名為陳齒科醫院。
陳國忠		臺北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經營齒科醫院。
陳崇榮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陳崑崙	壽生醫院	曾任海南同仁會醫院醫員。
陳添發		臺中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經營齒科醫院。
陳章哲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滿洲開業。
陳朝吟	朝東醫院	曾任廈門朝東醫院院長。

陳登連	安南區衛生所	東京都興亞醫學館畢業、滿洲製鐵會社東邊道醫院小兒科。
陳陽山		曾於廈門經營陽山齒科醫院。
陳新造		戰前曾於廈門體仁醫院服務。
陳夢懷	濟民醫院	曾於東北開原天生醫院服務。
陳福川	延生醫院	國立江蘇醫學院畢業、曾任日本陸軍病院外科研究員、陸軍軍醫上校內外科主任、院長。
陳德恭	華山醫院	東京興亞醫學館畢業，曾任滿洲製鐵附屬醫院醫員。
陳學陀		曾於廈門經營陳學陀醫務處。
陳錫港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陳鮑卿	鮑卿醫院	1941年乙種醫師考試及格、曾擔任海南島日本窒素醫院東方分院長、北梨本院內科主任醫。
陳鐘英	英德醫院	曾服務於海南島日本窒素附屬病院。
傅元煊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滿洲開業。
傅辛勤		曾於廈門經營傅眼科醫院。
傅春鐘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前往青島開業，為傅錫祺之次男。
傅祖修	傅外科醫院	東京醫專畢業、曾任同仁會醫院醫員。
傅祖鑑	大溪醫院	桃園大溪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滿洲開業。
彭天增	延壽醫院	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卒，曾服務於瀋陽市立醫院內科。
曾 曉		高雄人，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曾於廈門經營慕仁醫院。並先後擔任廈門雅化女學校、敦化小學校等校校醫，並致力於公益與衛生思想的宣傳。
曾一三		曾於廈門經營曾外科。
曾水添		小兒科，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曾光明		戰前曾於福建南安官橋鎮執業。
曾武琴	旗山醫院	昭和醫專、曾服務於同仁會醫院。
曾阿慰		戰前曾服務於廈門世澤痔瘡專門醫院。
曾健齡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曾慶福	長春醫院	屏東竹田人，為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四屆畢業生，1917年前往廣東的陸軍醫院內科任職，其後跨足經營香蕉出口貿易，1934年前往上海投效國民政府，先後擔任第一區船舶管理處處長、第二區寧波船舶管理處處長。由於具有參加臺灣民眾黨等

		社會運動的經驗，因此被日本政府列為「要注意的臺人」，戰後曾慶福返回屏東開設長春醫院，曾任屏東市參議會參議員，以及麟洛鄉、鹽埔鄉衛生所主任。
游高石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滿洲執業。
游紹陳	慶祥醫院	宜蘭人，東京醫專畢業、南滿鐵道錦州鐵路耳鼻喉科。
游溪連		曾於廈門開業。
程焰坤	新城醫院	宜蘭人，軍醫學校畢業，曾任日窒海南公司附屬病院石碇分院長。
程水源		彰化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八屆），曾於廈門開業。
程得生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程清水	合成堂醫院	日本星藥專畢業、蕪湖同仁會醫院醫員。
程德生		戰前曾於福建崇安執業，並加入臺灣義勇隊。
華嵩地		大阪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滿洲執業。
黃 並	博愛醫院	曾服務於東北開原天生醫院。
黃 珍	田寮鄉衛生所	日本南方協會醫務衛生技術養成所畢業、醫師考試及格、曾任香港、廈門博愛會醫院醫員。
黃 洪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黃 學	德生診所	廈門醫術講習會、廈門限地醫師考試合格、曾於廈門開業。
黃乙鴻	博愛醫院	日本醫師考試及格、榆林港仁濟醫院院長、海軍榆林造船所醫藥顧問。
黃子正		為黃煙篆的長子，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與堂弟黃樹奎曾於上海杷子路經營惠濟醫院，其後前往滿洲擔任溥儀的私人醫師。
黃子修		為黃煙篆次子，曾前往中國擔任軍醫。
黃山熊	益生醫院	福建實地醫學講習所畢業、曾於廈門執業。
黃天云		臺南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黃日春	日春齒科醫院	曾任職廈門博愛會醫院齒科部。
黃丕榮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黃丙丁		臺南人，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曾於泉州執業。
黃永昌	仁榮醫院	東京醫專、大連博愛醫院外科醫師。
黃永泉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黃仲甫		臺南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黃光輝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黃旭東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滿洲開業。
黃邦榮	邦榮醫院	閩南醫學院。
黃松官		彰化鹿港人，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七屆），曾任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技師、福州博愛會醫院醫師。
黃金印	延年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1932年曾於福建開業。
黃雨辰		臺南人，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黃俊德		曾於廈門經營共德醫院。
黃奎山		曾於廈門經營清河醫院紫雲醫院。
黃炳恩	快安醫院	東洋醫學院畢業、吉林省寬仁醫院醫師。
黃國材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廈門博愛會醫院任職。
黃國祥		臺南州出身，為黃國棟之弟，醫學校晚其兄一屆，畢業後先至新樓醫院任職，爾後至廈門博愛醫院任醫官補並擔任外科，回臺後與兄長合開六安醫院，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黃國棟		高雄人，1915年畢業於醫學校，曾於廈門博愛醫院服務，其後前往日本進修，返臺後開設六安醫院。
黃國瑞		牙醫，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黃焜亮	愛生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任江蘇省高等法院、徐州市地方法院醫師。
黃凱南		曾於廈門經營凱南醫院。
黃雅幫		九州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前往滿洲的醫院任職，為黃順記四弟。
黃意凱	立仁醫院	軍醫學校醫學員班畢業、曾任廣東保安司令部醫院內科主任、空軍入伍生總隊醫務所軍醫、陸軍四五師衛生組中校組長。
黃溫恭		日本齒科醫專畢業，曾前往滿洲執業。
黃煙篆		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畢業生，曾於孫傳芳麾下擔任軍醫長達十五年之久，其後回臺開業。長子黃子正，出身於總督府特設科，日後前往滿洲，輾轉成為溥儀的私人醫師，次子黃子修也曾前往中國擔任軍醫。
黃瑞芬		曾於廈門福量醫院服務。
黃瑞蘭		曾於廈門福量醫院服務。
黃漢岳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

黃禎祥	同愛婦產科醫院	昭和醫專畢業、曾於大連執業。
黃樹奎		東京醫專畢業，曾先後於上海、滿洲開業，擔任謝介石私人醫生，其堂兄為黃子正。
黃興池	同仁醫院	日治時期醫師考試及格、江蘇省無錫民船公會診療所醫師。
黃錢炳		久留米醫科大學畢業，曾於漢口同仁會醫院服務。
黃總督	松壽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廈門博愛會醫院醫員。
楊 依		澎湖人，東洋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廈門經營蒼生齒科專門學校，其後擔任廈門齒科醫師會會長、廈門市諮議官。
楊 趙		臺南州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戰前曾於廣東博愛會醫院任職。
楊幼明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楊紹波		曾於廈門經營宏德醫院。
楊誠齋	同仁醫院	閩南醫學院。
楊澄海		愛知醫科大學畢業，曾前往滿洲的醫院開業與任職。
楊燕飛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十一屆），曾前往廣東博愛會醫院服務，戰後曾任臺大醫院眼科主任。
楊燧人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滿洲開業。
葉松生	松生醫院	昭和醫專、杭州、上海同仁會醫院內科醫員。
葉金鐘	民生診療所	閩南醫學校畢業。
葉逢春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葉逢源		戰前曾於廈門的民眾醫院服務。
葉榮隆	將軍鄉衛生所	廈門醫術講習所畢業，曾於廈門職業。
葉瑤瑞		曾於廈門經營中西醫院。
葉慶昌		新竹人，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葉貓貓 （葉松榮）		臺北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於中國廣東省、安徽省合肥行醫，其姊葉白為許丙之妻。
董長祿	廣慈醫院	日本醫科大學畢業、平漢鐵路局安陽醫院院長。
詹東壁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廈門博愛會醫院任職。
廖明輝		曾於廈門經營益仁醫院。
廖俊雄	昭仁醫院	東京醫專畢業、曾於廣東、香港開業。

廖振梧		曾於廈門經營文雅醫院。
廖煥章		西螺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曾前往京都大學藥物學教室進修，1913 年前往南京省立醫院，擔任外科醫長，1917 年，辭去醫院的職務，前往上海杷子路開設中和醫院。由於來院患者眾多，院內先後聘請數名醫師分科看診，直至 1940 年代，中日戰爭時期，廖煥章仍於上海執業，成為日軍的軍醫，1944 年病逝於上海。
廖榮華		戰前曾於福建崇安執業。
熊澤東	博愛醫院	曾於滿洲經營千山醫院。
趙篤生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廈門開業。
劉 足		曾於廈門陽山齒科醫院服務。
劉 漢	保生醫院	東京興亞醫學館畢業、撫順天生醫院醫師。
劉川枝	信義鄉衛生所	北平大學醫學院肄業。
劉世煌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
劉俊亮	公館衛生所	海南島海口日本海軍病院醫師。
劉俊鏞	太平醫院	廈門中華醫學醫門學校。
劉瑞玉	劉牙科醫院	上海美國牙科學社出身、南京南山牙科醫院。
劉壽祺		新竹人，1917 年醫學校畢業後先至臺北醫院任職，隔年即赴廈門博愛會醫院，1924 年自醫院辭職，於鼓浪嶼開設壽祺醫院，其後曾任旭瀛書院校醫、廈門日本領事館醫務囑託、廈門臺灣公會議員、參議，廈門日本總領事館警察醫，活躍於廈門醫界。
劉榮春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此人與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在宜蘭醫院奉職的劉榮春並非同一人。
劉德榮	臺灣鋁業公司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博愛會廣東、中山、佛山醫院醫員。
劉顯階	麥寮鄉衛生所	曾任廣東博愛會醫院醫師。
歐秀惠		曾於廈門的壽全醫院任職。
歐陽澄濱	歐陽內科醫院	臺北醫專、廣東博愛會醫院內科醫員。
潘大漢		臺南人，戰前曾於廈門執業。
潘瑞貞		臺中豐原人，曾於臺中體仁醫院服務，其後前往廈門開設平和齒科醫院，期間輾轉於臺廈之間開業。
潘聯輝	光華眼科醫院	名古屋醫科大學、汕頭博愛會醫院眼科醫長、代

		院長。
蔡牛	惠心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海南海軍博愛會醫院。
蔡取	蔡診所	醫師甄訓及格、曾於廈門開業。
蔡禧		曾於廈門經營蔡濟世醫院。
蔡世興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廈門經營世興博愛醫院，並擔任廈門臺灣公會議員以及旭瀛書院的校醫。
蔡炳輝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蔡章勝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1911年赴廈門，在臺籍人士汪子春與其他人合組的醫院任職，並加入廈門臺灣公會，爾後被推舉為議員。
蔡錫福		曾於廈門經營蔡濟世醫院。
蔣尚錦	蔣中西醫院	曾於廈門開業。
蔣錦松	仁安醫院	曾服務於海南島日本窒素附屬醫院。
鄧水造	再生堂醫院	日本大學醫專部畢業、蘇州博習醫院通州縣立醫院內科醫師。
鄧秉仁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鄧秉輝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金井鎮執業。
鄧信德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鄧耀生	耀生醫院	東京興亞醫學館、滿洲滿鐵附屬醫院醫員。
鄭講		澎湖人，曾於廈門開業。
鄭木生		曾於廈門開業。
鄭自守		臺南州出身，曾於廈門開業。
鄭金鳳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鄭倩玉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鄭溫人		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鄭貴元	光安醫院	福建泉州回光醫院。
鄭進益	益生醫院	廈門東洋醫學院畢業、醫師甄訓及格，曾於廈門開業。
鄭順發	共生診所	醫師考試及格、1931年曾於廈門、東北開業。
鄭義祥	重光醫院	日本廈門領事館限地開業醫師、廈門博愛會醫師講習所、於廈門開業十八年。
鄭德和	臺北市衛生院	臺中人，東京醫專畢業，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醫員、主任。
鄭鴻秋		曾於廈門經營惠生醫院。
盧海生		曾於廈門經營愛國醫院。
盧淑瓊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盧賜等	神光醫院	醫師考試及格、曾於張錫祺的光華醫院學習眼科，曾在廈門開設光華眼科。
蕭華堂	華堂醫院	醫師甄訓及格、曾任日本窒素附屬病院醫員。
蕭道應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曾前往中國參與抗日，戰後回臺，擔任法務部調查局法醫，同時經營醫院。
賴和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廈門博愛會醫院任職。
賴雅徵	臺北鐵路醫院	臺北帝大醫學專門部、大連醫院外科醫員。
謝頂		日本大學專門部醫學科畢業，曾前往滿洲的醫院開業或任職。
謝水双		臺南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曾於廈門開業。
謝水全	春生西漢診所	曾先後就讀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昭和醫專。
謝定棹		臺南州出身，戰前曾於廈門開業。
謝秋涓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滿洲經營百川醫院。
謝秋濤	懷安醫院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獲得科學盛京賞，先後擔任奉天省警務廳衛生課長、吉林省陸軍醫院院長、江蘇軍醫課長、盛京醫科大學教授兼附屬醫院院長。
謝唐山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前往營口同仁醫院任職。
謝清海		臺中廳葫蘆墩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十二屆），曾前往廈門開業。
謝朝愷		曾於廈門經營明明眼科。
謝駿聲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謝騰華		曾於廈門經營長春醫院。
鍾河漢	慈愛醫院	福州南臺慈愛醫院院長。
簡炳	太和醫院	汕頭領事館政務部限地醫認可、曾任廣東汕頭大和醫院醫師、廣東饒平縣黃岡、潮陽縣玉峽開業。
簡仁南		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前往大連的博愛醫院任職，其後自行經營仁和醫院。
簡永祿		臺中州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戰前曾於新加坡三五公司醫務所、於汕頭經營大和醫院。
簡積玉		臺中潭子人，臺北醫專畢業，曾於汕頭經營太和醫院。
顏興	光華醫院	臺南人，曾於張錫祺的光華眼科醫院學習，上海醫學講習所畢業，曾於泉州開設光華眼科專門醫院。

顏金桃		婦科、兒科醫師，曾於泉州執業。
顏春輝	臺灣省衛生處	臺南善化人，為顏振聲四男，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碩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
顏彩鄉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永甯鎮執業。
魏火曜	臺大醫學院	新竹人，臺北高等學校畢業，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曾任廈門博愛會醫院小兒科醫長，戰後出任臺大醫院院長、臺大醫學院院長、高雄醫院院長。
魏萬其	慈德診所	醫師甄訓合格、曾於廈門開業。
魏錦燕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青陽鎮執業。
羅春桂	致和醫院	昭和醫專、大連博愛醫院小兒科。
羅雲昌	南和醫院	醫師資格考試通過、曾於福建廈門市開業。
羅福嶽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任職於梁宰的天生醫院，其後自行開設回生醫院。
蘇正	救世診所	臺灣醫師甄訓及格、曾於漳州龍溪的中正醫院擔任副院長。
蘇子濱		新竹人，東京醫專畢業，戰前曾於北京執業。
蘇則仁		新竹人，北京大學醫學部畢業，戰後未返臺，於河北省執業。蘇則仁之父蘇維松，為蘇鴻元之三男，蘇維石之弟。
蘇婉容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蘇淑容		牙醫，戰前曾於泉州執業。
蘇進德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金井鎮執業。
蘇福來		臺南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畢業，曾於廈門開業。
蘇維石 (舒柏年)		蘇維石，新竹東門人，為保正蘇鴻元次男，1916年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起初任職於臺北赤十字社醫院內科，之後前往慶應義塾大學進修，1917年4月，應聘前往天津的東洋共和醫院，擔任眼科主任一職，此院位於天津的日本租界，同年與艋舺陳其春的三女陳根定下婚約，雙方決定先將陳根送往蘇家，之後再北上與蘇維石成婚。1920年，蘇維石離開東洋共和醫院，自行開設更生醫院。蘇維石對待貧苦的患者相當寬厚，時常減免其醫藥費用，因而被民眾所愛戴，蘇維石開業非常成功，與中國政要如黎元洪、徐世昌亦有往來，戰後並未返臺。
蘇擇欽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安海鎮執業。

蘇樵山 (蘇火土)		南投埔里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前往京都留學，並在杜聰明的介紹下，前往南京省立醫院任職，接替廖煥章的位子，其後於南京火瓦巷開設樵山醫院。蘇樵山與當局的關係密切，「南京政府的要人、軍官，請他看過病的人也很多，黨國方面也有很多熟人」。1936年3月，人在南京的林獻堂因身體不適，而由蘇樵山負責診治，兩人因此結識，同年8月，蘇樵山在上海險被便衣捉拿，在領事館的保護下得以脫險，在避居東京一段時間後，再度前往上海，戰後回臺。
蘇錦豐	蘇生堂診療所	曾擔任國立東北大學附屬北陵病院醫師。
蘇鴻樹		戰前曾於福建晉江石獅鎮執業。
<p>資料來源：</p> <p>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786500，(圖 23)、各国病院關係雜件 (I-3-3-1-02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p> <p>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729100，(圖 3-4)、在外本邦開業医關係雜件／免許証下付申請關係 第四卷(I-3-3-1-00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p> <p>上海時光整形外科醫院 http://www.sh-shuguang.com/gk/gk.html (2012年6月4日瀏覽)。</p> <p>《申報》第22920期，1937年2月27日，第09版「臺灣人雜居泉州 泉城及晉南各鄉概查 多係醫生行動可注目」。</p> <p>小野得一郎，《同仁會三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32)。</p> <p>小野得一郎，《中華民國醫事綜覽》(東京：同仁會，1935)。</p> <p>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五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p> <p>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 第六期 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p> <p>中西利八，《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1)。</p> <p>王詩琅，《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1988)。</p> <p>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2000)。</p> <p>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p> <p>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上)》(臺北：龍文，2001)。</p> <p>林吉崇，《景福札記》(臺北：作者自刊，2004)。</p> <p>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臺北：臺大醫學院出版，1998)。</p> <p>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p> <p>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臺灣與歐美的交流(15) 早期留俄的臺灣人(1) 李河</p>		

- 民（蔡川燕）醫師及其他》，《臺灣醫界》51卷1期（臺北，2008），頁29-30。
- 周維新等編輯，《限地醫生：周瑞醫師傳記》（臺南：基督長老臺灣教會公報社，2008）。
- 柯萬榮編，《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
- 張茂吉，《廈門現況》（廈門：南海時報社，1936）。
- 張穎生，〈一個真正高尚的人—懷念張錫祺教授〉，《遠望》270期（臺北，2011），頁52-62。
- 青友會編，《青友史》（橫濱：青友會事務局，1981）。
- 南支那研究所編纂，《南支那年鑑》，昭和14年版（臺北：臺灣實業社，1939）。
- 唐澤信夫，《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臺北：高昭義發行，1996）。
- 島津長次郎編，《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上海：金風社，1940）。
- 梁永祿，〈請詢問這個女孩子以測知臺胞愛國的熱烈〉，《新臺灣》，創刊號（北平，1946），頁4。
- 許雪姬，〈1937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1期（桃園，2008），頁33-84。
-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卷2期（臺北，2004），頁1-75。
-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奉天：滿洲醫科大學，1936）。
- 陳百齡，〈新竹第一保正—蘇鴻元的醫師家族〉，《竹塹文獻雜誌》，第41期（新竹，2008），頁90-91。
-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臺》（臺北：前衛，1994）。
- 陳澤編，《臺灣先賢先烈傳 第三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 著者不詳，《廈門指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出版年不詳）。
- 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四期（臺北，2011），頁201-239。
- 福建省檔案館編，《臺灣義勇隊檔案》（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7）。
-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臺大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1992）。
- 臺大醫學院，《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同學錄》（臺北：臺大醫學院，1952）。
-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
-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

-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自昭和六至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3年永久保存第23卷3門，「謝清海廈門ニ於テ醫術開業許可」。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39)。
-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 蕭開平、藍博洲，《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臺北：海峽學術，2004)。
- 謝春木，〈新興中國見聞記〉，收於氏著，《臺灣人は斯く観る》(東京：龍溪書舍，1974)，頁68-70。
- 韓石泉，《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臺北：望春風文化，2009)。
-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臺北：啟動文化，2012)。
- 顏尚文計畫主持、馬有成採訪編輯，《嘉義市醫療業口述歷史》(嘉義：嘉義市文化局，2005)。